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昂貴信號、訊息溝通與軍事投射能力：

中國對臺軍事演習案例的比較分析

Costly Signals, Communication, and Force Projection

Capability: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China's

Military Exercises Against Taiwan

湯廣正

Kuang-cheng Tristan Tang

指導教授：徐斯勤博士

Advisor: S. Philip Hsu, Ph. D.

中華民國 114 年 6 月

June, 2025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昂貴信號、訊息溝通與軍事投射能力：

中國對臺軍事演習案例的比較分析

Costly Signals, Communication, and Force Projection

Capability: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China's Military

Exercises Against Taiwan

本論文係 湯廣正 君（學號：R09322014）在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14 年 6 月 18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徐斯勤

（簽名）

（指導教授）

張登及

游智偉

謝辭

如前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 1940 年國會演講中所說：「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s;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這本論文的主題是軍事和勇氣。在國際關係中，軍事是最重要的元素之一，而將臺灣與軍事議題置入國際關係理論進行探討，是直觀可行又必要的，但也極具挑戰性。無論是理論適用、案例解釋及知識貢獻都有相當的難度，需要堅持下去的勇氣。

所幸一路以來有非常多的師長及朋友給予支持及協助，這本論文才得以完成。首先，要謝謝指導老師徐斯勤老師的指導與鼓勵；老師願意給我極大的研究空間，也多次給出關鍵的指點讓我跳脫困境，讓我在處理撲朔迷離的軍事現象和百家爭鳴的理論文獻上能夠化繁為簡，老師指導的思路也使我獲益良多。其次，要謝謝口試委員張登及老師；老師有關中國外交的課程讓我能深入學習中國涉外關係的歷史脈絡及政策邏輯，並且給予我關於論文寫作許多深刻的建議和提醒，對於我在研究美中關係和兩岸關係過程中有關鍵的助益。同時，要謝謝口試委員游智偉老師；老師從我大學時期起的持續照顧、教導及鞭策，是我能成長至今的原因，尤其是在學術理論和政策實務異同思辨上的啟發，使我受惠良多。

此外，要特別謝謝國立政治大學的丁樹範老師及國防大學的馬振坤老師。丁樹範老師在中國軍工產業及解放軍研究上對我的指點及建議，使我能更理解中國軍事發展的脈絡，讓我在探討中國軍事投射能力上能更為從容。馬振坤老師在中國對臺軍事侵擾及中國軍事戰略邏輯上對我的指導及啟發，使我能更加掌握解放軍環臺軍事演習的細節，為我在案例比較上提供更多著力點。

還要感謝在過去一年的論文寫作期間陪伴、支持及給予我建議的同儕及前輩們，奕銓、翔禾、佳紘、浩宇、堂宇、秉廷、俊丞，以及楊太源老師、閻鐵麟老師、陳育正老師、劉至祥老師、楊鈞池老師、蔡季廷老師及廖小娟老師，讓我能持續走在論文寫作的道路上，沒有放棄。

最後，要向我的家人表達最深的謝意。在我追求學術及知識的過程中，是我的家人們給予我無條件的支持及鼓勵，讓我可以任性地在研究世界漫遊。雖無家學背景，家父及家母是我在研究上最根本的助力，這本論文是我，也是他們的心血所成；這本論文的背後是沒日沒夜的寫作及探索，謝謝我的太太對我的相挺及體諒，她是我堅持下去的勇氣。

湯廣正 2025 年 6 月謹誌於桃園南崁

摘要



自 2022 年起，中國多次在美中臺重大事件後對臺發動軍事演習，以表達其反對臺獨，又或者是反對美國容許臺灣倚美謀獨的立場與決心。這些行動雖符合昂貴信號理論，卻也出現理論未涵蓋的現象，例如軍演期間的中國海空軍兵力波及日本，顯示中國有意透過第三國製造「國際沉沒成本」來加強對美國信號的可信度。現有理論文獻著重於雙邊關係與國內成本，無法有效解釋此類透過挑釁第三國來發送信號的行為；同時，當前挑釁理論文獻所指出的邏輯，又與昂貴信號目的是要對手讓步的機制存在矛盾。為補充理論空白，本文提出「加強型昂貴信號」概念，並以 11 起美中臺重大事件進行檢驗。本研究以訊息溝通狀況與軍事投射能力等 2 個自變數，並以軍演的 4 種程度為依變數，來探討加強型昂貴信號機制。研究結果支持本文提出的 6 項假說，確認信號發送國在訊息溝通狀況不佳時，更傾向發送加強型昂貴信號來確保自身意圖正確地讓信號接受國理解，且具有足夠的軍事投射能力與否確實會影響信號發送國的發送考量。同時，本文亦確認加強型信號符合昂貴信號的核心邏輯，也就是信號是在確實需要時才會被發送，而不單只是在有能力時就會被發送。

關鍵字：昂貴信號、挑釁、軍事演習、兩岸關係、美中關係

Abstract



Since 2022, China has repeatedly launched military exercises against Taiwan in the aftermath of major U.S.-China-Taiwan events. These operations aim to demonstrate Beijing's opposition to Taiwanese independence and its resolve against what it sees as Washington's indulgence of efforts by Taiwan to use the U.S. to seek independence. While these exercises align with the logic of costly signaling, they also exhibit patterns not fully captured by existing theories. For example, during some exercises, Chinese military units and weapons have affected areas of Japan, suggesting that Beijing is deliberately provoking third-party countries to create international audience cost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redibility of its signals to the United States. Existing literature primarily focuses on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and domestic costs, making it ill-equipped to explain signaling behaviors that intentionally provoke third countries. Moreover, the logic underpinning current theories of provocation contradicts the core purpose of costly signaling, which is to induce concessions from the target state. To address this theoretical gap,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augmented costly signals and tests it using 11 critical U.S.-China-Taiwan events. The study identifies two independent variables—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and force projection capabilities—and examines their impact on four levels of military exercise intensity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e findings support all six of the study's hypotheses. They confirm that when communication is poor, the signaling state is more likely to send augmented costly signals to ensure its intentions are correctly interpreted by the target state. Additionally, whether the signaling state possesses sufficient force projection capabilitie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its decision to escalate signaling. Finally, the study affirms that augmented costly signal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core logic of costly signaling: such signals are employed only when truly necessary, rather than simply when the sender has the capacity to do so.

Keywords: Costly Signaling, Provocation, Military Exercise, Cross-Strait Relations, U.S.-China Relations

目次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謝辭	II
摘要	III
Abstract	IV
目次	V
圖次	VII
表次	VIII
第一章 緒論：研究動機與研究設計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主要概念與變數界定	3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	14
第四節 研究假說與研究架構	21
第二章 文獻回顧	27
第一節 昂貴信號	27
第二節 挑釁	43
第三節 小結	45
第三章 案例研究	49
第一節 無能力加強信號的狀況	49
第二節 有能力加強信號的狀況	57
第三節 小結	74
第四章 國家的昂貴信號加強作為	77
第一節 訊息溝通狀態影響的檢證	77
第二節 軍事投射能力影響的檢證	80
第三節 昂貴訊號核心邏輯的檢證	87
第五章 結論	89
第一節 研究發現	89

第二節 研究不足之處及未來研究方向	95
參考文獻	99



圖次

圖 1-1 研究架構圖	26
圖 3-1 1995 年中國對臺軍事演習示意圖	54
圖 3-2 2022 年 8 月中國對臺軍事演習示意圖	64
圖 3-3 2023 年 4 月中國對臺軍事演習示意圖	66
圖 3-4 2024 年 5 月中國對臺軍事演習示意圖(5 月 23 日).....	68
圖 3-5 2024 年 10 月中國對臺軍事演習示意圖	70
圖 3-6 2024 年 12 月中國對臺軍事演習示意圖(12 月 9 日至 12 月 11 日).....	72
圖 3-7 2025 年 4 月中國對臺軍事演習示意圖(4 月 1 日).....	73
圖 3-8 近年日本軍費變動趨勢	85



表次

表 1-1 本文用以探討理論的 11 個案例.....	20
表 1-2 國際沉沒成本的 4 種因果機制	22
表 3-1 中國軍事投射能力不足的 5 個案例	50
表 3-2 1995 至 2000 年間中國軍事投射能力狀況	51
表 3-3 中國軍事投射能力足夠的 6 個案例	57
表 3-4 2019 至 2024 年間中國海軍軍事投射能力變化	58
表 3-5 2019 至 2024 年間中國空軍軍事投射能力變化	59
表 3-6 2021 年 3 月至 2023 年 6 月美中部長級以上官員接觸情況	61
表 3-7 本文 11 個案例的信號強度排序.....	74



第一章 緒論：研究動機與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2022 年以來，中國多次在涉及美中臺三邊關係的重大事件後，對臺灣發動大型軍事演習，以表達其反對臺獨，又或者是反對美國容許臺灣倚美謀獨的立場與決心。這樣的狀況相當符合昂貴信號(costly signal)理論，也就是一個國家對一個特定事件或政策有強烈的決心，並有意讓對手國家明確地理解該強烈決心的真實性，因此刻意以具高昂成本的作為來向對手國發送信號，以此和不具強烈決心的國家做出區別。然而，中國對臺發動的軍事演習卻有超出既有理論內涵的情況。

歷次中國發動的軍事演習規模與影響程度存在明顯的區別，其中又以部分軍演會進入到日本所認定的專屬經濟區與防空識別區最為特別。直觀上，中國對臺軍事演習理應是針對臺灣，即使是要應對美國容許臺灣倚美謀獨，也應該是要針對美國做出軍事反應，而不是針對日本。實務上，軍事演習是高度縝密規劃及執行下的軍事行動，演習期間的所有作為都是軍方高層授意與籌劃的，因此中國海空軍單位在對臺軍事演習期間進入日本所屬海空域，實際上是中國的刻意作為。

中國針對臺灣及美國表達其決心的軍事行動，為何要影響日本呢？昂貴信號理論文獻並沒有提供這個答案。既有昂貴信號理論的討論及驗證主要是環繞昂貴信號的成本及觸發時間，以及這些信號類型的解釋能力與適用條件，且主要是探討兩國之間直接的昂貴信號，大多是存在於信號發送國「國內」的成本。雖然曾有文

獻探討到兩國之間透過第三國傳遞昂貴信號(Cebul, 2023)，但其機制仍然是國家將其「國內」的聽眾成本真實情況，透過第三國向對手國家透露，因此也無法解釋中國對臺軍事演習涉及日本的原因。



另一方面，中國在他國周邊海空域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亦可以被認為是挑釁 (provocation)，但當前挑釁理論文獻所指出的邏輯卻與昂貴信號存在矛盾。昂貴信號的目的是國家要讓對手國理解其強烈決心而讓步，但挑釁行為本身卻會激起對象國的抵抗與報復決心(Dafoe, Hatz & Zhang, 2021)，進而更不可能進行讓步。也就是說，中國對臺發動軍事演習且同時影響日本，是當前國際關係的昂貴信號及挑釁理論仍無法解釋的。

進一步來說，單純就挑釁所造成的結果來看，只要受挑釁國和信號接受國不同，受挑釁國加強抵抗與報復決心實際上符合昂貴信號的沉沒成本(sunk cost)機制，信號發送國造成昂貴成本。這種信號是國家在發動軍事挑釁本身就具「國內」沉沒成本的情況下，額外加上的「國際」沉沒成本。然而，這種在「國際上」「加強信號」的機制在既有的文獻中仍未被探索。

針對這些理論空白之處，本文擬先重新回顧昂貴信號與挑釁的理論內涵，從中探索出過去未曾討論的昂貴信號機制，並建構類型以區分不同原因所造成的行為差異，再以中國歷年來在出現美中臺三邊關係的重大事件時的軍事反應為例，以此驗證本文提出的理論假說。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依照前述的研究動機，本文研究目的有二。案例部分，檢視中國發動對臺軍演


的原因，及審視中國針對不同事件所進行的軍事行動規模及影響差異。理論部分，根據案例中所發現中國對臺軍事演習的特別現象，檢視當前昂貴信號理論架構中被忽略的概念，並釐清國家透過第三國向對手國家傳遞信號的邏輯和機制。

基此，本文有 3 個研究問題。第一，中國為何對臺發動軍事演習且會選擇性地影響日本呢？這能解答中國針對歷次美中臺三邊事件有不同回應的考量。第二，國家為何透過國際沉沒成本來向對手國展示強烈決心？這涉及昂貴信號的核心概念，也就是其存在是因為國家之間存在欺瞞和溝通問題，需要高昂的成本來展現決心，而此部分的探討可能得以進一步擴大理論的解釋範疇。第三，國家如何發送國際沉沒成本？這得以回答及解決昂貴信號和挑釁之間矛盾之處，也就是在何種情況下挑釁和昂貴信號的邏輯是相符的，並能解釋國家透過第三國加強信號的行為。

第二節 主要概念與變數界定

一、昂貴信號與挑釁

昂貴信號的邏輯是，國家為了達到政策目標，透過特定的行為向其他國家傳遞其決心，使其他國家退讓。Robert Jervis (1970) 將「信號」(signal) 定義為向接收者投射期望形象(image)的言辭或行為。然而，Fearon (1994) 和 Weinberger (2003) 指出，國家即使公開發表關於其偏好的聲明，仍存在偽裝(dissemble)的誘因，以便獲得更有利的條件。Fearon (1997) 認為，此困境存在是因為其他國家無法直接觀察到信號發送者的偏好，且其他國家知道信號發送者有動機假裝具有「決心」(resolve)；因此，困境的解決關鍵是如何讓其他國家理解信號發送國的決心而非虛張聲勢，其解決辦法就是「昂貴信號」(costly signals)。



Fearon (1997)所提出 2 種昂貴信號的類型，至今仍是文獻的主要探討焦點或基礎。第一種是綁手信號(tying hands signal)，是指當發起者違背原先宣示或行為而讓步時須承受的成本，但若沒有讓步則不會產生任何成本；產生的機制通常是國內政治觀眾認為領導層在外交政策管理中失敗所衍生的代價。第二種是沉沒成本信號(sunk-cost signals)，指國家採取的行動本身代價高昂，但並不影響在面對挑戰時戰鬥與退讓的相對價值；無論結果如何，提升軍備或動員部隊都會產生成本，但它們也可能影響國家在挑戰面前選擇戰鬥還是退讓的預期價值。也就是說，昂貴信號是當信號發送者在發出信號時，或在未來實際不執行威脅時，存在雖然不願但必須承擔的成本，目的是要讓信號因此變得可信；為了使得決心具有可信度，此信號必須帶有一定的成本或風險，是未下決心的國家無法輕易發出的威脅。

Weisiger 與 Yarhi-Milo (2015)將「決心」(resolve)定義為國家為了實現其目標，願意承擔戰爭風險的程度，依賴於對涉及的利益和戰鬥成本的評價；有強烈決心的國家更願意承擔戰爭成本，以實現政治爭端中的目標。Weinberger (2003)進一步指出，除了信號的成本需要夠高以外，成本必須對國內外預期的觀眾是可以知悉的；若觀眾未能理解這些成本的「價值」，則這些成本將不具信號效果。

這引申出昂貴信號的強度問題，也就是同一種信號中的決心呈現強弱的問題，而非各種信號種類之間的解釋能力差異。Cebul (2023)認為國家可以增強觀眾成本可見性來強化信號，並指出知情的第三國可以幫助國家讓對手國清楚地理解其觀眾成本，因為單邊發出觀眾成本信號會有困難，例如外交關係緊張可能會妨礙雙邊訊息溝通、理性的對手可能會將信號視為自利的虛張聲勢。除此之外，同樣是外交訪問也存在信號強弱的差別。McManus (2018)指出，領導人專屬信號具有綁手功能，因為該作為會為領導人造成國內聽眾成本，且因為大量隨行人員數量及規劃複雜而具有一定的沉沒成本。同時，McManus 與 Sendinc (2024)指出，其他內閣等級以



上的資深官員外交訪問，是比領導人訪問更為較小的信號，因為其產生的綁手成本較低，且這些官員的時間不比領導人的時間珍貴，沉沒成本也因此較低。

信號的公開性也屬於信號強度的一環。Carson 與 Yarhi-Milo (2017)指出，過去文獻甚少探討國家是否以及如何通過隱蔽行動傳達意圖，並指出既有理論觀點認為其他國家會從隱蔽行動中思索弱點而非決心，因為其直觀上不承擔國內或國際聲譽風險，也就是說隱蔽行動所傳遞的決心程度會不如公開行動。然而，Carson 與 Yarhi-Milo 認為隱蔽行動亦具有昂貴信號效果，並界定隱蔽行動(covert action)為政府在其領土之外進行的政策行動，且未經官方承認，大多數觀察對象無法知悉或無法將其歸因於行動者；和直觀性的認知不同的是，Carson 與 Yarhi-Milo 認為隱蔽行動很少是完全秘密的，其執行會被當地國和對手國的政府知悉。隱蔽行動的成本有至少 3 種；其一是來自高昂的沉沒成本，因為隱蔽行動需要迂迴的計劃而使成本比一般行動更高；其二是向外國展現願意承擔更高的國內風險，因為隱蔽行動在國內具有曝光後被責難的政治風險；其三是反升級風險(counter-escalation risks)，因為其他國家通常會以「可能升級為嚴重對抗的方式」對隱蔽行動做出反應。

隨後，非公開行動的討論，開始著重在避免刺激對手國家的國內聽眾成本，以免對手國家即使知悉信號發送國的強烈決心，仍因顧及國內聽眾成本而無法退讓。最初，McManus 與 Yarhi-Milo (2017)根據不同高調程度的信號來提出前臺(frontstage)與後臺(backstage/offstage)信號，但主要探討信號發送國為避免觸發本國民眾反制所採取的低調信號發送作為。其後，Qi 與 Li (2023)指出，美國與中國在西太平洋的諸多針對彼此的軍事行動本身即具有昂貴信號效果，但如果美軍軍事行動受到諸多報導，中國媒體報導也會相應增加，從而提高中國的國內觀眾成本，這會使得中國在回應美國強硬立場時難以選擇退讓。因此，美國的軍事信號會轉為後臺信號來避免受到媒體關注，以達到迫使中國退讓的目的。同樣的，Chao 與 Cho


(2023)指出，使用具有高度隱蔽性的水下軍事載臺可以進行後臺的昂貴信號傳遞，且因為目標國家不致於產生觀眾成本而有退讓空間，進而使得信號發送國可能達到目標。



從非公開行動近期的探討中可以發現，避免「信號接受國的反抗程度與退讓難度」是昂貴信號的探討方向，而這也正是當前國際關係的挑釁(provocation)概念所探討的。挑釁(provocation)的邏輯是，國家的威脅和暴力會導致其他國家抵抗與報復的決心提升。Dafoe、Hatz 與 Zhang (2021)指出，挑釁是國家認為是故意且錯誤地挑戰侵犯其價值與目標的行為，且從而引發憤怒反應，促使倉促、攻擊性的反應。挑釁通常是脅迫(coercion)手段連帶而來，雖然脅迫的威脅與武力展示會增加目標的實際和預期抵抗成本，從而削弱目標的決心或抵抗的意志，但也屬於挑釁行為，會增強目標的決心並在某些情況下導致更強的抵抗和報復。此外，Cho、Haynes 與 Yoder (2024)指出，挑釁性(provocativeness)取決於國家的認知，關鍵不是國家的榮譽是否受到挑戰，而是國家是否將其視為挑戰。

本文認為，雖然昂貴信號與挑釁的邏輯乍看之下矛盾，但宜將挑釁視為昂貴信號的機制之一，因為挑釁會導致受脅迫國的抵抗和報復決心，這對脅迫發起國來說實際上是一種成本，例如受脅迫國將採取軍事或外交反制作為，使得脅迫發起國，也就是昂貴信號的發送國，面臨更大的外交壓力或軍事威脅，而需要再使用更多資源來應對這些變化。基此，本文將激起挑釁的脅迫作為視為昂貴信號的呈現類型。需要說明的是，挑釁作為昂貴信號的機制的條件是，預期的信號接受國和受挑釁國是不同的，這會使得信號發送國在進行挑釁行為而承受昂貴成本的情況下，信號接受國得因此知曉信號發送國的決心而進行退讓。

此外，本文認為挑釁行為也屬於既有文獻的「加強信號」情形。脅迫行為的載



體本身可能是大型軍事演習，本身就因為涉及高昂的「國內」沉沒成本，例如軍方投入資源及調動部隊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因此屬於昂貴信號。而對他國的脅迫行為在此之外產生的挑釁狀況，實際上具有「加強信號」的效果。這使得昂貴信號同時具有「國內」和「國際」的沉沒成本。


而「加強信號」的原因，很可能是基於信號發送國與信號接受國之間存在訊息溝通不佳的情形。回顧昂貴信號的邏輯，是因為國家之間的訊息溝通困難，存在欺瞞意圖的可能性，使得國家必須透過高昂成本的行為來展示其決心。而既有昂貴信號不足而須「加強信號」，就很可能是出現在信號發送國與信號接受國之間的訊息溝通處於不佳時期，例如兩國因為重大外交或軍事事務而相互責難、兩國政府重要官員停止互訪與交流等，因為這些時期的訊息溝通比平時更為困難。

二、變數的設計與測量

本文根據上述概念，以軍事演習作為昂貴信號，並建立變數來探討涉及第三國的國際沉沒成本機制，以及其加強信號的邏輯。

要說明的是，本文要探討的昂貴信號機制有二。第一種機制是一般型昂貴信號，信號發送國直接發送，決心的展現是在信號發送國發動軍事演習本身的國內沉沒成本；第二種機制是加強型昂貴信號，信號發送國透過創造挑釁第三國來間接發送，決心的展現是信號發送國挑釁第三國後須應對其反制作為的國際沉沒成本，其具體機制是信號發送國挑釁並激起第三國退讓的聽眾成本，從而迫使第三國做出反制，這使得信號發送國須應對國際情勢的惡化。

本文的信號發送國為中國，信號接受國為美國，而第三國為日本。軍事演習是




「對臺灣的軍事演習」但也是針對美國的行動，因為中國認為臺灣的臺獨傾向及臺灣倚美謀獨是在美國沒有制止，又甚至是默許下發生的。這是為何近年美中政府高層會面的會後新聞稿，中國都會提及臺灣問題，甚至是強調臺灣問題在美中關係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北京當局對中華民國總統的臺獨傾向定性下，能控制或避免臺灣走向獨立的關鍵即為華府。因此，本文探討的信號傳遞機制是介於中國與美國之間，而第三國則是日本。

(一) 自變數

本文根據昂貴信號既有文獻指出的兩個核心概念，也就是國家要確保決心得以正確地被對方國家所知、國家要確保信號能夠彰顯決心，來界定兩個自變數 (independent variable) 會影響國家是否發動昂貴信號，以及是否加強信號。

第一個自變數是，信號發送國與信號接受國之間的訊息溝通情況是否不佳。根據前述昂貴信號與挑釁概念的界定，當信號發送國與信號接受國之間存在訊息溝通不良情況時，信號發送國會加強信號的強度，以使信號接受國能明確知悉其強烈決心。外交互動形式大致可以分為「訪問對方國家」、「在第三國實體會談」、「遠端視訊或通話進行會談」。然而，根據昂貴信號的邏輯，是因為國家之間的信任不足而須以特別昂貴的成本來顯示本國的決心；上述3類互動形式中，部長級官員「訪問對方國家」理應是在兩國重大議題合作上有進展的情況下會發生的，這也意味著兩國有實質、密切的互動，並具有一定的信任基礎；若兩國的部長級官員沒有「訪問對方國家」，而僅是「在第三國實體會談」或「遠端視訊或通話進行會談」，代表著兩國的重大議題合作沒有進展，甚至是合作中斷，連帶兩國之間沒有實質且密切的互動，更缺少信任基礎。



因此，訊息溝通不佳的測量指標是，兩國部長級以上官員是否停止公開訪問對方國家。若指標符合，則代表兩國之間訊息溝通情況不佳，若指標未符合則代表兩國之間訊息溝通狀況正常。具體適用在本文中，指標是美中兩國部長級以上官員 6 個月內未公開訪問對方國家。

第二個自變數是，信號發送國針對受脅迫國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的軍事投射能力足夠與否。同樣根據文獻中的決心概念，雖然信號發送國有意發送信號或加強信號，但若要使用軍事演習或軍事行動作為昂貴信號，也必須要有能力進行，否則展現的軍事能力不足時，很可能會被信號接受國認為是決心不足。

要說明的是，既有文獻大多指出，昂貴信號的目的是讓對手國家知悉本國的政策決心，也就是為此爆發衝突或戰爭的決心，以使得對手國家妥協或退讓。因此，本文所謂的「有能力」發送信號是指，信號發送國要有實質的「軍事投射能力」，也就是具有發動軍事衝突和戰爭，且不會一面倒的敗給對手國家的能力，這樣才會讓對手國認為昂貴信號是可信的(credible)。如果實質的「軍事投射能力」不足，對手國家反而會認為不具有實質軍事威脅，認為信號發送國僅是在作秀，進而可能低估信號發送國的決心程度。

既有國關理論文獻已有探討「軍事投射能力」，這包含以軍事基地數量、海軍軍艦噸位數、飛彈數量等作為定義(Crisher & Souva, 2014; Markowitz & Fariss, 2018; Sechser, 2018; Alim, 2022; Kim, 2025)。然而，至今的討論有兩個問題。第一，操作化程度低，也就是沒有具體測量到國家的實質軍事投射能力。第二，與實際狀況脫節，因為既有文獻並沒有探討雙邊軍力對比下的投射可行性，但軍方真正考量投射能力時會評估敵情狀況下的兵力投射可行性(Caverley & Dombrowski, 2020; Erickson, 2014; Speller, 2006)。戰爭確實是一個二元對立的狀態，也就是即使有第




三國參戰，也是進入到二元中的其中一邊，所以探討雙邊軍力對比的投射可行性，確實可以涵蓋國際關係理論探討的戰爭或衝突情境。

要承認的是，每個時代的軍事投射科技與戰場環境會有所不同，因此關鍵是如何界定一個具通則性的操作化標準及二元兵力對比的邏輯。最低基本要求的軍事投射能力，是對手沒有完整的制空權和制海權，確保自身的陸海空兵力可能投射到、存在於一特定區域。

具體而言，本文聚焦案例所處西太平洋最為關鍵的海空軍主要兵力，也就是軍艦和戰鬥機的作戰能力，考量有二。第一，即使有許多其他的武器裝備，這兩類武器仍是各國政府當前最看重的軍事能力，也是軍事科技研發的重點。其他裝備，例如飛彈，雖然在整體軍事實力中仍扮演重要角色，但仍未取代軍艦和戰鬥機的主要地位，且軍事投射能力的關鍵是要兵力可以投射到、存在於該區域，其他軍事裝備並不獨立的具有這類功能。第二，其他裝備的資料透明度及數據可比性不足，難以具體分析，且同時也可以在二元兵力對比時，以合理的假設來帶入軍力投射能力的考量中。

應對既有軍力投射能力探討的不足，本文提出兩種設計來測量。第一，通則性的操作化標準部分，以當時軍事實力最強國家的軍事科技為準。例如，在 1990 至 2020 年代之間中國與西太平洋其他國家對峙的情境下，應以美國海軍與空軍的軍事科技為準，探討實質軍事投射能力。也就是說，探討各國海軍具有相位陣列雷達軍艦上所有的垂直發射系統的相對數量，以及空軍第四代或第五代戰機的相對數量。

第二，二元兵力對比的部分，應以潛在衝突的兩方的兵力進行對比，評估其中



一方的軍事投射條件，並且分為劣勢明顯、無明顯劣勢等兩種類型。只分兩類是為了要確保可行性及通則性。其一，因為各國之間的軍事裝備發展多屬最高機密，因此公開資訊很可能和實際情況有些落差，因此測量上不宜也無須精確分為多個等級。其二，戰場中的戰爭迷霧和意外狀況很可能會影響戰事的進行，甚至是戰場指揮官的戰術指令均有影響。為排除前述兩種情況干擾，宜著重於一方是否處於「明顯劣勢」。更具體的說，不以「優勢」為標準的原因是，軍力投射屬於主動型作為；軍方在優勢時可能為求謹慎而無作為，但在明顯劣勢時則不可能進行軍力投射此種必然犧牲的舉措。

海空軍兵力是各國政府主要考量的軍事投射兵力類型，因此若某方存在明顯劣勢，會被認定不具有投射可行性；然而，若無明顯劣勢時，則會被認為具有投射可行性。此外，雖然其他裝備可能影響兵力投射，但若考量各方為軍事大國、先進的海空軍兵力實力相當，其他裝備的實力不至於有明顯差距，因此若雙方主要比較的海空軍兵力無明顯優劣勢情形，其他裝備亦可假定無明顯優劣勢。

除此之外，本文提出的軍事投射能力標準有助於精準掌握各國軍事投射能力的實際變化。軍事投射能力不是一個單向發展的趨勢，而是有可能會因雙方軍事能力發展的消長，而使得實際的軍事投射能力有所變化。

基此，本文為確認信號發送國的昂貴信號能被信號接受國感到是可信的，也就是信號發送國實際對信號接受國發動軍事衝突或戰爭的能力，使昂貴信號會被信號接受國認為具有真實的軍事威脅和戰爭可能性而相信昂貴信號，故設計的投射能力的指標有二，其一是具有符合當時最先進的軍艦和戰鬥機，其二是這些裝備數量必須至少與對手國家相當。也就是說，軍事投射能力的評估是計算信號發送國及對手國家之間，具有相當技術水準的裝備數量。若兩項指標同時符合，則代表信號


發送國的軍事投射能力足夠，若指標未同時符合，則代表軍事投射能力不足。

具體適用在本文中，指標一是中國有軍艦和戰鬥機符合美國最先進軍艦和戰鬥機的技術水準，指標二是前述中國的裝備數量對比臺灣、對比日本和駐日美軍總和，數量至少要相當。美軍僅考量駐日美軍的原因是，1990 至 2020 年代之間中國與日本對峙的情境，鑒於日本與美國具有同盟關係，應將平時直接涉及協防日本的駐日美軍列入中國與日本的兵力對比。雖然美軍在西太平洋有諸多駐軍，但實際上僅有駐日美軍是明確專注投入於協防日本的單位，其他單位如駐韓美軍或駐守關島的美軍很可能另有任務，平時和戰時不一定會投入日本戰事。因此在具體比較時，比較中國對比日本和駐日美軍的數量總和，以評估軍事投射能力。

綜上所述，本文設計的兩項自變數係依照昂貴信號核心概念，也就是根據「國家要確保其決心正確地被對方國家所知」來設計測量國家間訊息溝通狀況的變數，以觀察國家間是否有溝通不良的情形，以及根據「國家要確保信號能夠彰顯決心」來設計實際軍事投射能力的變數，檢視國家是否在具有發動戰爭的能力，以此評估國家是否有能力發送具有可信度的昂貴信號。

(二) 依變數

本文將信號強度作為依變數，並設定 4 種信號強度的指標。從信號強度最弱到最強，依序是無軍事演習、短暫軍事演習、多日軍事演習、軍事演習且波及第三國。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指的軍事演習，僅限於信號發送國政府有公開宣佈者，例如發布演習名稱或劃設海空域管制區等，因為一般來說軍事演習的規模大小與時間長短並沒有統一的規定，以此避免認定問題。



本文要測量的加強型昂貴信號關鍵在軍事演習期間是否波及第三國，具體指標是解放軍在對臺軍演期間，海軍、空軍、火箭軍的兵力是否進入到日本所認定的專屬經濟區、防空識別區、鄰接區或領海。這會造成的結果是，中國的軍事演習具有挑釁日本的效果，這將導致日本加強軍備來應對中國，甚至加強外交上制衡中國的舉措，導致中國面對的周邊軍事威脅和外交壓力有所提升。

此外，本文根據中國對臺軍事演習的狀況，界定軍事演習以 5 天作為分界，持續未達 5 天則為「短暫軍事演習」、5 天以上則為「多日軍事演習」。區分短暫及多日為依變數的測量標準之一，是因為越多日的軍事演習，國家就得付出越多的資源，而此正式昂貴信號核心的概念，也就是國家付出成本來證明其決心。本文從此核心概念衍伸，設定付出越多資源則信號越昂貴，能代表的決心更顯著。

以 5 天為標準的邏輯是，雖然解放軍空軍基本上從東部戰區的任一空軍機場都可在數小時內抵達臺灣或日本周邊，但解放軍海軍的主力驅逐艦與巡防艦大多停泊於東部戰區位於浙江省舟山市的海軍基地、自南部戰區位於廣東省湛江市與海南省三亞市的海軍基地(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25)；這些海軍軍艦從母港來回臺灣或日本周邊海域，都會需要約半天到一天的時間，這意味著在臺灣或日本周邊軍演 5 天就等同這些軍艦出港將近一週時間，這對人員輪值、後勤補給與裝備保養都具有高度挑戰，所需付出的軍事支出與成本會高於一般狀況，因此將 5 天為界來區分中國對臺軍事演習的時間規模。

要說明的是，本文不以投入軍事演習的兵力大小作為信號強度的標準，是因為昂貴信號的基本假設是在各國不希望發生戰爭的情況下，如何以高昂的成本來向對手展現政策決心，進而使對手國家退讓，避免不得以發動戰爭，而軍事演習若動員的兵力過大恐使對手國家誤認係欲實際發動戰爭而非發送信號，恐導致行為遭

到誤判。因此國家在發送昂貴信號時的軍事演習的兵力規模應會有所節制，進而影響測量到的信號強度變化，故不適合以兵力規模做為信號強度測量基準。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的方法包含案例研究與類型學。案例研究部分，本文採用假說生成型案例研究(hypothesis-generating case studies)。Lijphart (1971)指出，假說生成型案例研究通常從模糊的問題出發，並嘗試提出具體的假說，並將其在大範圍的案例中進行檢驗，目標是在尚未存在理論的領域中發展通則理論。Levy (2008)則指出，假說生成案例研究旨在超越既有數據並進行通則化，但與 Lijphart 強調的不同，可以是檢視一個或多個案例，重點是發展具有普遍性的理論命題。

至於如何提出假說，演繹法或歸納法均可以被接受，也比量化方法彈性。Bennett (2004)認為 Lijphart 的生成型案例就是啟發性地(heuristic)辨識新的變數與假設，可以通過研究偏差案例(deviant cases)來實現，也可以在日常的田野調查過程中發生，且觀察結果是理論所指導的(theory-laden)，而不一定是理論決定的(theory-determined)；同時，即使是未涉及檔案工作或訪談來測量或編碼變數的研究，仍能藉由演繹推理(deductive theorizing)來找出新的變數。George 與 Bennett (2005)則指出，案例研究的一項優勢在於其啟發性功能，得藉由歸納法(inductive reasoning)來找出額外的變數並產生假說，這是量化方法難以做到的；此外，案例研究能夠分析具有質性複雜性的事件，並納入大量變數，亦不受限於那些能輕易量化的變數，或那些已經存在明確定義的數據。




除此之外，Gerring (2016)指出假說生成案例的假說建構相當重要，尤其許多案例研究的內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問題源自於沒有明確的假說；如果研究者從一個模糊的研究問題或不夠明確的假說開始，就很難確定最合適的案例來探索這個問題或假說，也就是理論上的模糊性會妨礙案例選擇。因此即使是探索性地尋找新的變數，仍然會需要具體明確的假說，才有可能具有普遍性的理論。

類型學部分，本文以達到類型學理論(typology theory)的標準進行，而非僅止於「類型」(typology)的建構。理想情況下，類型是互斥且具備完全性，即現象的每一個案例都能歸入一個類型，且僅能歸入一個類型，類型設計旨在最小化類型內的變異，並最大化類型之間的變異；類型學的優點包括能夠在不過度簡化的情況下處理複雜現象，澄清案例之間的相似性與差異，以促進比較，提供所有可能案例種類的全面清單，納入交互作用效應，並引起對「空格」(empty cells)或未發生且或許無法發生的案例類型的注意(George & Bennett, 2005)。

此外，Gerring (2012)指出類型學至少要包含 4 種元素。第一是概括性(generalizing)，即它們明確指向一類事件，可能大於研究樣本，也可能不大於。第二是多維度(multi-dimensional)，是指組成部分或各單位元特徵的描述性論證是關聯性(associational)的。第三是集合(grouping)，將不同的維度置於同一個類別(category)中。第四是，要是多類別(Multiple categories)的，而不是只有單一類別。

在實踐中，類型學應注意以下標準。首先，並非所有案例對理論的啟發作用都是相同的，一個關鍵或接近關鍵的案例可以強有力地支援或削弱一個理論。其次，優秀的案例研究者應該謹慎，避免過度概括他們的結論或聲稱已發現所有可能的因果路徑；尋找代表先前未記錄的因果路徑案例一直是案例研究者的首要任務。第三，在給定研究中的許多屬性空間可以被排除為不太可能或無啟發性的。第四，使



用先前經過驗證的因果機制或社會理論來構建類型學框架，並結合過程追溯 (Process-tracing) 和其他案例內分析方法，可以加強那些僅依賴比較方法所需的推論。第五，區分兩種情況：一種是現存的歷史案例範圍不足以進行強有力的因果推論，另一種是研究者沒有足夠資源來研究所有可能具有啟發性的案例；在前者情況下，案例研究方法可能較弱，但可能是唯一可用的方法；在後者情況下，研究者可以將精力集中在屬性空間的一個子集上，即使只有少數案例，也能探索大多數感興趣的因果路徑，並可能通過增加對其他未檢視類型的迷你案例研究來測試和加強推論 (George & Bennett, 2005)。

若類型學建立的目的是要調整既有分類，Elman (2005) 指出有多種壓縮 (compression) 做法。第一，重新標度 (Rescaling)，指藉由降低屬性空間中一個或多個理論變數所代表的屬性數量，可以減少單元格的數量。第二，指數化 (Indexing)，當多個屬性「表達實質上相同的基本特徵或其效應朝相同方向發展」時，可以「對每個維度上的每個類別賦予一定的權重，並將這些權重加總以得到每個單元格的指數得分」。第三，邏輯壓縮 (Logical Compression)，當類型學的兩個或多個維度之間可能存在某種關聯，導致某些組合在邏輯上不可能或極不可能；若是如此就可以刪除這些單元格。第四，實證壓縮 (Empirical Compression)，當某些變數的組合在邏輯上是可能的，或不太不可能，但仍然可能沒有這些組合的實證範例。若如此，則可以從類型學中刪除這些單元格。第五，務實壓縮 (pragmatic compression)，指某些組合群體根據研究目的被縮合為一個類別。

此外，Elman (2005) 同時提出另一種面向的做法：擴展 (Expansion)。這個的作法是，將一個未充分規定的類型學，或是從其類型的子群體中推導出的類型學，透過「逆向工程」來提供一個完整的屬性空間描述。它的價值是，可以發現部分類型學中被忽略的重要屬性組合，並引起對需要進一步關注的案例的注意，甚至可以用

來揭示理論家使用突出「類型」和不同屬性群組的含義，或將形式化但縮減的類型學擴展回其完整的規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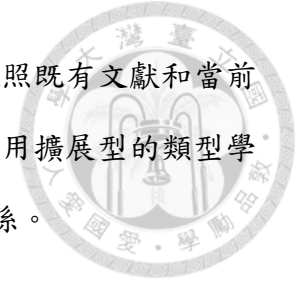


然而，上述仍未達到所謂「類型學理論」的標準。George 與 Bennett (2005)指出，類型學本身不會將自變數和依變數以因果關係連結起來，但若發現類型學規律性(typological regularity)，可以促使尋找潛在的理論解釋或類型學理論；George 與 Bennett 將類型學理論定義為一種理論，它指定自變數，將其劃分為研究者將測量的案例及其結果的類別，並不僅提供這些變數如何單獨運作的假設，還提供有關這些變數在特定結合或配置下如何以及在何種條件下行為的應變性概括，以對指定的依變數產生影響。

部分質性方法學者已有探索類型學理論，這些發展建立在早期有關類型學和「屬性空間」(property spaces)的文獻基礎上(Bennett & Elman, 2006)。Elman (2005)認為，類型學理論所組成的屬性是從一個既有理論的變數中提取出來的，而屬性空間的行與列即反映該理論獨立變數的不同值，因此空間中的每個單元格都與該理論的變數的預測值相關聯。

Bennett 與 Elman (2006)指出類型學理論的五種優點。第一，由於它們明確規定特定的變數聯結，有助於捕捉構型因果關係(configurative causation)。第二，使理論家能夠具體化在何種情境條件下相同的結果可能發生，即它們允許同一結果的多條道路(equifinality)。第三，對捕捉時間效應(temporal effects)非常有用。第四，類型學理論與案例研究和過程追蹤方法論高度互補。第五，關於理論檢驗，類型學有助於學者辨識單元之間因果同質性(causal homogeneity)的程度並進行反事實推理(counterfactual reasoning)。

綜上所述，本文將使用演繹型的假說生成型案例研究法，依照既有文獻和當前理論空白之處，建立假說來驗證新的變數關係；同時，本文將使用擴展型的類型學理論，探索尚無文獻探討的變數，並且為不同類型找出因果關係。




二、研究案例選擇邏輯

本文案例研究的目的首重探討中國在何種條件下會在涉及美中臺三邊關係的事件進行軍事回應，因此選擇中華民國總統入境美國、美國時任聯邦眾議院議長訪問臺灣、中華民國總統重要講話涉及北京當局的「一中原則」變動等 3 類涉及美中臺三邊，且可能使中國不滿其涉及臺獨或臺灣倚美謀獨的事件。

此外，本文為控制無關昂貴信號的干擾因數影響，本文在案例選擇上還有另外 3 種設定。其一，本文案例限於實際掌握軍權的中國領導人江澤民和習近平擔任總書記任內，以控制來自軍權不穩的干擾因素。因為昂貴信號的發送是假設國家為單一行為者，由最高領導人決定以具有高度成本的方式來向對手國家傳遞其強烈決心；若解放軍內部將領在未獲領導人同意下強行發動對臺軍演，又或者是刻意在細部軍事行動規劃中未經最高領導人授權下進入日本海空域，這並不屬於昂貴信號。因此，本文案例將限於江澤民與習近平擔任總書記任內的事件。

其二，在前項的基礎上，案例再僅限於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及賴清德任內，其中李登輝總統期間則限於 1994 至 2000 年。此目的是要控制中國對於不同政黨的臺灣領導人統獨傾向界定不同，而影響發動軍事演習的考量。要說明的是，李登輝總統期間係自 1994 年起開始探討的原因是，李登輝總統被認為是在 1993 年開始明顯出現兩岸政策的傾向改變，例如開始區分大陸地區和臺灣地區的中國人、不再使用復興基地此類詞彙，續在 1994 年接受訪問時頻頻提及「臺



灣人的悲哀」、國民黨過去的統治是外來政權等字眼，並於同年遭到新華社與中共中央電視臺同日首次的點名批評(馬紹章，2016：153-154；趙春山，2019：40-42)；這意味著 1994 年適合作為李登輝總統被中國視為具有臺獨傾向者的起始時間，受中國定調的統獨傾向與後來民進黨籍的總統們相仿。

其三，中國在 2015 年起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改革，為避免中國因為軍事改革而影響其發動聯合軍演的考量與能量，習近平任內期間再僅限於 2022 年起的時段。中國於 2015 年至 2016 年間開始一系列的國防和軍隊改革，其中包含作戰體系與指揮鏈的大幅度調整，並規劃是在 2020 年完成相關改革(新華網，2016)。其後，中國於 2019 年 7 月發布「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其中在「改革中的中國國防和軍隊」章節中詳細列舉改革項目，而該章節的「改革中」的字樣也意味著軍隊改革尚未完成(新華網，2019)。2020 年 11 月召開的中央軍委軍事訓練會議，是中國官方認為軍隊改革已達一定進展或目標的指標，因為習近平在該會中表示「我軍組織型態」等項目發生新變化，「軍事訓練進入了全方位改革的新階段」，要「加快構建新型軍事訓練體系」，這意味著軍隊改革已告一段落，而可以接續在新建制下進行新的訓練模式(新華網，2020)。因為指揮鏈與作戰系統的大幅度的調整，加上新建制仍須經過訓練才能確保對外軍事行動的執行與指揮的穩定性及安全性，解放軍很可能在 2021 年才能進行軍改後第一次新建制的完整年度訓練，在部隊指揮及聯合作戰行動上累積一定經驗，故將 2022 年作為解放軍 2015 年開始軍改之後具備境外大規模軍事演習能力之起始點較為適切。

根據上述 3 項選擇設定，時間限於 1994 年至 2002 年與 2022 年至 2025 年之間，共有 11 個案例，如表 1-1。中華民國總統入境美國共 5 個案例，包含李登輝總統 1995 年赴康乃爾大學演講與 1997 年過境夏威夷，陳水扁總統 2000 年過境加州、蔡英文總統 2023 年過境紐約與加州，以及賴清德總統 2024 年過境夏威夷。美

國時任聯邦眾議院議長訪問臺灣共 2 個案例，包含 1997 年時任議長金瑞契(Newt Gingrich)和 2022 年時任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問臺灣，並與時任李登輝總統及蔡英文總統會面。中華民國總統發表抵觸北京當局的「一個中國原則」政策講話部分，包含 1999 年李登輝總統提及特殊國與國關係，以及賴清德總統 2024 年就職演說、2024 年國慶演說和 2025 年 3 月 13 日的「五大國安統戰威脅及十七項因應策略」講話所提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互不隸屬」。

表 1-1 本文用以探討理論的 11 個案例

案例選擇	中華民國總統 入境美國	美國時任聯邦眾議院 議長訪問臺灣	臺總統講話涉及 「一中原則」變動
1994 年			
1995 年	6 月康乃爾演講		
1996 年			
1997 年	10 月過境夏威夷	4 月金瑞契訪臺	
1998 年			
1999 年			7 月德國之聲採訪
2000 年	8 月過境洛杉磯		
2001 年			
2002 年			
2022 年		8 月裴洛西訪臺	
2023 年	3 至 4 月過境紐約 與洛杉磯		
2024 年	11 至 12 月過境夏 威夷		5 月就職演說 、10 月國慶演說
2025 年			3 月國安會議記者會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 研究限制

理論面向的研究限制包含信號加強程度僅能以四分法探討。直觀上來說，信號加強程度應該是一個連續性的光譜，但本文因屬於案例研究且使用類型學理論，因此僅探討以 2 項自變數彼此交叉效果下的 4 種結果。鑒於本文係嘗試探索國際沉沒成本的機制與效果，更細緻地信號加強程度或待未來研究進一步探討。

案例面向的研究限制包含未能探討菲律賓作為中國的脅迫對象。菲律賓與日本均為美國盟友且地處臺灣周邊，中國對臺軍事演習活動區域和菲律賓也相當接近。但菲律賓政府沒有如日本政府，公佈中國對臺軍演期間解放軍在該國海空域活動的資料，因此本文無法深入將菲律賓做為案例分析中國的軍事脅迫行徑。此限制可能要待未來菲律賓政府或美國政府解密相關資料後，才能進一步的研究。

第四節 研究假說與研究架構

一、 類型建構

本文依照兩個自變數的交查結果的 4 種情形，建立二乘二的 4 類型因果關係如表 1-2。要說明的是，本文的昂貴信號機制分為一般型及加強型。一般型昂貴信號，是信號發送國發動軍事演習本身的國內沉沒成本；加強型昂貴信號，是信號發送國挑釁第三國後須應對其反制作為的國際沉沒成本，其機制是信號發送國挑釁並觸發第三國的國內聽眾成本，迫使第三國必須做出反制，這也使信號發送國須應對惡化的涉外情勢。

表 1-2 國際沉沒成本的 4 種因果機制

類型		IV1：訊息溝通情況	
		佳	差
IV2： 投射能力	不足	無需也無能力加強信號 DV:無軍演	需要但無能力加強信號 DV：多日軍演
	足夠	無需但有能力加強信號 DV：短暫軍演	需要且有能力加強信號 DV：多日軍演且波及第三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 1 種情形是信號發送國和接受國的訊息溝通狀況佳且發送國的軍事投射能力不足，發送國不發動軍事演習。機制是，訊息溝通狀況佳的情況下，信號發送國將認為信號接受國在近期或未來的會談中能清楚知悉其政策立場，也能在該過程中知悉接受國的相應立場。此外，發送國軍事投射能力不足，因此若貿然發動軍事能力與脅迫程度不足的軍事演習，將反而使信號接受國認為發送國的決心不足。在此情況下，信號發送國雖然可能仍會想要發送昂貴信號來強調其決心，但軍事能力不足而使得軍事演習無可行性，同時也因為訊息溝通狀況佳而無需加強信號來進一步強調其決心。

第 2 種情形是信號發送國和接受國的訊息溝通狀況差且發送國的軍事投射能力不足，發送國發動多日的軍事演習。機制是，訊息溝通狀況不佳的情況下，信號發送國近期預期沒有外交場合得讓資深官員對話、溝通政策立場，因此僅能以發送昂貴信號來傳遞決心。然而，因為信號發送國整體的軍事投射能力不足，為避免讓信號接受國認為發送國的決心不足，發送國必須仰賴少數軍事投射能力足夠的軍事裝備進行軍事演習，並且不能僅短暫進行，須進行多日以弭補綜合性軍事投射能力不足的窘境，同時因軍演時間拉長而負擔更多的軍事行動成本，進而確保信號接受國理解發送國的決心。在此情況下，信號發送國想要發送昂貴信號來強調其決心，甚至是因為訊息溝通狀況差而需要加強信號來進一步強調決心的強烈，但因為綜

合性軍事能力不足而僅能依靠少數裝備進行軍事演習，因此會發動多日而非短暫的軍事演習來展現決心；然而，因為綜合性軍事能力有限，發送國雖能發送信號來展現決心，但沒有加強信號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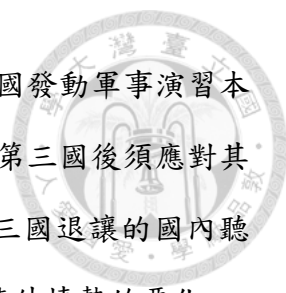


第 3 種情形是信號發送國和接受國的訊息溝通狀況佳且發送國的軍事投射能力足夠，發送國發動短暫的軍事演習。機制是，訊息溝通狀況佳的情況下，雙方具有合作存在而有較高的互信，又或者信號發送國與接收國能在近期或未來的會談中知悉彼此立場與決心。此外，信號發送國也具有軍事投射的能力。在此情況下，雖然信號發送國可能仍會發動軍事演習來宣示其決心，且有能力波及第三國，但因為已能夠過管道與信號接受國訊息溝通，無需加強信號，也無需透過多日軍演來確保決心的彰顯，因此會發動短暫的軍事演習而不會波及第三國。

第 4 種情形是信號發送國和接受國的訊息溝通狀況差且發送國的軍事投射能力足夠，發送國發動多日軍事演習並波及第三國。機制是，信號發送國與接收國近期無法也不預期將來能有效訊息溝通，因此只能透過昂貴信號方式來表達強烈決心；信號發送國也可能會考慮發送國與接收國關係不佳而恐使昂貴信號所欲傳遞的決心受雙邊關係齟齬而沖淡或低估，因此有需要加強信號程度來確保信號接收國明確知悉發送國的強烈決心。此外，信號發送國有足夠的軍事能力投射，因此可以發動軍事演習並產生脅迫效果。在此情況下，信號發送國需要且有能力加強信號，因此會發動多日軍演，並在軍演期間波及第三國來加強信號。

二、研究假說

本文根據理論探索上的 2 個研究問題，也就是國家為何與如何透過國際沉沒成本來向對手國展示強烈決心，發展出以下 3 類的 6 個假說。要再次說明的是，本



文要探討的昂貴信號有二。第一種一般型昂貴信號，是信號發送國發動軍事演習本身的國內沉沒成本；第二種加強型昂貴信號，是信號發送國挑釁第三國後須應對其反制作為的國際沉沒成本，其機制是信號發送國挑釁並激起第三國退讓的國內聽眾成本，從而迫使第三國做出反制，這使得信號發送國須應對涉外情勢的惡化。

第 1 類假說是檢驗加強信號的原因是否成立，本文的自變數界定為訊息溝通狀況是否不佳。若信號發送國與接受國訊息溝通狀況佳，信號發送國頂多發動短暫軍演展示決心，而無需透過多日軍演來加強決心的展現。反之，若兩國訊息溝通狀況差，則信號發送國將為了使接收國明確理解其強烈決心，因此會以多日軍演來加強信號。本文依照這 2 種情況來建立假說一和假說二。

假說一：若信號發送國與接收國訊息溝通狀況佳，信號發送國會進行短暫軍演或不發動軍演。

假說二：若信號發送國與接收國訊息溝通狀況差，信號發送國會進行多日軍演。

第 2 類是檢視能力對信號加強的影響是否成立，本文設定的自變數是軍事投射能力足夠與否。若軍事投射能力不足，信號發送國應避免發動規模不足的軍事演習，以免決心遭到低估；然而，若發送國與接受國的訊息溝通狀況差，發送國為避免決心遭到低估，反而會以有限的軍事投射能力發動多日軍事演習，以此展現其強烈的決心。若軍事投射能力足夠，且信號發送國與接受國的訊息溝通狀況差，發送國會發動多日軍演並波及第三國，以此展示其強烈決心。本文依照這 3 種情況來建立假說三、假說四和假說五。

假說三：在信號發送國與接受國訊息溝通狀況佳的情況下，若發送國軍事投射



力不足，發送國不會發動軍事演習。

假說四：在信號發送國與接受國訊息溝通狀況差的情況下，即使發送國軍事投射能力不足，仍會發動多日軍演，但不會波及第三國。

假說五：在信號發送國與接受國訊息溝通狀況差，且發送國軍事投射能力足夠時，發送國除了發動多日軍演外，還會在軍演期間波及第三國。

第 3 類則以昂貴信號的基本邏輯檢視加強信號的邏輯是否成立。昂貴信號的目的是透過高昂成本來展示決心；即使有能力，若無需展示決心，也沒有無故產生高昂成本的必要。本文依此情況建立假說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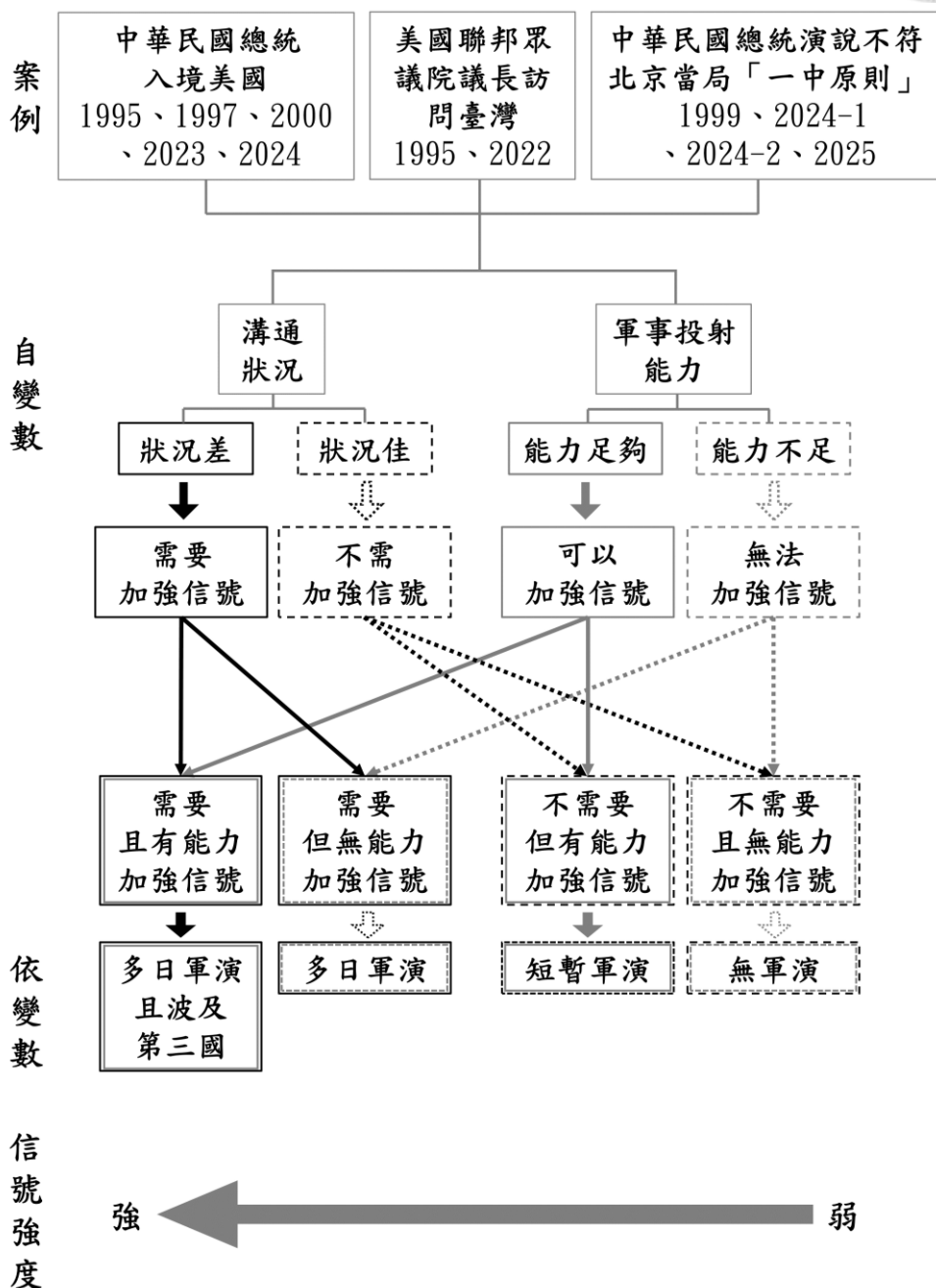
假說六：在發送國與接受國訊息溝通狀況佳時，即使發送國軍事投射能力足夠，也不會在軍演期間波及第三國。

三、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本文依照前述的案例選擇、自變數、依變數及自變數類型，整理本文研究架構如圖 1-1。要說明的是，本文擬將 11 個案例依照自變數類型進行分類並依序探討，以使檢證過程更為精簡扼要。基此，本文後續的章節安排依序為：第二章為文獻回顧，詳細檢視當前昂貴信號與挑釁的文獻的內涵與異同之處，以此帶出本文要檢證的國際沉沒成本及其加強昂貴信號的機制。第三章為案例研究，將探討無需也無能力加強信號、需要但無能力加強信號、無需但有能力加強信號，以及需要且有能力加強信號等 4 種類型的各個案例狀況。第四章為國家的昂貴信號加強作為，將以 4 種類型案例的狀況檢驗本文提出的 3 類的 6 項假說。第五章為結論，包含研究發現、研究不足之處及後續研究方向。



圖 1-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昂貴信號

一、 意涵

國際關係領域有關信號傳遞的學術研究，主要開始於 Jervis (1970) 的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一書，其將信號定義為向接收者投射期望形象 (image) 的言辭或行為。其後，James Fearon (1994, 1997) 提出「昂貴信號」 (costly signals) 的理論，這些文獻聚焦探討國家如何透過發送昂貴信號來表達在國際危機中的堅定立場，而非僅是「廉價談話」 (cheap talk)。最初，Fearon (1994: 578) 指出，戰爭的成本和風險使得國家擁有強烈的誘因，尋求雙方都願意接受的非軍事解決方案，而非進行戰鬥；直觀上，為了避免戰爭，國家領導人應該可以簡單地告訴對方他們願意接受什麼，而不是選擇開戰，然後選擇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協議。

然而，國家及其領導者無法單純透過請求而揭露其意圖與偏好 (preference)。當國家之間對彼此的決心和能力擁有完全資訊時，它們應該能夠在不訴諸武力的情況下解決分歧。但當資訊分佈不對稱，國家可能無法就互利的解決方案達成協議 (Sechser, 2024: 2)。即便國家公開發表關於其偏好的聲明，仍存在偽裝 (dissemble) 的誘因，以便獲得更有利的條件；鑒於這些誘因，外交交流可能無法提供有關國家偏好的有用信號 (Fearon, 1994: 578; Weinberger, 2003: 80)。由於領導人無法直接觀察彼此訴諸武力的意願，那該如何使武力威脅變得可信？簡而言之，這一困境的解決在於如何使真正下定決心的國家在威脅時，能夠說服目標國，這並非虛張聲勢 (Fearon, 1997: 69)。



國家嘗試解決這一困境的主要方式是通過發出「昂貴信號」(costly signals)來實現。當威脅方在發出威脅時承擔或創造一些發送者不願承擔或創造的成本，或在實際不願意執行威脅時，威脅可能因此變得可信。為了使被威脅者相信威脅者願意戰鬥的可能性，也就是要使威脅具有可信度，這一威脅必須帶有一些成本或風險，且要是未下決心的國家無法輕易發出的威脅。(Fearon, 1997: 69)

具體的說，Weisiger 與 Yarhi-Milo (2015: 475)將決心(resolve)定義為一個國家為了實現其目標，願意承受戰爭風險的程度；決心進而依賴對於利益和戰鬥成本的評價。有決心的行為者更願意承擔戰爭的成本，以實現政治爭端中的理想結果。因此，有決心是一種性格特徵，儘管它可以隨時間或議題變化。國家的決心是關於其是否願意冒戰爭風險的信號，但顯然對其對手至關重要，因為對手的要求將取決於他們對該國決心的信念。

除了展現決心外，還必須要達到與「無決心」者不同的程度。昂貴信號是要說服對方相信信號是可信的，其特點在於它們是相當昂貴，以至於未下決心的國家不會發出這些信號，甚至是無法模仿這類行為，而對手會評估每個信號，以更新對信號發送者類型的認知。昂貴信號有助於將可信型與不可信型區分開來；可信型會發出這些信號，而不可信型則會認為發出這些信號風險過高，而不發送此類信號。因此，要達到這樣的目的的關鍵就是信號必須具有足夠的成本，而成本或風險較小的姿態將被對方視為虛張聲勢(Kydd, 2000: 326; Slantchev, 2005: 533; Altman & Quek, 2024: 3; Cho & Chao, 2024: 157)。

除了成本需要夠高外，這些成本必須對國內或國際觀眾均是清晰可見。如果預期的觀眾未能理解這些成本的「價值」，則這些成本將失去意義(Weinberger, 2003: 87)。



二、 類型

自 1990 年代起，雖然學者們提出十幾種不同的昂貴信號，但多數的學者聚焦討論單一一種的昂貴信號內涵及影響，又或者只簡要的比較 2-3 種昂貴信號的差異，甚少通盤性地審視不同信號之間的異同。實際上他們的屬性(attribute)是有一定的共通性的，而也有學者曾經嘗試依照這些屬性歸納出他們的類型。

在 Fearon (1994: 579-581) 初始的昂貴信號研究中，他提出 3 個類別：物理成本 (physical costs)、與意外或先發制人戰爭風險相關的成本 (costs linked to the risk of accidental or preemptive war)，以及國際和國內觀眾成本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udience costs)。第一類物理成本，包括動員和部署部隊的財務和組織成本。動員的經濟負擔有時足夠大，能夠傳遞關於決心的資訊。第二類成本涉及危機升級所直接產生的戰爭風險。他引述 Thomas Schelling 的著名概念「留有某些機會的威脅」(the threat that leaves something to chance)，指出在核武危機中，至少升級或延遲可能會創造一種由於非領導人故意選擇所產生的戰爭風險，例如機械故障或未經授權的發射。若此類風險存在，那麼危機中的升級將是決心的昂貴信號，因為對爭議問題興趣較低的國家來說，冒險的價值較小。第三類成本涉及領導人關心的國際觀眾與國內觀眾，而國內觀眾成本可能是主要的。當領導人在展示武力後退讓時，通常對領導人最直接的成本是，國內政治對手藉此機會譴責其失去國際信譽。由於政府更可能因內部政治發展而被推翻或失去權威，而非因外國征服，且反對派團體經常將其活動與執政領導人在國際上成功與失敗掛鉤，因此國內觀眾可能為領導人提供最強烈的誘因，讓他們維護國家的國際聲譽。

其後，Quek (2021) 根據 James Fearon 在 1997 年提出的觀眾成本和沉沒成本所隱含的時間範圍和成本依賴性這兩個屬性，推導出分期成本 (Installment costs) 和可

減少成本(Reducible costs)這兩個過去沒有被系統性探討的「缺失的對角線」(the missing diagonal)。他指出，成本可能是事前或事後產出的，前者是已經發生之事，而後者是未來發生之事，並非危機或戰爭爆發後的事；此外，成本可能是有條件的或非條件的，前者可能在特定情況下觸發，後者則是無論如何必定發生。

本文綜合 Fearon 與 Quek 的類型，再加上過去學者曾探討過的個別昂貴訊號種類，嘗試詳細地探討更全面的昂貴信號的類型，依序為「成本時間」、「成本必然性」和「成本議題」；鑒於許多學者提出的昂貴信號同時存在多種屬性，因此在每種屬性的分類中，本文會就較具代表性的昂貴信號研究來進行說明。

(一) 信號成本支付的時間：當下或未來支付

1. 當下支付的成本

最初 Fearon (1997: 70)所提出的沉沒成本(sunk cost)就屬於這種類型。沉沒成本信號是國家採取的行動，這些行動本身代價高昂，但並不影響在面對挑戰時戰鬥與退讓的相對價值。無論結果如何，提升軍備或動員部隊都會產生成本。

Weiss (2013)指出，民族主義、反外國的街頭抗議代表一種昂貴信號機制，因為專制領導人可以藉此可信地表達公眾輿論的壓力，並揭示國內對外交政策的制約。該論點基於 2 個機制。首先，在專制國家中，民族主義抗議可能會失控，導致國內動盪並破壞外交關係。通過容忍民族主義抗議以及穩定的風險，政府展示其對該議題的重視程度，區別於關心較少的政府。其次，由於政府在抗議活動初期就遏制抗議，比在抗議蔓延後再加以鎮壓更容易，街頭抗議的升級也進一步鎖定並增強政府在外交上的不屈立場的可信度。因此，容忍反外國抗議使專制領導人能夠發出

堅定的信號，將其與那些對國際爭端關心較少的政府區別開來，並可信地承諾採取強硬的外交立場。



Quek (2021)提出的可減少成本(Reducible costs)也是事前支付的成本。該信號是未來可以根據信號發送者的行動來抵消的成本。這些成本是事前的，因為它們在發出信號時就支付，但又是**有條件的**，因為如果信號發送者履行其威脅或承諾，這些成本就可以被抵消。由於信號發送者可以在未來履行威脅的情況下抵消過去所產生的成本，因此這一威脅變得更加可信。

與可減少成本相似的是，Altman 與 Quek (2024)提出支付部分成本(downpaying costs)。這種成本定義為花費潛在戰爭的一部分成本來發送決心信號。這可以表現為在戰爭的第一階段作戰，以信號表明願意繼續戰鬥，但同樣也可以是包括動員、軍備擴張和經濟制裁等和平時期政策。這些和平時期政策通常會在危機談判期間發生，但國家即使在危機發生之前，也能進行支付部分成本。與沉沒成本(sunk costs)不同，支付部分成本會加強戰鬥的動機，因為剩餘的戰爭成本將因為支付的部分成本而減少。

2. 未來支付的成本

最經典的就是 Fearon (1997: 70)提出的綁手信號(tying hand signal)，是指當發起者違背原先宣示或行為而讓步時會承受的成本，但如果沒有讓步的發生，則不會產生任何成本。綁手信號通常透過創造「國內政治觀眾認為領導層在外交政策管理中失敗」的代價來發揮作用。例如，公開的聯盟承諾符合此描述，因為宣佈聯盟的行為將贊助國的可信度置於風險之中，並使違約的後果相比其他情況顯得更加不具吸引力。儘管口頭承諾本身並不昂貴，但贊助國若未能履行其聯盟承諾，將承擔



顯著的聲譽成本(Fuhrmann & Sechser, 2014: 922)。

Quek (2021)提出的分期成本(Installment costs)亦屬於事後會產生的固定成本。這些成本可以在短期或長期的未來一次性支付，或者以一系列分期付款的形式在確定或無限期的時間範圍內產生。這些成本是事後的，因為它們是在未來支付的，並且是必然發生的，即接收者不做出反應或挑戰，這些成本仍然會產生，這使它們與綁手成本不同。例如，美國在某個外國建立一個核武基地，以表明其捍衛該國的決心。建立基地的事前成本是沉沒成本；維護核基地的事後成本則是分期成本，這兩者具有不同的理論特性，並不應被混淆為一體。

(二) 信號成本的必然性：必然或或然

1. 必然支付的成本

Fearon 所提出的沉沒成本(sinking cost)就是經典類型。沉沒成本是國家採取的行動，這些行動本身通常伴隨著大量無法回收的資源支出，也就是高昂的成本，但並不影響在面對挑戰時，戰鬥與退讓的相對價值；沉沒成本在各種國際議題中均有出現，包含國際市場扭曲與經濟制裁，駐軍與武器部署海外，以及協調軍事聯盟與外交政策。(Carson & Yarhi-Milo, 2017: 133-134; Fearon, 1997: 70; Quek, 2016: 925)

Quek (2021)提出的分期成本也屬於這個類型，這類成本是將來會產生的固定成本。雖然這些成本是未來發生的，但他們必然發生。例如，美國自冷戰以來一直在幾個外國維持核武器。這些武器可以幫助傳達美國對捍衛這些國家的承諾，而為了維持這些武器，成本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在一段時間內持續產生。分期成本包括物質成本，例如美國必須支付基地維護、駐軍人員的費用。



2. 或然支付的成本

經典的綁手信號就屬於或然支付的成本，也就是在違背承諾時才會發生，這也意味著綁手信號可以做為昂貴信號的原因，它得彰顯信號發送者有維持承諾的誘因。(Fearon, 1997: 70)


Carson 和 Yarhi-Milo (2017)探討隱蔽行動做為一種昂貴信號，指出國內風險(Domestic Risks)是信號可信度的重要來源，他們代表「可能」因曝光衍生的政治成本。在面臨顯著的國內反對時，隱蔽行動允許領導人「向外國觀眾顯示」他們「比國內政治對手更加強硬且願意接受風險」。如現有的秘密性(secretcy)研究所示，國家經常使用秘密軍事活動，以避免國內的政治複雜性。即使在國內「約束」的情況下，觀察到一項新的或加劇的隱蔽行動，會清楚地顯示出信號發送國願意以有創意的方式行動，並承擔自己的國內風險來達成政策目標。額外的國內風險產生來自隱蔽行動的潛在曝光及實際曝光。非預期的曝光可能來自合作方的洩密，以及記者、非政府組織、不滿的官僚或其他發現該計劃的國家，而洩漏的隱蔽行動可能引發國內的政治反彈。

(三) 信號的議題面向：經濟、政治、外交、戰爭

既有昂貴信號文獻所探討的成本議題面向，可以分為經濟、政治、外交與戰爭等 4 類。

1. 經濟面向的成本

承擔高昂的財務成本被認為能增強承諾的可信度。Fearon (1994: 580)在探索昂



貴信號初期的研究中，就指出動員和部署部隊的財務和組織成本。動員的經濟負擔大到一定程度時，能夠彰顯出國家的決心。雖然這種信號的威力不如將人命置於危險之中那麼強烈，但投入國家財富進行某項行動確實是昂貴的。建造武器和動員部隊在事前都代表相當大的沉沒成本，這被認為能顯示對相關利益的承諾，因為這些成本在無論目標國是否退讓的情況下都必須且已經承擔，例如軍事動員的經濟負擔；而當這種成本很高時，可以成為國家具有決心的有用信號(Zegart, 2018: 16)。

2. 政治面向的成本

綁手信號就屬於政治面向的成本，其透過創造國內政治觀眾認為政府外交政策失敗的代價來發揮作用(Fearon, 1997: 70)。同時，綁手信號也不僅限於民主國家，專制國家也存在綁手信號。聽眾成本(audience costs)，即領袖因從公開威脅中退讓而遭受的國內懲罰，被認為能增加領袖在軍事危機中有效傳達其偏好的能力。這些聽眾成本通常被假設在民主國家較高，因為民主制度提高領導人因讓步而面對懲罰的可能性。因此，學者通常認為，民主國家在談判中較其他政體類型具有優勢，並且能作出可信的承諾。然而，傳統觀念低估非民主政權領袖的脆弱性；雖然專制政權中的小型群體，與能懲罰民主領袖的更廣泛的聽眾有所不同，但當專制精英有誘因協調來懲罰領袖，且國內政治穩定到外部觀察者能推測這一可能性時，專制政體中的精英是有能力罷黜專制領袖的。這些條件在許多專制政權中成立，而關鍵問題是政治是否足夠穩定，使外部觀察者能夠判斷領導人是否實際面對問責集團；外部觀察者並不需要瞭解專制精英的政策偏好，只要他們知道精英擁有必要時懲罰領袖的手段和動機即可(Weeks, 2008: 35-36, 43-44)。

除了外部觀察者的觀察可見度外，專制國家也可能主動地透過容忍民族主義抗議來創造政治成本。在專制國家中，民族主義抗議可能會失控，導致國內動盪並



破壞外交關係。藉由容忍民族主義抗議以及穩定的風險，專制政府展現其對該議題的決心，並與較少決心的國家有所區別(Weiss, 2013)。

3. 外交面向的成本

Fearon 最初提出的信號機制的 3 種類別中，其中一種就是包含國際觀眾的觀眾成本。雖然國際觀眾成本是基於國內聽眾成本的，也就是國內反對派團體經常將其活動與執政領導人在國際上成功與失敗掛鉤。這顯示，觀眾成本在國內激勵系統中扮演重要角色，這一系統鼓勵領導人在國際觀眾面前關注國家聲譽的現實主義考量(Fearon, 1994: 581)。

Weinberger (2003)則是提出相對獨立的外交成本，指出國際制度具有對國家施加成本的獨特能力，而可以做為判斷國家意圖的信號。因為制度可以創造行為標準，而這些標準可以用以評判國家的行為。制度能夠發送更可信的偏好(preference)資訊，因為它們揭示並影響國家的本質，包含其內部結構、政治安排和意圖。由於制度可以將其價值內化於成員國中，對於瞭解制度可能帶來成本的國家，只有當它認為該制度與自身利益相符時，才會加入這些制度；不利的規則、義務和規範制度化將會被拒絕，或在加入後不被遵守。

Weisiger 與 Yarhi-Milo (2015)又更進一步提出涉外行為本身的成本。他們提出決心的聲譽(reputation for resolve)，並將其定義為他人對該國是否願意冒戰爭風險的看法。由於言詞並不昂貴，這種聲譽主要取決於該國過去的行為。在一場爭端中退讓，會讓觀察者認為該國相較於戰鬥的成本，在爭議問題的決心反而較低，因此它在類似爭端中可能會做出讓步。因此，擁有較好堅定決心聲譽的國家，將被認為更可能在面對對手的要求時堅守立場，並在必要時作出反應。基此，若國家在爭議

中讓步，其聲譽會讓他國覺得未來也可能會讓步，進而使國家更可能在爭議中被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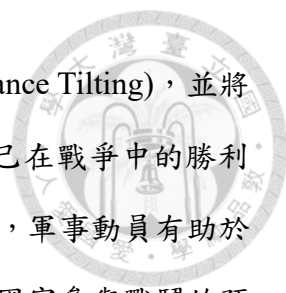


4. 戰爭面向的成本

Fearon (1994)最初提出的信號機制的3種類別中，其中一種就是危機升級所致的戰爭風險。如果此類風險存在，那麼危機中的升級將是決心的昂貴信號，因為對於對爭議問題興趣較低的國家來說冒險的價值較小，例如1914年俄羅斯的軍事動員屬於重要的信號，因為這一動員是在知悉此行為將導致德國發動先發制人戰爭情況下，所進行的軍事作為，意味著俄羅斯冒著危機升級與戰爭爆發的風險來表達其決心。然而，Fearon也承認，儘管意外戰爭的風險有其信號意義，但它很少成為升級爭端的主要成本(Fearon, 1994: 580)。

這個現象在探討隱蔽行動(covert action)的昂貴信號成本時也有出現，Carson與Yarhi-Milo (2017)指出其中包含反升級風險(Counter-Escalation Risks)。因為其他國家往往會以「可能升級為嚴重對峙的方式」對隱蔽行動做出反應，因此使用隱蔽行動來傳遞決心(resolve)也能因其「對危機升級風險的影響」而顯得可信。這個所謂的升級成本，就是可能會引發一個行動與反應的序列，從而加劇或擴大危機或戰爭。

同時，戰爭面向的成本不僅止於戰爭爆發的風險本身，還有因為軍備累積而衍生導致的戰爭爆發風險增加。Slantchev (2005)認為動員的主要作用不是承擔成本，而是通過提高獲勝機會來為戰鬥做準備。改善戰鬥前景會增加戰爭相對於和平的價值，因此可能具有綁手(hands-tying)的效果。無論是在改善防禦還是增強攻擊能力方面，都會影響戰鬥的預期回報；這可能會改變戰略環境，並可能改變到戰爭成為必要的程度。




Altman 與 Quek (2024)後來將這個現象界定為平衡傾斜(Balance Tilting)，並將其做為一種昂貴信號。這個現象是國家支付初始成本來提高自己在戰爭中的勝利機率，即將軍事平衡傾向於自己有利。然而，Sechser (2024)指出，軍事動員有助於提高爭端中獲勝的可能性，從而增加戰爭的預期效用，但在提高國家參與戰鬥的預期價值的同時，此類行動也增加其戰鬥的意願，並因此降低對手在戰爭中獲勝的可能性，從而減少該國參與戰鬥的價值。這些理論主要集中於那些能夠顯著改變當地權力平衡的軍事行動，而涉及權力平衡轉移的行動是有風險的，因為它們增加戰爭的動機並因此發出強烈的信號，並將有決心者與無決心者做出區分。

此外，Zegart (2018: 15-16)更指出「人命」是極具風險的成本，例如「觸發器部隊」(tripwire forces)曾是冷戰期間美國核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將部隊部署在前線或潛在交戰區的目的不是要贏得戰爭，反而是要顯示願意承擔這些部隊在地面戰爭中犧牲的決心，目的是向蘇聯和北約盟友發出信號，表明任何蘇聯的入侵都會造成大量美國軍人的死亡，這不可避免地會將美國及其核力量捲入戰爭，顯示美國在對歐洲的核保護傘覆蓋認真程度。

三、強度

前一部分討論的是什麼行為會具有信號的作用，而此處討論的信號強度，並不是既有文獻中比較不同信號種類彼此之間的解釋能力，而是在探討同一種信號中的決心呈現強弱的問題。也就是說，這不是探討哪個信號種類適合使用，而是同一種信號在什麼情況下可能有強弱的差別。


政府有遠見與否會影響同一國家行為的信號可信度。Haynes (2019)指出，擁有長期時間視野(time horizon)，也就是有遠見的國家，可能會降低違背其真實偏好的



即時成本，以誤導對方其未來意圖。這些具有遠見的國家將相對重視「有效誤導的長期利益」。相對地，沒有遠見的國家則會因為承擔誤導所帶來的短期成本而受到較大損失，並且低估成功欺騙的長期利益。因此，擁有較短時間視野的國家被認為更有可能誠實地發出其真實偏好的信號。

政府的運作情況也會影響國家對外發出信號的可信度。Bakich (2022) 提出「信號能力」(signaling capacity) 的理論，並指出信號能力包含 3 個不同但相互關聯的組成部分：情報組合多元化、外交與軍事整合，以及軍事戰略和計劃的靈活性。擁有高信號能力的國家，會有多元化的情報組合、緊密的外交-軍事整合以及靈活的軍事戰略和作戰計劃，在危機中能夠對決心有準確評估，且更有可信度地向對手國家發出信號。相反的，信號能力低的國家，也就是偏頗的情報組合、外交與軍事行為缺乏整合，以及僵化的軍事戰略和作戰計劃，會在危機中容易錯誤判斷對手的決心，無法結合可信的威脅和保證信號，且會在默示信號中犧牲軍事作戰的完整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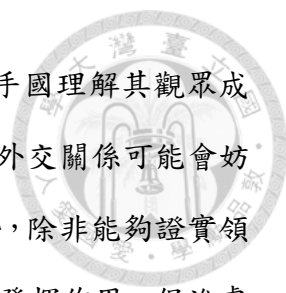
政府組織的透明度也會影響國家行為產生的信號可信度。Yoder 與 Spaniel (2022) 指出，當一個國家的決策過程相對透明時，單純未被觀察到的背叛行為(defection)即可構成具可信度的信號(credible signal)，表明其意圖是良性的。反直覺地，在國際間的保證情境中，官僚控制的缺乏(lack of bureaucratic control)可能是一種優勢，因為它降低敵對訊息發送者(hostile senders)錯誤傳達其意圖為良性的能力與意願。此論點前提是外交政策的執行需透過內部訊息溝通來協調各個國內行動者，當發送信號的政府決策過程具有透明性，即外人能夠輕易觀察時，秘密政策或背叛的行為將有衍生的成本與風險，因為較高的透明度意味著秘密行動更容易被發現並遭到抵制，以及在高度透明環境下的秘密行動須限制內部協調而削弱其制定與執行政策的能力。在這個情況下「沒出現洩密」就構成昂貴信號，從而增強對外信號，例如口頭保證的可信度。



國會議員保護選區利益會導致國家對外制裁的信號強度不足。Lektzian 與 Sprecher (2007)指出制裁通常會增加軍事衝突的可能性，特別是在民主國家使用時因為民主國家傾向於發出弱點信號，同時又限制民主領導人的選擇權。雖然制裁可以作為決心信號(signal of resolve)，並減少軍事力量使用的可能性，但通常發送國的國會根據合理的國內經濟實踐設計制裁，使其對自己造成的成本最小化，進而讓信號發送的決心減低。這反而會影響制裁的昂貴信號功能，發出發送國的弱點和優柔寡斷的信號，最終使軍事化衝突更有可能發生。甚至，發動制裁的國家會從而衍生觀眾成本(audience costs)，進而限制選擇讓該國更難讓步，從而導致衝突可能性提升。

盟友的影響會導致國家在軍事動員上的信號決心強度就有強弱之分。Wolford (2014)發展一個模型來探討潛在的聯盟領導者如何在目標國的不確定性和夥伴在戰爭發生時提供軍事支援的選擇影響下，選擇軍事威脅。在傳統的文獻中模型中，決心型(resolute type)國家面臨著一個問題，即如何與那些想要虛張聲勢的猶豫型(irresolute type)國家區分開來，但是增加一個潛在夥伴國家後，這些動態可能會發生實質性變化。夥伴國家可能在軍事動員態度上與本國不同，即使確實存在軍事動員的必要，因為各國受到國內政治、地理或資源限制的影響而對戰爭成本敏感度不同，例如夥伴國家的政府礙於選舉考量而只能執行空中攻擊任務而不願意進行地面作戰，因此夥伴國家只能在較小規模的動員情況下承諾合作，但這些動員也通常是決心較低的信號。因此，雖然領導者希望通過大規模動員來向目標國展示其決心，但必須注意若動員過多，則可能失去夥伴的軍事支持。也就是說，聯盟內部對戰爭成本的敏感性差異、夥伴國家可能拒絕軍事合作的可能性等兩大主要因素影響下，國家的軍事動員發送出的決心強度可能會有落差。

透過第三國可以加強國家對外信號的強度。Cebul (2023)探索可能增強觀眾成




本可見性的因素，指出知情的協力者可以幫助一國領導人讓對手國理解其觀眾成本，因為單方面發出觀眾成本信號會面臨幾項困難，包含緊張的外交關係可能會妨礙雙邊訊息溝通、理性的對手可能會將信號視為自利的虛張聲勢，除非能夠證實領導人可能面臨國內代價。Cebul 認為協力者外交可以在這兩方面發揮作用，促進處於危機中的國家進行對話，並獨立證實一國領導人面臨嚴重的觀眾成本。關鍵是領導人會對於他們認為可信的非敵對協力者，比對於敵對且不可信的對手更為誠實，且協力者在擁有良好外交關係可以更容易的運用外交資源，評估領導人的任期是否會因外交政策失敗而受到威脅。

領導人與其他資深官員外交訪問的信號強度不同。McManus (2018)認為領導人專屬信號具有綁手功能，因為它們可以為領導人帶來個人的國內聽眾成本或國際聲譽成本。領導人訪問和聲明通常在公眾視野中進行，並且通常會引起大量媒體報導。此外，主要大國領導人的外交訪問是高度精心策劃的行程，涉及數百名官員及助理、安全人員和記者，屬於一種稀缺資源，因此領導人無法頻繁地進行如此複雜的活動。故當主要大國的領導人從日程中抽出時間訪問外國，可以視為是昂貴信號的一種。然而，其他資深官員，也就是至少達到內閣級別但次於領導人的官員所進行的訪問，會被視為比領導人訪問更為較小的信號；原因包含這類的外交訪問綁手成本較低，且這些官員的時間不比領導人的時間珍貴，沉沒成本也因此較低 (McManus & Sendinc, 2024)。

四、公開性

信號的公開性是近年多篇文獻探討的面向，這包含不公開的隱蔽行動，以及低調的外交與軍事舉措。



首先，非公開地隱蔽行動(covert action)，也可以向對手，甚至是透過協力者的盟友傳遞昂貴信號。Carson 與 Yarhi-Milo (2017: 125-127)指出過去文獻甚少探討國家是否以及如何通過隱蔽行動傳達意圖，並指出傳統觀點認為觀眾最多會從這些行動中推斷出弱點而非決心，因為這類行動是在不承擔國內或國際聲譽情況下進行的。與原先文獻的論點不同，Carson 與 Yarhi-Milo 認為隱蔽行動也具有昂貴信號的效果，並定義隱蔽行動為政府在其領土之外進行的政策行動，是未經官方承認的，且大多數觀察對象無法知悉或無法將其歸因於行動者；然而，隱蔽行動很少是完全秘密的，其基本輪廓和許多細節往往會被當地夥伴和具有先進情報能力的戰略對手所察覺。

隱蔽行動的昂貴信號成本有好幾種。其一是來自源行動的獨特的沉沒成本，例如後勤成本因為要隱蔽行動而需要迂迴的計劃，成本比一般行動更高；其二是向外國展現承擔更高的國內風險，因為隱蔽行動可能超出國內其他政治對手願意進行的強硬舉措，並具有政治風險，使隱蔽行動的決心更為可信；其三是反升級風險，因為其他國家通常會以「可能升級為嚴重對抗的方式」對隱蔽行動做出反應，因此使用隱蔽行動來傳遞決心也能因其「對危機升級風險的影響」而顯得可信。(Carson & Yarhi-Milo, 2017: 133-135)。

另一方面，對特定類型的國家採取不同高調程度的信號，其呈現的信號強度可能不同。McManus 與 Yarhi-Milo (2017: 702-707)嘗試探討不同高調程度的信號，並建立兩種信號類型。其一，前臺(Frontstage)信號是對國內外公眾高度可見的；這些信號因具有公共儀式性質或成為政府內部辯論的議題，而獲得廣泛的媒體報導，例如防禦條約和領導人訪問。因此大眾有機會意識到前臺信號，並從中推斷主要大國與受保護國之間的關係。其二，幕後(Offstage)信號雖然並非秘密，但缺乏能夠產生高度媒體報導的特徵；因此幕後信號較不容易進入公眾的視野，而更有可能僅被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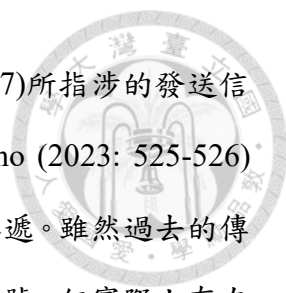
定的觀眾注意到，包括受保護國官員及潛在的外國挑戰者，例如軍火銷售和軍事援助。



雖然國際戰略上偏好前臺信號，也是美國對民主國家的主要方式，但美國和獨裁政體的受保護國的國內的政治約束，美國通常僅透過幕後信號來支持獨裁受保護國，因為幕後信號對獨裁國家較具有可信度。關鍵的因果機制有二；其一是偽善成本(hypocrisy costs)，指的是當美國未能維護其所宣揚的民主價值時，公眾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失望；其二是信譽問題(credibility concerns)，當美國顯著發送支持獨裁者的信號時，預期國內反對者會動員，但國際觀眾必須相信美國在需要時確實有可能援助受保護國，由於缺乏公眾支持可能對信譽造成損害，當前臺信號可能引發重大公眾反對時，美國應該避免發送支援受保護國的前臺信號。(McManus & Yarhi-Milo, 2017: 702-710)

這個前臺與後臺信號後來獲得延伸，但後臺信號的內涵及機制改變，變為為了避免激起信號接受國內部的聽眾成本，而進行的低調信號類型。Qi & Li (2023: 203-206, 219-222)以前臺與後臺信號來檢視美中海軍對峙的情況，並指出當美國和中國的新聞媒體密切關注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活動界定為前臺信號(frontstage signals)，經常是美國總統選舉期間美軍活動的信號形式，期待能觸發聚旗效應(rally-round-the-flag effect)來贏得總統選舉。然而，如果美軍的這些軍事行動有很多報導，中國的媒體報導可能會相應增加，從而提高中國的國內觀眾成本。因此，由於這將引發中國的國內觀眾成本，中國在回應美國強硬立場時，很難選擇退讓。因此，美國的軍事信號會轉為後臺信號(offstage signal)來避免受到媒體關注，因為威懾是美國的主要目的。


最後，和所謂避免激起信號接受國的國內聽眾成本與反抗的意志雷同，隱蔽的



軍事載臺也有後臺信號的效果，但與 Carson 與 Yarhi-Milo (2017)所指涉的發送信號國內政治風險和信號接受國的反升級風險不同。Chao 與 Cho (2023: 525-526) 指出，使用水下具有高度隱蔽性的軍事載臺可以進行昂貴信號傳遞。雖然過去的傳統文獻可能會因為動員並未公開，認為潛艦的隱蔽性削弱決心信號，但實際上存在一種反向邏輯，就是水下資產的隱蔽性可能有助於信號傳遞和強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使目標國家在不產生觀眾成本的情況下可以退讓。雖然當國家在公開場合採取行動並產生綁手效果，通常被認為能使承諾更具可信度，但 Carson and Yarhi-Milo (2017)研究也顯示，私下和隱蔽形式的信號傳遞對強制外交是有效的。例如，私下發出的威脅比公開發出的威脅更有效，因為公開威脅涉及到信號發送國和目標國家的觀眾，從而使目標國家更難退讓。因此，在上述情況下，國家避免公開的昂貴信號來進行強制外交會更有利。這一邏輯可能解釋為何國家經常進行秘密外交，而非公開外交。例如，2017 年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對朝鮮的核武計劃和導彈測試，在朝鮮半島周邊水域派遣兩艘核潛艦，但這一事實直到一個月後才公開，當時緊張局勢已經平息。

第二節 挑釁

信號公開性最後關於為了避免激起信號接收國的聽眾成本，進而改採取隱蔽行動來傳遞昂貴信號，希望藉此避免信號接受國沒有讓步的可能性。而這些可能激起對手國家聽眾成本的昂貴信號，屬於挑釁(Provocation)概念。要說明的是，最初的昂貴信號主要是聚焦在信號發送國國內，包含綁手信號和沉沒成本信號，但近年昂貴信號的文獻開始探討在國境之外行動所具有的昂貴信號意義。這類的討論意味著，傳遞昂貴信號的行為很有可能是在信號接受國所屬領域發生的，因此相當符合挑釁的概念。




Dafoe、Hatz 與 Zhang (2021)在 *Coercion and Provocation* 一文中探索挑釁 (provocation)的存在，並將其與脅迫(coercion)進行比較。威脅與武力是作為脅迫 (coercion)手段運作的，其邏輯簡單是威脅或實際的傷害會增加目標的實際和預期抵抗成本，從而削弱目標的決心或抵抗的意志。脅迫邏輯的核心假設是成本敏感性 (cost sensitivity)，也就是當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時，抵抗成本增加將減少目標對抵抗決心。

相反的，威脅和暴力通常似乎會導致挑釁，從而增強目標的決心，並在某些情況下導致更強的抵抗和報復(Dafoe, Hatz & Zhang, 2021: 372-373)；挑釁的定義，是國家行為者認為是故意且錯誤地挑戰或侵犯其價值觀與目標的行動或事件，從而引發憤怒反應，進而促使倉促、攻擊性的反應。根據這一定義，挑釁的構成要素即其效果「憤怒反應」，而這些反應具有破壞或加劇國家行為者先前行為軌跡的潛力 (Hall, 2017: 3)。事件的挑釁性(provocativeness)最終取決於感知，問題不在於國家的榮譽是否受到挑戰，而是國家是否視其為挑戰(Cho, Haynes & Yoder, 2024: 1308; Dafoe, Hatz & Zhang, 2021: 377-381)。

挑釁顯然是國內觀眾成本(domestic audience costs)的來源，並且可能是最實質的來源，因為領袖在經歷挑釁事件後如果選擇退讓，將承擔國內成本。這符合基於聲譽或榮譽的解釋，與 Fearon (1994)最初的概念一致。此外，聚旗效應(rally effects)本身也遵循聲譽和榮譽的邏輯，因為當事件將集體的聲譽和榮譽置於風險中時，個體會聚集在領袖身後，但對領袖的支持取決於領袖是否捍衛集體的聲譽和榮譽。更重要的是，挑釁顯然是與國際和國內關於開戰正當理由的規範共同創造的基礎，這些規範經常涉及指出對手的挑釁行為(Dafoe, Hatz & Zhang, 2021: 376)。

更宏觀的看，國家所發出的信號會塑造國家對彼此所構成威脅的認知。當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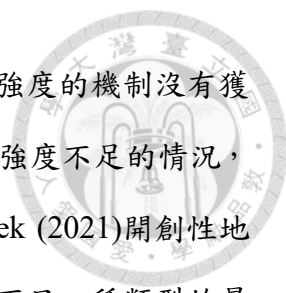


國家的對手在危機中發出威脅時，該國可能會更新對於對手所構成挑戰的認知，並且強化對手的決心。由於國家通常會對他們認為對自身利益構成更大威脅的國家採取更為對立的政策，因此應避免不必要的威脅以免挑起衝突；然而，若以昂貴信號的角度來看，威脅因為帶有政治效果並提高對手回應的強度，也因此是昂貴的行為(Cho, Haynes & Yoder, 2024: 1324; Sukin, 2022: 940-944)。例如，美國與南韓進行的聯合軍演，會導致北韓發出威脅，而越靠近北韓領土的聯合軍事演習引發的北韓負面回應越多(Sukin, 2022: 952)。

這樣實際暗示一種逆向策略，即避免挑釁。當行為者認為若對手國家被挑釁後會帶來不期望的甚至是危險的後果時，他們可能會採取預防措施，避免發出觸發強烈情感反應的行動。例如在 1996 年臺灣海峽危機期間，美國政府刻意避免再次派遣美國航母編隊通過臺灣海峽，因為這樣的行為被時任美國國防部長佩里(William Perry)認為是不必要的挑釁；並非所有行為者都希望對方在憤怒中行事，因此也存在戰略性動機來避免挑釁(Hall, 2017: 29)。

第三節 小結

從前述的文獻回顧可以發現，昂貴信號有 3 個仍待探索之處，為本文將嘗試解決的重點。第一，至今昂貴信號成本來源的探討主要聚焦於發送國國內，而相對忽略源自於國際的成本。大多數的昂貴信號研究是基於 Fearon (1997)的綁手信號與沉沒成本信號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而這 2 種信號的成本都是發生在國內，無論他們的性質或發生時間。然而，雖然 Fearon (1994)曾有探討外交與戰爭面向這類國際性的成本作為昂貴信號，但並沒有獲得和綁手信號和沉沒成本信號同等的關注與探討。




第二，雖然昂貴信號的強弱程度有被探討，但國家加強信號強度的機制沒有獲得關注。既有探討昂貴信號強弱程度的文獻，探討的邏輯是信號強度不足的情況，而沒有系統性地探索信號強度如何增強。值得一提的是，如 Quек (2021)開創性地延伸 Fearon 的原始信號類型時，有強調單一行為可能同時具有不只一種類型的昂貴信號，例如美國甘迺迪總統在古巴飛彈危機期間下令的封鎖行動，就兼具沉沒成本和聽眾成本，但既有文獻並沒有系統性地針對加強信號強度進行研究，而僅是提出不同類型的信號可能同時存在的現象。

第三，雖然近年昂貴信號文獻已有涉及類似挑釁效果的機制，但沒有將挑釁做為一種昂貴信號。Qi 與 Li (2023)、Chao 與 Cho (2023)的研究，均針對避免信號接受國在即使知悉信號發送國決心但仍無法退讓的情況，提出國家如何在不公開而不產生接收國退讓的國內聽眾成本情況下，發出昂貴信號來展示決心，此考量也正是挑釁理論的文獻所提出關於昂貴信號機制的問題。然而，如果信號發送國所針對的信號接收國與受脅迫國是不同國家，就很可能意味著信號發送國對受脅迫國做出的挑釁行為衍生成本，對信號接受國來說是屬於昂貴信號的，也就是信號發送國強烈決心的展現。這個機制是既有昂貴信號文獻中尚未探討的。

基此，本文對昂貴信號理論進行 2 種補充。第一，本文將挑釁作為一種國際性的昂貴信號。因為挑釁會導致受脅迫國的抵抗決心，這對脅迫發起國是一種成本，使得脅迫發起國面臨更大的外交壓力或軍事威脅。因此，本文將激起挑釁的脅迫作為視為昂貴信號的呈現類型，只要信號接受國和受挑釁國是不同的，這使得信號發送國因挑釁行為而承受昂貴成本的情況下，信號接受國得因此知曉信號發送國的決心而進行退讓。

第二，本文將挑釁作為加強型的昂貴信號。挑釁行為符合既有文獻探討的「加



強信號」情形，例如脅迫行為本身可以是軍事演習，其涉及高昂的「國內」沉沒成本而屬於昂貴信號。在此基礎下，對他國的脅迫行為所衍生的挑釁效果，實際上在「國內沉沒成本」之外額外的「國際沉沒成本」，具有「加強信號」的效果。

回到既有文獻中，可以找到國家「加強信號」的原因就是基於信號發送國與信號接受國之間存在訊息溝通不佳的情形。這正是昂貴信號的基本邏輯，因為國家之間存在欺瞞意圖的可能性，使得國家必須透過高昂成本的行為來展示其決心。而既有昂貴信號不足而須「加強信號」的狀況，就很可能出現在信號發送國與信號接受國之間的訊息溝通處於不佳時期。

如第一章緒論所述，本文提出以「信號發送國與信號接受國之間的訊息溝通情況是否不佳」及「信號發送國針對受脅迫國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的實際軍事投射能力足夠與否」作為自變數，探討國家加強信號的原因與考量。依變數部分，本文將軍事演習規模分為4種程度，依序是無軍演、短暫軍演、多日軍演，以及多日軍演且波及第三國。



第三章 案例研究



依照本文建立的國際沉沒成本因果機制類型，分別探討無需也無能力加強信號、需要但無能力加強信號、無需但有能力加強信號，以及需要且有能力加強信號等 4 種類型的各個案例狀況。具體而言，本文依照有無能力加強信號先將案例分為兩大類，並在這兩大類之下再依照有無需要加強信號分為子類型進行探討。

第一節 無能力加強信號的狀況

一、中國軍事投射能力不足

無能力加強信號是指信號發送國軍事投射能力不足，本文的具體指標是中國對上臺灣、日本和美國，不具相當於美國科技水準的軍機或軍艦，又或是雖然有相當科技水準的軍機或軍艦，但數量明顯不如臺灣、日本和駐日美軍的數量總和。

本文的個案中，1995 至 2000 年之間的 5 個案例屬於中國無能力加強信號的狀況，因為這段期間中國的實際軍事投射能力不足；5 個案例列表如表 3-1。

首先，當時最先進的海軍軍艦為美軍搭載神盾系統(Aegis Combat System)和垂直發射系統(vertical launch system)的巡洋艦和驅逐艦。神盾系統可以整合先進的電腦運算及各式裝備系統，進而提升作戰效能，反觀未搭載神盾系統的軍艦作戰自動化程度低而高度仰賴人工，導致難以如神盾系統軍艦能夠高度自動化地同時應對多種空中軍機及飛彈威脅(Rogoway, 2021)。垂直發射系統具備多彈種兼容與多功能作戰能力，可同時容納防空、反潛及攻陸巡弋飛彈，顯著提升戰艦多任務靈活性



與火力投射能力，而無垂直發射系統的軍艦火力與彈藥容量明顯不如前者，難以持續應對高密度多重威脅、缺乏戰術彈性與多功能能力、無法靈活快速切換任務彈種，限制作戰範圍與應變能力(Fischbach, 2024)。

表 3-1 中國軍事投射能力不足的 5 個案例

案例選擇	中華民國總統 入境美國	美國時任聯邦眾議院 議長訪問臺灣	臺總統講話涉及 「一中原則」變動
1994 年			
1995 年	6 月康乃爾演講		
1996 年			
1997 年	10 月過境夏威夷	4 月金瑞契訪臺	
1998 年			
1999 年			7 月德國之聲採訪
2000 年	8 月過境洛杉磯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在 1995 至 2000 年間，這類軍艦包含美軍的提康德羅加級巡洋艦(Ticonderoga-class cruiser)和勃克級驅逐艦(Arleigh Burke-class destroyer)，日本則是有金剛級驅逐艦(Kongō-class destroyer)符合這個標準；然而，中國在這段期間沒有任何搭載相當於神盾系統的軍艦，這意味著中國軍艦的實際軍事投射能力是不足的(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96 & 2001)。

其次，當時最先進的空軍戰鬥機為第四代戰鬥機，臺灣、日本與駐日美軍的數量加總明顯多於中國。每一代戰鬥機之間的性能基本上有明顯落差，而第四代戰鬥機所採用的先進技術包括電傳操縱、複合材料、超機動性、先進航空電子設備、合成雷達、隱身技術以及大於一的推重比，性能明顯優於第三代戰鬥機(Hebert, 2008; Kass, 2025)。這包含美軍的 F-15 和 F-16 戰鬥機、日本的 F-15 和 F-2 戰鬥機、臺灣

的經國號和 F-16 戰鬥機，以及中國的蘇愷 27 和蘇愷 30。然而，雖然中國的空軍戰鬥機科技水準和臺灣、日本與美國相符，在數量上卻明顯居於劣勢；1995 年中國擁有 37 架第四代戰鬥機，而臺灣擁有 42 架、日本和美國共擁有 281 架，雖然 2000 年中國增加為 90 架，但臺灣提升為 274 架、美日兩國加總仍有 240 架，數量上仍有明顯的落差，數量差距如表 3-2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96 & 2001)。

表 3-2 1995 至 2000 年間中國軍事投射能力狀況

年分	中國	臺灣	日本和美國
1995	37	42	281
2000	90	274	24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鑒於中國海軍軍艦沒有和當時最先進軍艦同等技術者，且中國空軍戰鬥機符合當時先進技術者的數量明顯不如臺灣、日本和駐日美軍，因此這段時期中國對上臺灣、日本及駐日美軍是明顯趨於作戰劣勢的，不具有實質的軍事威脅能力。故本文 1995 至 2000 年的 5 個案例均屬於中國軍事投射能力不足的情況，無能力加強信號。

二、美中訊息溝通狀況

在中國無能力加強信號的 5 個案例中，李登輝總統 1995 年赴康乃爾大學演講這一案例為美中訊息溝通不佳的情況，而 1997 年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金瑞契訪問臺灣、1997 年李登輝總統過境夏威夷、1999 年李登輝總統發表特殊國與國關係和 2000 年陳水扁總統過境加州等 4 個案例屬於美中訊息溝通良好的情況。



(一) 訊息溝通狀況不佳的案例

1995年6月李登輝總統赴其母校美國康乃爾大學發表演講一事，是在美中訊息溝通狀況不佳的情況下進行的。此一事件的背景是，李登輝總統1994年5月過境夏威夷訪問中南美洲時，因中國施壓使美方不同意李登輝總統入境美國，引發美國國會高度關注，並因此批評柯林頓政府屈服中國來打壓臺灣。其後，美國國會1995年以壓倒性表決票數要求美國政府核發李登輝的簽證，迫使美國國務院讓步，同年5月同意其以私人身分訪美。這使得李登輝總統成為首位訪問美國的在任中華民國總統，象徵臺美關係的重大突破。隨後李登輝總統在康乃爾大學發表「民之所欲、長在我心」演說，並首次提出「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國家定位(中央通訊社，2020)。

針對此次事件，中國認為美國政府允許臺灣最高領導人入境美國的決定，違背美國公開聲明及私下保證的立場。此外，這個事態發展的脈絡也極為重要，因為李登輝總統獲得美國簽證是在美國對臺政策相對友善的3年發展下所作出的，包含關鍵的老布希政府1992年向臺灣出售F-16戰機，實際上與1982年八一七公報(1982 U.S.-China Communiqué on Arms Sales to Taiwan)的承諾相違。從中國的觀點來看，同意李登輝入境美國並赴大學演講一事顯示美國似乎有意持續修正其對臺政策，進而鼓勵臺灣領導人推進臺獨的行徑(Ross, 2000: 87)。

在這段期間，美中兩國部長級官員出現超過6個月未公開訪問對方國家的情況。1994年美中兩國部長級官員互動頻繁，包含1994年3月時任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訪問中國，和包含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內的高階官員討論美中貿易問題(The Washington Post, 1994a)；1994年10月，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訪問美國，和美國總統柯林頓在內的高階官員討論美中貿易和中國人權問題，同月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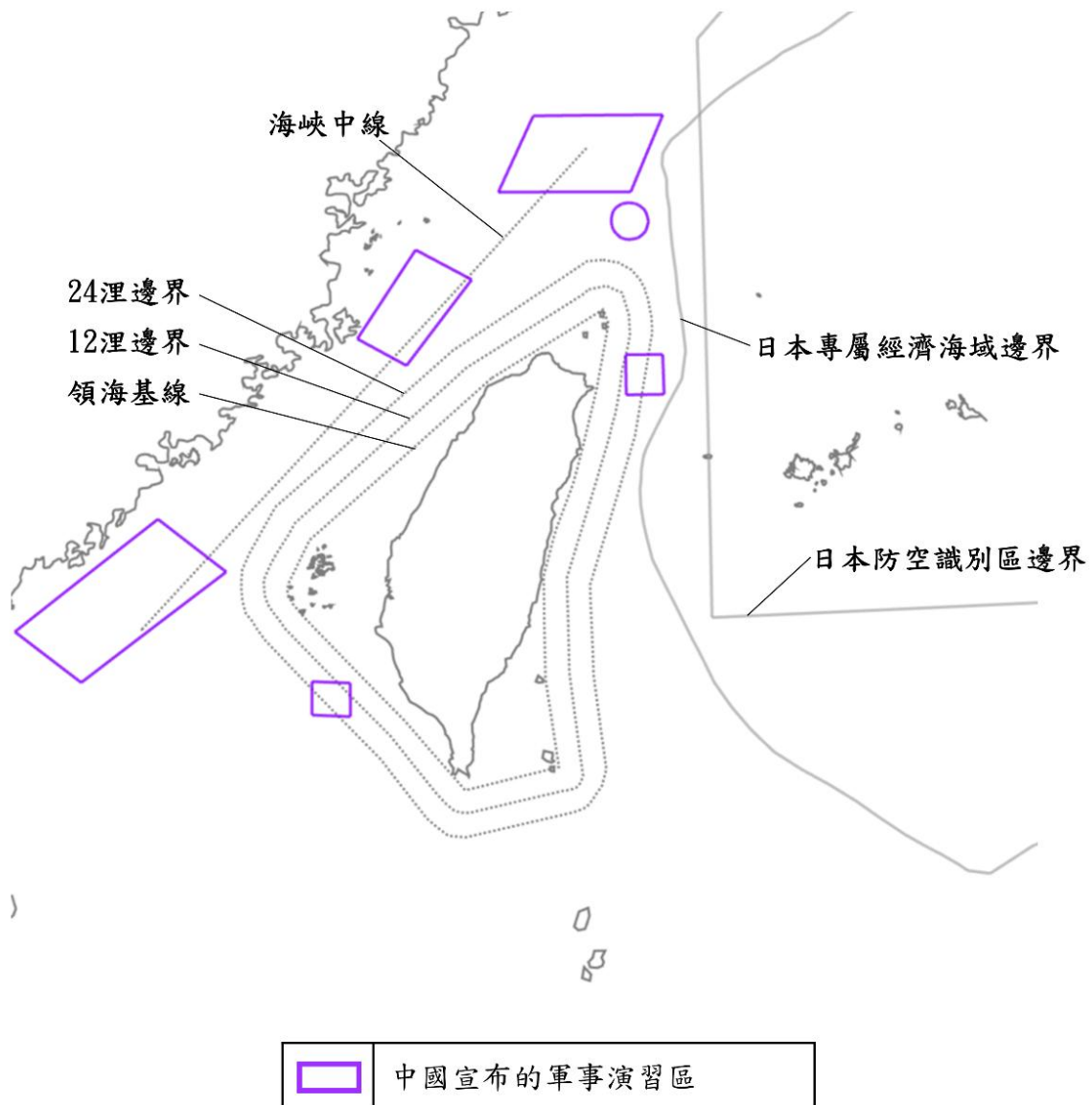
國國防部長培里(William Perry)訪問北京(The New York Times, 1994; The Washington Post, 1994b)。然而，其後美中兩國就沒有外交或防務部門部長級官員公開訪問對方國家的情況，直到 1996 年 7 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雷克(Anthony Lake)訪問北京，美中高階官員訪問對方國家的情況才恢復(The Washington Post, 1996)。

要說明的是，在 1994 年 10 月至 1996 年 7 月之間美中部長級以上的官員是有進行會面的，但均不是正式訪問對方國家的行程，而是在第三國出席國際會議時在場邊趁機會談，又或者中國官員赴美國紐約參加聯合國會議的場邊互動。例如，1995 年 4 月 17 日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在紐約聯合國會議時向在美國參加該會議的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討論李登輝總統赴美國一事，並口頭保證柯林頓政府不會核發李登輝簽證(The Washington Post, 1998a)。又例如，在李登輝總統的康乃爾大學演說後，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和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 1995 年 8 月 1 日在汶萊舉行的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期間有進行會面(The New York Times, 1995a)。但這些活動都不是雙方部長級官員訪問對方國家，而僅是在國際會議場邊連帶地進行溝通，意味著很可能兩國之間的合作項目停滯無進展，只在國際場合順帶地進行政策立場的意見表達。

在這個狀況下，中國 1995 年 7 月在臺灣周邊進行大型軍事演習，且時間長達 8 天。中國官媒新華社 7 月 18 日宣布解放軍二砲部隊(現稱火箭軍)將於 7 月 21 日至 7 月 28 日舉行飛彈試射演習，飛彈試射演習區域如圖 3-1 (中央通訊社，2022a, 2022b)。其後，解放軍在福建東山島附近舉行大規模聯合兩棲登陸演習，動員數千名官兵參與，整個演習的軍事行動由南京軍區負責策劃(沈明室，2022)。



圖 3-1 1995 年中國對臺軍事演習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解放軍的軍事演習時間超過 8 天，包含飛彈射擊的時間和解放軍兩棲演習的時間。同時，解放軍的活動沒有進入到日本所屬的專屬經濟區海域，更遑論日本的防空識別區。



(二) 訊息溝通狀況良好的案例

美中訊息溝通狀況改善的節點是 1996 年 7 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雷克訪問北京；雷克在會後受訪表示，美中應設法規劃兩國例行性高層會晤，而另一位美國官員受訪亦表示美中此次的對話能夠帶來兩國關係的安全感、穩定性和可預測性 (Washington Post, 1996a)。其後，美中官員持續訪問對方國家且間隔大致不超過 6 個月：1996 年 11 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訪問中國、1996 年 12 月中國國防部長遲浩田訪問美國、1997 年 2 月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訪問中國、1997 年 4 月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訪問美國、1997 年 8 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柏格 (Samuel Berger)訪問中國、1997 年 10 月至 11 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美國、1998 年 1 月美國國防部長柯恩(William Cohen)訪問中國、1998 年 4 月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訪問中國、1998 年 6 月至 7 月美國總統柯林頓訪問中國、1998 年 9 月中共軍委副主席張萬年和中國外交部長唐家璇分別訪問美國、1999 年 2 月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訪問中國、1999 年 4 月中國總理朱鎔基訪問美國、2000 年 3 月美國國安顧問柏格訪問中國、2000 年 6 月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訪問中國(中國新聞網，2011；人民網，2015；新華網，2015；US State Department, 1996; The New York Times, 1998, 1999a, 2000; CNN, 1997; The Washington Post, 1997a, 1997b & 1998b; Los Angeles Times, 1998; CCTV, 2005; Taipei Times, 2000)。

要說明的是，雖然因為 1999 年 5 月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一事，導致 1999 年 4 月中國總理朱鎔基訪問美國後將近有 1 年時間兩國沒有部長級官員互



訪，但兩國實際上在此期間陸續就轟炸賠償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進行談判，並在同年 7 月達成賠償協議、11 月達成美中雙邊的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協議(The New York Times, 1999b; The White House, 1999)。這顯示美中雙方針對軍事衝突事件進行持續溝通，且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進行具有合作性質的談判，實際符合本文昂貴信號理論的訊息溝通良好的核心定義。

本狀況下有 4 個案例。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訪問臺灣部分，1997 年 4 月 2 日議長金瑞契臨時將臺灣納入其亞洲訪問行程，原行程包括韓國、香港、日本與中國四站。他旋風式訪臺約 3 小時，與李登輝總統會談並舉行記者會；此次訪臺並未引發中國公開的強烈反彈，也未採取軍事或外交施壓手段。(中央通訊社，2022d)。中華民國總統過境美國部分，李登輝總統 1997 年 9 月過境美國夏威夷赴中南美洲友邦進行訪問，且有入境美國和當地僑民、張學良見面，而陳水扁總統則是 2000 年 8 月過境美國訪問中南美洲及非洲友邦，有入境美國至洛杉磯的飯店和美國在臺協會理事長卜睿哲(Richard Bush)和聯邦眾議員羅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會面(中華民國總統府，1997, 2000；華視，1997；The Washington Post, 2000)。此外，1999 年 7 月李登輝總統發表特殊國與國關係，則是接受德國之聲錄影專訪，闡述「一九九一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中華民國總統府，1999)。

這 4 個案例的後續狀況相同，中國均沒有公開宣示在臺灣周邊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

第二節 有能力加強信號的狀況



一、中國軍事投射能力足夠

有能力加強信號是指信號發送國具有軍事投射能力，本文案例的具體指標是中國對上臺灣、日本和美國，具有相當於美國科技水準的軍機或軍艦，且具相當科技水準的軍機或軍艦數量要至少與臺灣、日本和駐日美軍數量總和相當。

本文的個案中，2022 至 2025 年之間 6 個案例屬於中國有能力加強信號的狀況，因為這段期間中國的軍艦和軍機軍事投射能力足夠；6 個案例列表如表 3-3。

表 3-3 中國軍事投射能力足夠的 6 個案例

案例選擇	中華民國總統 入境美國	美國時任聯邦眾議院 議長訪問臺灣	臺總統講話涉及 「一中原則」變動
2022 年		8 月裴洛西訪臺	
2023 年	3 至 4 月過境紐約 與洛杉磯		
2024 年	11 至 12 月過境夏 威夷		5 月就職演說 、10 月國慶演說
2025 年			3 月國安會議記者會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首先，這段期間最先進的海軍軍艦仍為美軍搭載神盾系統和垂直發射系統的巡洋艦和驅逐艦。這包含美軍的提康德羅加級巡洋艦和勃克級驅逐艦，日本則是有金剛級驅逐艦、摩耶級驅逐艦(Maya-class destroyer)、愛宕級驅逐艦(Atago-class destroyer)符合這個標準，臺灣則沒有；同時，中國在這段期間具有相符神盾系統功能及垂直發射系統的軍艦包含 055 型驅逐艦、052D 型驅逐艦及 052C 型驅逐艦(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 2025)。



要說明的是，海軍軍事投射能力的數量對比上不應單純以噸位數或軍艦艘數進行比較，而更應以垂直發射系統的飛彈裝填的單元數總量進行比較，因為不同軍艦之間的單元數量差異可能極大，導致某型軍艦的實際作戰能量明顯大於另一型軍艦，故比較實際單元數更符合當代海軍軍艦作戰能量的情況。2020 年以來中國垂直發射系統的飛彈裝填單元數對比臺灣、日本和駐日美軍加總數量，在 2021 年起中國不再處於明顯數量劣勢的情況，數據如表 3-4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 2025)。

表 3-4 2019 至 2024 年間中國海軍軍事投射能力變化

年分	中國	臺灣	日本與美國
2019	1,200	0	1,896
2020	1,392		1,728
2021	1,936		1,920
2022	2,768		1,920
2023	2,880		2,016
2024	2,880		1,95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其次，當時最先進的空軍戰鬥機為第五代戰鬥機。第五代戰鬥機基本上有高度隱身、艙內攜帶精確武器、主動電子掃描陣列雷達和即插即用電子設備，作戰能力明顯優於第四代戰鬥機(Hebert, 2008)。這包含美軍的 F-22 和 F-35 戰鬥機、日本的 F-35 戰鬥機，以及中國的殲 20 戰鬥機。比較 2020 年以來中國第五代戰機對比臺灣、日本及駐日美軍總數，2021 年起中國不再處於明顯數量劣勢的情況，數據如表 3-5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 2025)。

表 3-5 2019 至 2024 年間中國空軍軍事投射能力變化

年分	中國	臺灣	日本與美國
2019	22	0	38
2020	24		29
2021	140		37
2022	200		43
2023	200		61
2024	230		7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鑒於中國軍艦和戰鬥機有和當時最先進軍艦同等技術者，且數量明顯在 2021 年起不再明顯少於臺灣、日本和駐日美軍，故本文 2022 至 2025 年的 6 個案例均屬於中國軍事投射能力足夠的情況，有能力加強信號。

二、美中訊息溝通狀況

在中國有能力加強信號的 6 個案例中，2022 年 8 月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問臺灣、2023 年 4 月蔡英文總統過境紐約與加州此 2 個案例為美中訊息溝通不佳的情況，而 2024 年 5 月賴清德總統就職演說、2024 年 10 月賴清德總統國慶演說、2024 年 12 月賴清德總統過境夏威夷，以及 2025 年 3 月賴清德總統「五大國安統戰威脅及十七項因應策略」講話等 4 個案例屬於美中訊息溝通良好的情況。

(一) 訊息溝通狀況不佳

2022 年 8 月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問臺灣、2023 年 4 月蔡英文總統過境紐約與加州等 2 個行程，是在美中訊息溝通狀況不佳的情況下發生的。美國與中國 2020 年 1 月達成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後，彼此之間開始出現許多齟齬，這



包含美國多次制裁涉及香港問題的中國官員、美國首次公開否定中國的南海九段線主張、美國要求溯源中國的新冠肺炎源頭(BBC, 2020; Reuters, 2020, 2021a; The New York Times, 2020; The Washington Post, 2020)。甚至，在拜登政府上任後兩國仍持續相互批評及制裁，包含美國的中國科技企業禁令、中國制裁美國前任官員、中國頒布出口管制法、美國抵制北京冬季奧運會等(Chu, 2022; CNBC, 2021; Reuters, 2021b; The New York Times, 2022)。

同時，美中兩國部長級官員出現超過 6 個月未公開訪問對方國家的情況。美國拜登政府 2021 年 1 月就任後，美中兩國 2021 年 3 月在美國阿拉斯加舉辦會談，由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進行會談(The Washington Post, 2021)。然而，其後直到 2023 年 6 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問中國後，才再度有美中部長級官員訪問對方國家(中國外交部，2023a)。在此種狀況下，中國在 2022 年 8 月和 2023 年 4 月對臺灣發動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要強調的是，美中兩國部長級以上官員在 2021 年 3 月至 2023 年 6 月之間是有進行至少 27 次公開會面的，但不是正式訪問對方國家的行程，行程如表 3-6。例如，202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和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在瑞士蘇黎世會面(中國外交部，2021a)。又例如，2022 年 7 月中國外交部長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 G20 場邊會面，期間就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可能訪問臺灣一事進行溝通(中國外交部，2022a；Reuters, 2022)。但這些會面都不是部長級官員訪問對方國家的行程，意味著美中之間不存在具體合作的項目，又或者合作項目無進展，因此只在國際會議場邊連帶性地進行政策立場傳達。


表 3-6 2021 年 3 月至 2023 年 6 月美中部長級以上官員接觸情況

編號	日期	型態	地點	中方官員	美方官員	備註	資料來源
1	2021 年 6 月 11 日	通電話	遠端	中央外事辦主任	國務卿		中國外交部，2021c
2	2021 年 8 月 17 日	通電話	遠端	外交部長	國務卿		中國外交部，2021d
3	2021 年 8 月 29 日	通電話	遠端	外交部長	國務卿		中國外交部，2021e
4	2021 年 9 月 10 日	通電話	遠端	國家主席	總統		中國外交部，2021f
5	2021 年 10 月 7 日	會晤	瑞士蘇黎世	中央外事辦主任	國家安全顧問	6 小時	中國外交部，2021b
6	2021 年 10 月 31 日	會見	義大利羅馬	外交部長	國務卿		中國外交部，2021g
7	2021 年 11 月 13 日	通電話	遠端	外交部長	國務卿		中國外交部，2021h
8	2021 年 11 月 16 日	視頻	遠端	國家主席	總統		中國外交部，2021i
9	2022 年 1 月 27 日	通電話	遠端	外交部長	國務卿		中國外交部，2022b
10	2022 年 2 月 22 日	通電話	遠端	外交部長	國務卿		中國外交部，2022c
11	2022 年 3 月 5 日	通電話	遠端	外交部長	國務卿		中國外交部，2022d
12	2022 年 3 月 15 日	會晤	義大利羅馬	中央外事辦主任	國家安全顧問		中國外交部，2022e
13	2022 年 3 月 18 日	視頻	遠端	國家主席	總統		中國外交部，2022f
14	2022 年 5 月 19 日	通電話	遠端	中央外事辦主任	國家安全顧問		中國外交部，2022g

編號	日期	型態	地點	中方官員	美方官員	備註	資料來源
15	2022年6月14日	會晤	盧森堡	中央外事辦主任	國家安全顧問		中國外交部，2022h
16	2022年7月9日	會晤	印尼峇厘島	外交部長	國務卿	G20 場邊	中國外交部，2022i
17	2022年7月22日	通電話	遠端	國家主席	總統		中國外交部，2022j
18	2022年7月29日	通電話	遠端	國家主席	總統		中國外交部，2022k
19	2022年9月24日	會見	美國紐約	外交部長	國務卿	聯合國大會場邊	中國外交部，2022l
20	2022年10月31日	通電話	遠端	外交部長	國務卿		中國外交部，2022m
21	2022年11月14日	會晤	印尼峇厘島	國家主席	總統	G20 場邊	中國外交部，2022n
22	2022年11月19日	簡短交談	泰國曼谷	國家主席	副總統	APEC 場邊	中國外交部，2022o
23	2022年12月23日	通電話	遠端	外交部長	國務卿		中國外交部，2022p
24	2023年1月2日	通電話	遠端	外交部長	國務卿		中國外交部，2023h
25	2023年2月4日	通電話	遠端	中央外事辦主任	國務卿		中國外交部，2023i
26	2023年5月12日	會晤	奧地利維也納	中央外事辦主任	國家安全顧問	2天、8小時	中國外交部，2023g
27	2023年6月14日	通電話	遠端	外交部長	國務卿		中國外交部，2023j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期間的會晤並不只是快速簡要地的談話，而是有激烈、長時間就兩國重要的衝突性議題進行溝通，主要目的就是要管控分歧避免發生衝突。例



如，2021 年 10 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瑞士蘇黎世的一家機場飯店進行 6 小時的會談，美方和中方會各自公布的新聞稿中，均有提到「保持溝通管道暢通」或「加強戰略溝通」的措辭，並各自提及特定的政策立場，包含臺灣及南海問題(中國外交部，2021b；Reuters, 2021c; The White House, 2021)。又例如，2023 年 5 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在奧地利維也納進行為期 2 天共 8 小時的會談，美方會後的新聞稿中提及雙方持續嘗試保持溝通管道暢通和負責任的競爭，中方的新聞稿則提及雙方同意繼續維持戰略性溝通渠道，而針對兩岸問題的討論均在雙方新聞稿中被提及(中國外交部，2023g；CNN, 2023;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2023)。

1. 2022 年 8 月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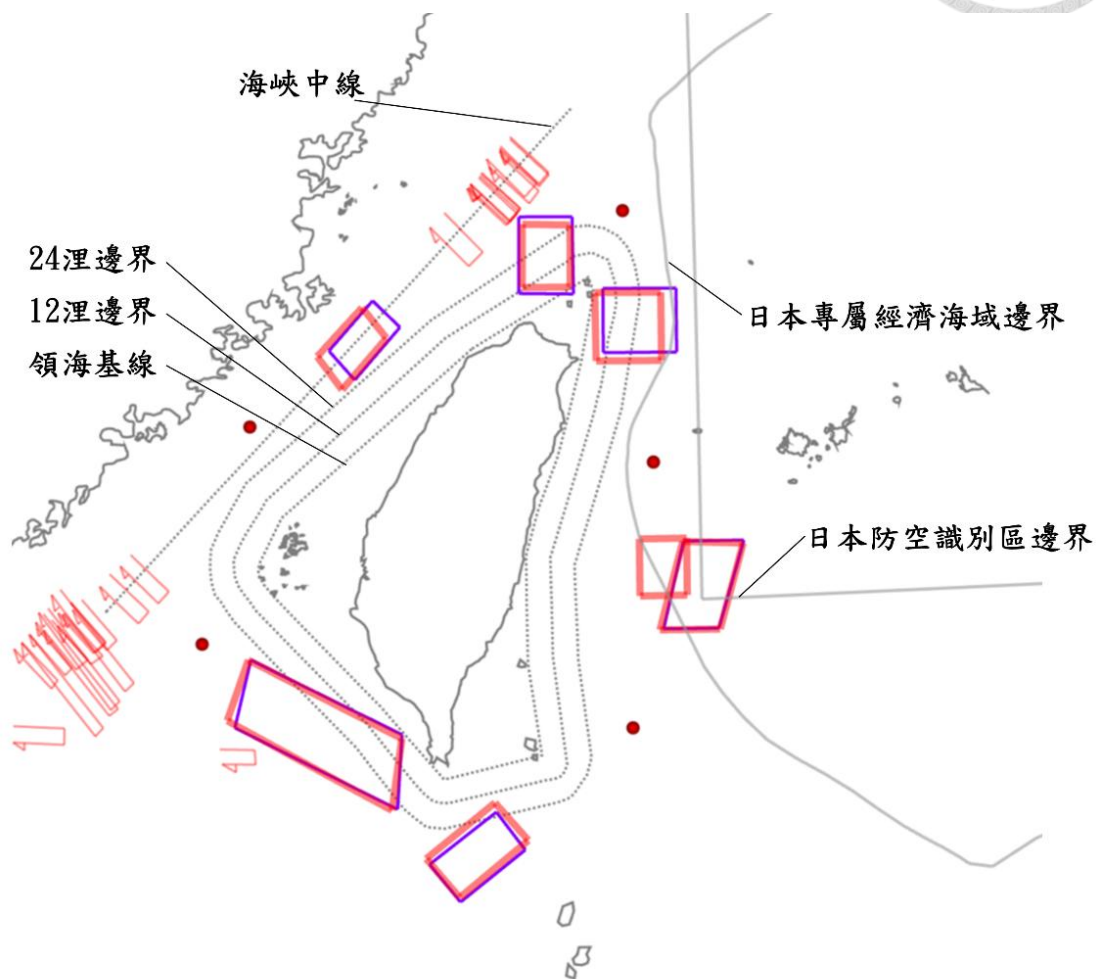
時任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原訂 2022 年 4 月訪問臺灣但因病延遲，而 7 月底其領導的國會亞洲行訪團出發時，公布的行程也未包含臺灣(BBC, 2022)。但後來裴洛西在 8 月 2 日晚間抵達臺灣，於 19 小時內和蔡英文總統會談及拜會立法院等行程後即離開臺灣飛往南韓(中央通訊社，2022e；CNN, 2022)。






中國官媒新華社 2022 年 8 月 2 日公布將在 8 月 4 日至 8 月 7 日之間，在臺灣周邊進行軍事演訓行動，並在 8 月 4 日發射 11 枚飛彈，最終在 8 月 10 日宣布完成針對裴洛西「竄訪臺灣」的一系列聯合軍事行動，範圍示意圖如圖 3-2 (中央通訊社，2022b、2022c；自由時報，2022；新華網，2022a、2022b、2022c)。

解放軍針對裴洛西訪臺一事發動的軍事演習時間共 7 天，且解放軍的飛彈落入日本所劃設的防空識別區暨專屬經濟海域，海軍軍艦也進入到日本認定的專屬




圖 3-2 2022 年 8 月中國對臺軍事演習示意圖



	中國宣布的軍事演習區
	臺灣發布的解放軍演習區
	解放軍空軍航跡
	解放軍海軍軍艦位置
	中國海警船位置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經濟海域。針對中國飛彈落入日本所屬的海空域範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及防衛大臣岸信夫均表達反對立場，其中岸田文雄表示「這是事關日本國家安全和國民安全的嚴重問題」(日本の安全保障や国民の安全に関わる重大な問題だ)、「日美將繼續合作維護臺海和平穩定」(臺灣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の維持へ引き続き日米で協力すると確認した)，而岸信夫表示「這是事關我國安全及人民安全的嚴重問題，我對此予以強烈譴責」(我が国の安全保障および国民の安全に関わる重大な問題だ。強く非難する)(朝日新聞，2022；日本經濟新聞，2022)。

2. 2023 年 4 月蔡英文總統過境美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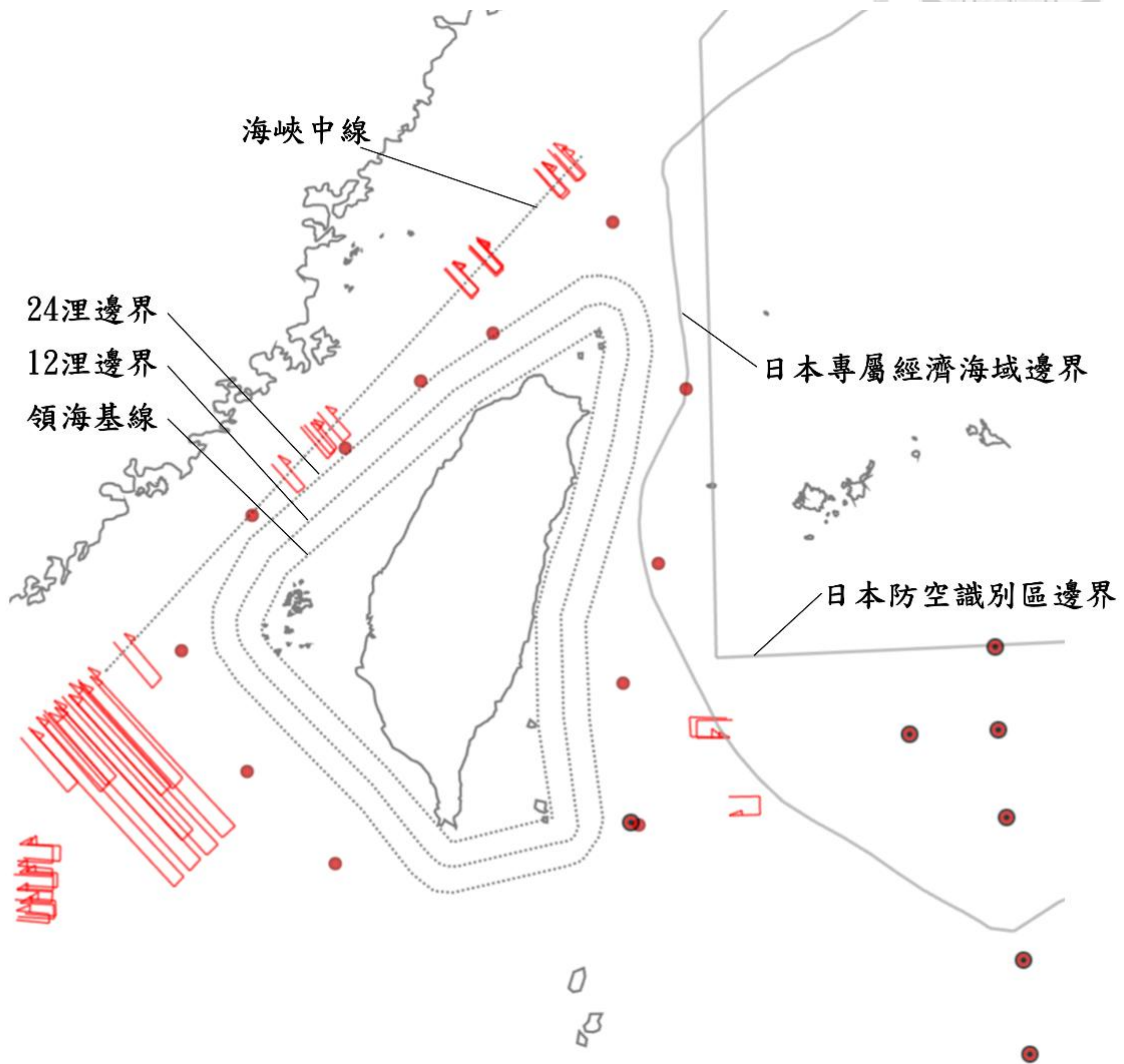
蔡英文總統 2023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7 日訪問中南美洲友邦，並於 4 月 5 日在過境美國加州時和時任聯邦眾議院議長麥卡錫(Kevin McCarthy)會面(中央通訊社，2023；中華民國總統府，2023)。

中國官媒新華社 2023 年 4 月 8 日宣布當日至 4 月 10 日將在臺灣周邊進行「聯合利劍」演習，並在 4 月 10 日宣布完成該軍事演習，宣稱解放軍部隊「堅決粉碎任何形式的臺獨分裂和外來干涉圖謀」；然而，參與本次演習的航母山東號編隊卻是從 4 月 7 日起持續在西太平洋地區進行活動直到 4 月 24 日才經巴士海峽向西返回南海，演習範圍示意圖如圖 3-3 (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2023；自由時報，2023；新華網，2023a, 2023b)。

解放軍針對蔡英文總統過境美國及會見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麥卡錫等狀況，派出從事對臺軍事演習的部隊在臺灣周圍活動長達至少 15 天，且海軍航母編隊不斷活動於日本所認定的專屬經濟海域，甚至有疑似進入日本劃設的防空識別區。



圖 3-3 2023 年 4 月中國對臺軍事演習示意圖



	中國宣布的軍事演習區
	臺灣發布的解放軍演習區
	解放軍空軍航跡
	解放軍海軍軍艦位置
	中國海警船位置
	中國航母編隊位置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 訊息溝通狀況良好

美中訊息溝通狀況轉好的關鍵點是 2023 年 6 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問中國；布林肯在訪問中國後表示，美中關係正處於不穩定時期，雙方都認識到需要努力穩定關係，並希望未來兩國有更好的溝通，更好的接觸(Reuters, 2023)。在此之後，美中部長級官員持續訪問對方國家，且間隔不超過 6 個月：2023 年 7 月美國財政部長葉倫訪問中國、2023 年 8 月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訪問中國、2023 年 10 月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訪問美國、2023 年 11 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訪問美國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美國、2024 年 4 月美國財政部長葉倫訪問中國、2024 年 8 月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訪問中國、2025 年 1 月中國國家副主席韓正訪問美國(中國外交部，2023b、2023c、2023d、2023e、2023f、2024a、2024b、2025)。

在這個狀況下，中國在 2024 年 5 月、2024 年 10 月、2024 年 12 月、2025 年 4 月分別對臺灣發動 4 次短暫軍事演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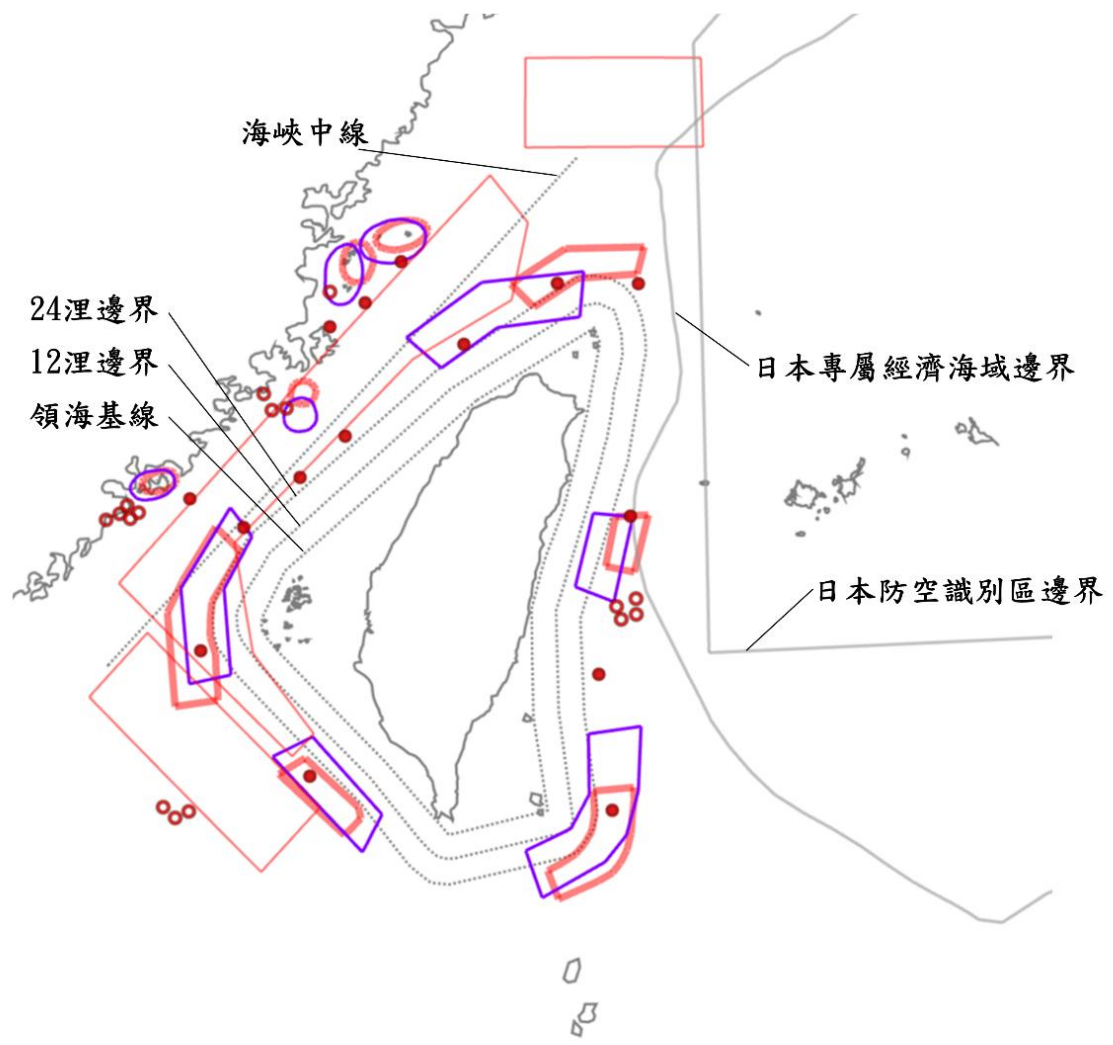
1. 2024 年 5 月賴清德總統就職演說






賴清德總統 2024 年 5 月 20 日發表就職演說，其中提及「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此一和北京當局的「一個中國原則」相悖的兩岸定位界定(中華民國總統府，2024a)。

中國官媒新華社 2024 年 5 月 23 日宣布將於該日至 5 月 24 日在臺灣周邊進行「聯合利劍-2024A」軍事演習，作為「對臺獨分裂勢力謀獨行徑的有利懲戒，對外勢勢力干涉挑釁的嚴重警告」，範圍示意圖如圖 3-4(中央通訊社，2024a；央視網，2024；新華網，2024a)。



圖 3-4 2024 年 5 月中國對臺軍事演習示意圖(5 月 23 日)



	中國宣布的軍事演習區
	臺灣發布的解放軍演習區
	解放軍空軍航跡
	解放軍海軍軍艦位置
	中國海警船位置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解放軍針對賴清德總統 2024 年 5 月的就職演說發動的軍事演習共 2 天，且所宣布的演習區未包含日本所認定的海空區域，而臺灣國防部所公布的解放軍主要活動區域也並非在日本所認定的海空區域內。



2. 2024 年 10 月賴清德總統國慶演說

賴清德總統 2024 年 10 月 10 日發表國慶演說，其中提及「中華民國已經在臺澎金馬落地生根，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民主自由在這塊土地上成長茁壯，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代表臺灣」等和北京當局所認定的「一個中國原則」相違背的概念(中華民國總統府，2024b)。

中國官媒新華社 2024 年 10 月 14 日宣布將於當日在臺灣周邊進行「聯合利劍-2024B」軍事演習，為「對臺獨分裂勢力謀獨行徑的強力震懾」，並於當日宣布演習完成，範圍示意圖如圖 3-5(中國海警局，2024；自由時報，2024；新華網，2024b, 2024c, 2024d)。

解放軍針對賴清德總統 2024 年 10 月的國慶演說發動軍事演習 1 天，且所宣布的演習區未包含日本所認定的海空區域，而臺灣國防部所公布的解放軍活動區域也未明顯進入日本所認定的海空區域。





3. 2024 年 12 月賴清德總統過境美國

賴清德總統 2024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6 日訪問南太平洋友邦，途中過境美國關島及夏威夷，並與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強生(Mike Johnson)等視訊、赴關島總督官邸及國會，以及參訪夏威夷州的急難管理署等行程(中央通訊社，2024b, 2024c,



圖 3-5 2024 年 10 月中國對臺軍事演習示意圖



	中國宣布的軍事演習區
	臺灣發布的解放軍演習區
	解放軍空軍航跡
	中國航母編隊位置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2024d, 2024e)。



臺灣國防部 2024 年 12 月 9 日發布新聞稿稱，解放軍當日宣布即日起至 12 月 11 日在中國浙江及福建沿海區域開設 7 處空域保留區，範圍示意圖如圖 3-6 (中華民國國防部, 2024; 聯合報 2024)。根據外媒路透社報導，匿名的臺灣國安高層(senior Taiwan security official)透露中國在臺灣、日本西南諸島、東海及南海部署將近約 60 艘軍艦及約 30 艘海警船，匿名美國軍方官員透露該軍事活動規模和過去其他大型軍事活動相符(Reuters, 2024a, 2024b)。

解放軍在賴清德總統 2024 年 12 月過境美國夏威夷後，在臺灣周邊進行約 3 天的軍事演習，但官方具體劃設的演習區域僅在臺灣海峽而未涉及日本海空域，且進入日本專屬經濟海域的為環繞臺灣飛行的解放軍無人機 1 架，鑒於該軍機任務明顯和解放軍劃設的演習區無關、行動標的為繞行臺灣而非徘徊於日本空域。因此整體來說，本次的軍事演習並沒有波及日本。

4. 2025 年 4 月賴清德總統主持國安高層會議會後記者會



賴清德總統 2025 年 4 月 13 日召開國家安全高層會議並主持會後記者會，其致詞內容提及的首個國安及統戰威脅內涵包括「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此不符北京當局界定的「一個中國原則」的概念(中華民國總統府, 2025)。

中國官媒新華社 2025 年 4 月 1 日和 4 月 2 日連續宣布當日在臺灣周邊進行軍事演訓行動，為「對臺獨分裂勢力的嚴重警告」，範圍示意圖如圖 3-7(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 2025; 央視網, 2025; 自由時報, 2025a、2025b; 新華網, 2025a、2025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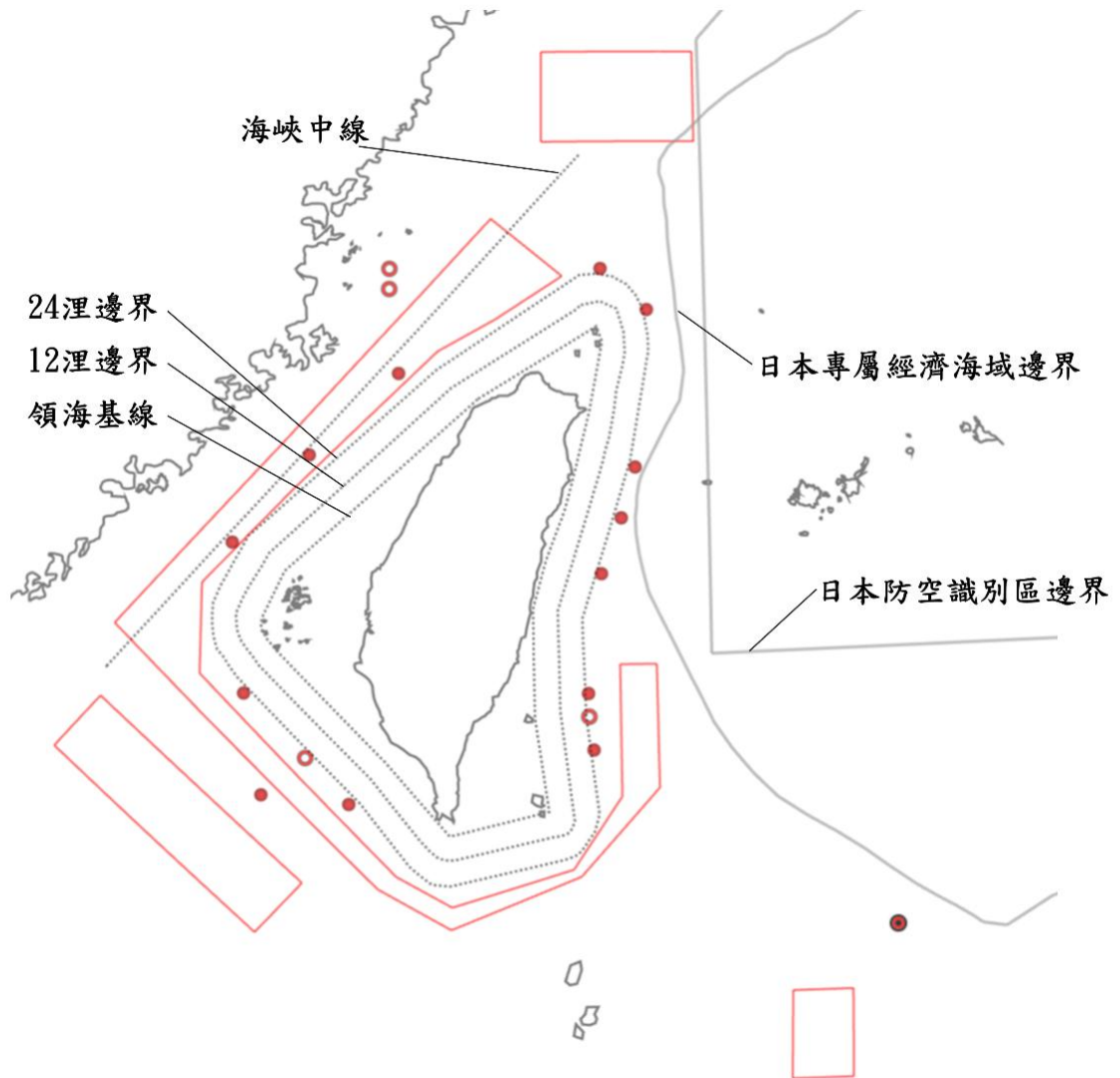
圖 3-6 2024 年 12 月中 國對 臺 軍 事 演 習 示 意 圖 (12 月 9 日 至 12 月 11 日)



	中國宣布的軍事演習區
	解放軍空軍航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 3-7 2025 年 4 月中國對臺軍事演習示意圖(4 月 1 日)



	中國宣布的軍事演習區
	臺灣發布的解放軍演習區
	解放軍空軍航跡
	解放軍海軍軍艦位置
	中國海警船位置
	中國航母編隊位置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解放軍對賴清德總統 2025 年 3 月「五大國安統戰威脅及十七項因應策略」講話發起的大型軍事演練共 2 天，且解放軍活動範圍未進入日本劃設的專屬經濟區及防空識別區。



第三節 小結

本文 11 個案例可以依照信號強度分為 4 種結果，如表 3-7。

表 3-7 本文 11 個案例的信號強度排序

年分	案例	自變數		依變數		信號強度排序
		溝通狀況	投射能力	軍演長短	波及第三國	
2022	議長訪問臺灣	差	足夠	多日	有	1
2023	總統入境美國		不足			
1995	總統入境美國					
2024	總統就職演說	佳	足夠	短	無	3
2024	總統國慶演說					
2024	總統入境美國					
2025	總統國安 17 條演說		不足	無		4
1997	總統入境美國					
1997	議長訪問臺灣					
1999	德國之聲採訪總統					
2000	總統入境美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一，當中國軍事投射能力足夠且美中訊息溝通情況差時，包含 2022 年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問臺灣、2023 年蔡英文總統過境美國，中國對臺灣發動多日軍事演習，且波及第三國日本。

第二，當中國軍事投射能力不足但美中訊息溝通情況差，包含 1995 年李登輝總統赴美國康乃爾大學演講，中國對臺灣發動多日的軍事演習，但未波及日本。



第三，當中國軍事投射能力足夠但美中訊息溝通情況佳，包含 2024 年賴清德總統過境美國、2024 年賴清德總統就職演說、2024 年賴清德總統國慶演說及 2025 年國安十七條等，中國對臺灣發動短暫軍事演習。

第四，當中國軍事投射能力不足且美中訊息溝通情況佳，包含 1997 年李登輝總統過境美國、1997 年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金瑞契訪問臺灣、1999 年李登輝總統接受德國之聲採訪及 2000 年陳水扁總統過境美國，中國並未對臺灣發動軍事演習。



第四章 國家的昂貴信號加強作為



本文提出 3 類的 6 項假說用以檢證本文提出的加強型昂貴信號機制，以及該機制是否符合昂貴信號理論核心邏輯。

第一節 訊息溝通狀態影響的檢證

本文核心是探討國家加強昂貴信號的原因，並基於既有昂貴信號文獻指出國家為確保決心正確地被他國所理解，須以昂貴成本的作為來彰顯意圖堅定程度，進一步推論當國家會擔憂決心比一般狀況更難理解時，也就是國家間訊息溝通狀況不佳時，會進一步提升信號強度，發送比一般型昂貴信號更強烈的加強型昂貴信號。故本文設定信號發送國和信號接受國之間的訊息溝通狀況不佳時，會使信號發送國加強發送信號，信號發送國將為了使接收國明確理解其強烈決心，進而以規模較大的軍演作為加強型昂貴信號；同時，若信號發送國與接受國訊息溝通狀況佳，信號發送國則沒有需要加強型昂貴信號，至多發動較小規模的軍演來發送一般型昂貴信號。

假說一：若信號發送國與接收國訊息溝通狀況佳，信號發送國會進行短暫軍演或不發動軍演。

本文信號發送國與信號接受國之間訊息溝通狀況佳的案例共有 8 個，其中 2024 年總統就職演說、2024 年總統國慶演說、2024 年總統入境美國、2025 年國安 17 條演說等 4 個案例為短暫軍演，而 1997 年總統入境美國、1997 年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訪問臺灣、1999 年德國之聲採訪總統、2000 年總統入境美國等 4 個案例為無

軍演。此顯示本文符合訊息溝通狀況佳的案例均僅進行短暫軍演或不發動軍演，確認假說一成立。



以 1997 年李登輝總統過境美國為例，當時美中兩國的訊息溝通狀況佳，雖然再次引起中國不滿，但整體美中雙方對此事已有充分溝通，情勢未如 1995 年般激烈對抗。此次過境，美方強調僅為安全、舒適與便利，沒有政治與外交意涵，態度顯得更為克制。中國確實再度表達關切，並有部分人士質疑其過境是否模糊一中政策底線，但實際上北京並未升高事態，主要考量江澤民訪美行程在即，不願破壞大局，且華府也明確告知中方將對李登輝的公開行為有所限制(Los Angeles Times, 1997)。

在這個情況下，即使李登輝 1995 年的美國行導致中國大為不滿並進行軍事演習，因為 1997 年美中兩國的訊息溝通狀況佳，兩國彼此進行的溝通能夠讓彼此信任，因此不需要以昂貴信號來確保對方國家理解自身意圖及決心。

假說二：若信號發送國與接收國訊息溝通狀況差，信號發送國會進行多日軍演。

本文信號發送國與信號接受國之間訊息溝通狀況差的案例共有 3 個，包含 2022 年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訪問臺灣、2023 年總統入境美國、1995 年總統入境美國，均為多日軍演的情況，確認假說二成立。


這些狀況符合既有昂貴信號的邏輯，也就是國家與其領導者的真實意圖與偏好無法靠單純言語或外交辭令就受到他國信服，因為即使國家公開聲稱自身偏好，也因存在偽裝以爭取更有利條件的可能性，使得單靠外交言辭難以提供可靠訊號，



必須以昂貴信號來展示自身的決心的真實性(Weinberger, 2003; Fearon, 1994, 1997)。基此，在比一般信任狀況更差、溝通狀況更糟的情況時，昂貴信號就可能更為昂貴，來展現更強烈地展現決心。

以 2023 年 4 月軍事行動為例，美國與中國在 2022 年 8 月的軍事行動後，9 月至隔年 2 月的 6 個月間公開互動 7 次，包含 2022 年 9 月美中外長在美國紐約聯合國大會場邊的會面(中國外交部，2022l)，以及 2022 年 11 月兩國元首在印尼 G20 場邊的會面(中國外交部，2022n)。然而，2023 年 1 至 2 月出現數顆疑似中國間諜氣球飛入美國空域的情況，並衍生為美中外交交鋒的新主軸，並導致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宣布取消赴北京訪問的計畫(The Washington Post, 2023)。

更重要的是，這些氣球的飛行路徑涵蓋多處高度敏感的軍事設施，包括部署洲際彈道飛彈的蒙大拿州馬姆斯特羅姆空軍基地(Malmstrom Air Force Base)、負責核武指揮與控制的內布拉斯加州奧福特空軍基地(Offutt Air Force Base)，以及駐有隱形轟炸機的密蘇里州懷特曼空軍基地(Whiteman Air Force Base)，這些地點皆為美國核武戰力核心。時任聯邦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特納(Mike Turner)指出，若將氣球路徑標示在地圖上，幾乎可與美軍所有最機密的戰略設施重疊。美國政府官員雖然指出該氣球未構成重大軍事威脅，並不具備超越中國先進間諜衛星的情報蒐集能力，但仍承認其飛越多個敏感軍事基地，並可能蒐集電子信號情報，例如基地人員通訊或武器系統發出的訊號。根據後續調查，氣球搭載多具天線、巨大的太陽能板與可即時傳輸大量數據的裝置，甚至還透過美國當地網路服務商進行通訊，顯示其具備一定程度的監控與通訊能力。儘管中國堅稱該氣球僅為氣象用途，美方仍針對其路徑採取預防措施，包括遮蔽敏感設施、轉移軍機與導彈等潛在目標、以及限制高度機密的核指揮系統訊息發布。最終，美軍空軍戰機將其擊落，並將其殘骸交由情報部門進行分析(NBC News, 2023a; The Guardian, 2023; NBC News, 2023b)。




美中的溝通狀況原先就已經比一般情況更不佳，這類具有軍事間諜性質的事件很可能會使得兩國的互信狀況更為惡化。在這個情況下，中國針對特定事件要對美國傳遞真實決心，就需要以較一般狀況更為昂貴的信號，來確保美國得以正確的理解。

第二節 軍事投射能力影響的檢證

本文另一個核心是確認軍事投射能力對於國家發送信號的影響，並根據現有昂貴信號文獻對於信號發送國的「信號不足」恐衍生被認為「決心不足」的後果，進一步推論國家實際的軍事投射能力會對於信號發送結果有所影響，且在不同信息溝通狀態時會有不同效果。本文設定若信號發送國與接受國之間的訊息溝通狀態佳，也就是國家認為透過外交管道表達立場是可以為對方國家所正確理解，又考量實際軍事投射能力不足時，信號發送國不會發動軍事演習，以免決心遭到低估；然而，若發送國與接受國的訊息溝通狀況差，發送國為避免決心遭到低估，反而會以有限的軍事投射能力發動多日軍事演習，以此展現其強烈的決心；同樣在信號發送國與接受國的訊息溝通狀況差時，若實際軍事投射能力足夠，發送國會發動多日軍演並波及第三國，以此展示其強烈決心。本文依照這3種情況來建立假說三、假說四和假說五。

假說三：在信號發送國與接受國訊息溝通狀況佳的情況下，若發送國軍事投射力不足，發送國不會發動軍事演習。

本文符合此狀態的案例共有4個，包含1997年總統入境美國、1997年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訪問臺灣、1999年德國之聲採訪總統、2000年總統入境美國，均為無軍演，確認假說三成立。




這個狀況符合既有理論關於決心展現的強調，也就是除了展現決心外，還必須要達到與「無決心」者不同的程度，否則決心反而可能被對手低估。昂貴信號的關鍵是，要讓可信型的行為者與不可信型者區分開來，但要達到這樣目的的關鍵是信號要有高昂的成本，而成本較小的行為會被對方視為虛張聲勢(Kydd, 2000; Slantchev, 2005; Altman & Quek, 2024)。因此，當信號無法有效彰顯決心，也就是很可能被對手視為欺騙或吹牛時，國家就不會發送信號。

以 1999 年李登輝總統在接受德國之聲受訪時闡述特殊國與國關係為例，北京當局對此相當不滿，國臺辦及解放軍報都在數日內就此表達批評及警告。然而，中國卻沒有像 2024 年賴清德總統的 5 月就職演說及 10 月國慶演說，以及 2025 年 3 月的國安 17 條一樣宣布發動大型對臺軍事演習。在 7 月 9 日李登輝總統接受德國之聲採訪後，中國才在 8 月下旬到 9 月上旬進行軍事演習，且部隊是分別在不具名的內陸高海拔地區、山東省、浙江省及廣東省等距離臺灣遙遠的地方進行操演，而海軍雖然在台灣北方某海域進行的反潛演習，卻強調是「意在加強潛艦攻擊能力、提升雷達掃描範圍及精確度」等具有驗證及訓練意涵的說明。同時，美國派出兩個航母戰鬥群至臺灣周邊巡弋(中國臺灣網，2009；The Guardian, 1999)。

這顯示中國在不具有軍事投射能力的情況下，沒有以對臺發動軍事演習作為昂貴信號，來向美國傳遞其政策決心。與此同時，美國與中國政府 7 月剛就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一事達成賠償協議，並且持續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一事進行協商，這也意味著美中的訊息溝通狀況佳，故中國不需要透過昂貴信號來向美國傳遞其決心。

假說四：在信號發送國與接受國訊息溝通狀況差的情況下，即使發送國軍事投射能力不足，仍會發動多日軍演，但不會波及第三國。



本文符合此狀態的案例為 1995 年總統入境美國，中國發動包含發射飛彈及兩棲登陸演練的演習項目，但實際上中國的軍事投射能力不足，因此僅能以連續多日發射飛彈至臺灣周邊海空域，搭配在中國沿海而地理位置與臺灣位置相距甚遠的兩棲登陸演練，故確認假說四成立。

進一步檢視中國針對 1995 年總統入境美國的軍事演習安排狀況，可以發現中國，特別是中國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在處於實際軍事投射能力不足的情況下，對於透過軍事演習發送昂貴信號的猶疑。第一，美國政府 5 月 22 日就公開發布同意核發李登輝赴美國的簽證(The New York Times, 1995b)。第二，李登輝總統係 6 月 7 日赴美國康乃爾大學，並於 6 月 12 日返回臺灣。第三，中國 6 月 17 日召回駐美國大使，並宣布取消關於美中核武和飛彈的會談，以及無限期延期國防部長遲浩田訪問美國的行程(The New York Times, 1995c)。

然而，中國卻是到 7 月 21 日起才開始發射飛彈及兩棲登陸演練等軍事演習。本文認為這很可能是因為中國最高領導人江澤民知悉解放軍實際軍事投射能力不足，故最初未以軍事行動作為首要選項，但在多項對美外交作為執行下仍認為無法有效地讓美國正確地理解中國的態度，故才決定在軍事投射能力不足的情況下，發動多日軍事演習。另有消息指出，江澤民 1995 年 5 月訪問俄羅斯回國後就已有收到軍方陳報的攻臺計畫，甚至有軍方鷹派將領要求其發動對臺軍事行動(趙春山，2019:49-52)；若這些訊息為真，其實是更加證明江澤民對臺發動軍事演習的猶豫，意味著實際軍事投射能力不足確實對於國家發送昂貴信號的考量是有影響的。

假說五：在信號發送國與接受國訊息溝通狀況差，且發送國軍事投射能力足夠時，發送國除了發動多日軍演外，還會在軍演期間波及第三國。


本文符合此狀態的案例為 2022 年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訪問臺灣及 2023 年總統入境美國，中國在這兩個案例中發動多日軍事演習且行動進入日本所認定的海空域，故確認假說五成立。



進一步檢視此兩個案例可以發現，昂貴信號核心邏輯確實存在，這包含中國知悉挑釁日本很可能會導致反制，並有具體歷史案例讓北京當局知悉其後果，以及案例中的中國挑釁行為確有導致日本反制。

首先，中國當局長年擔憂日本受到挑釁而擴張軍備。根據 Christensen (1999: 55-56; 61-62; 69-70) 在 1990 年代在北京和上海和中國專家進行超過 70 次訪談的發現，中國的專家們相當清楚雖然日本 1996 年的防衛態勢更趨積極，日本實際沒有全力的推動軍事擴張，特別是在遠離日本本土的投射能力方面展現高度的自我克制，因此關鍵是日本是否及何時會開始發展此類軍事能力。此外，中國專家認為日本的對中鷹派政治人物會將中國的挑釁行為作為進一步軍事擴張的藉口，而挑釁行為可能是向在臺灣周邊試射飛彈或在南海侵擾菲律賓控制的島礁。Christensen 指出，這些接受訪談的中國專家雖然只是任職於政府外圍智庫或單位，但他們的分析與意見會提供給所屬的軍方、外交和情報等政府部門參考，故分析具有價值。

除此之外，時任中國國務院參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弘(2014) 指出，日本政治有逐漸右傾化的趨勢，且在自民黨 2012 年底重掌政權後更加速此現象，且有意渲染「中國威脅論」，以此強化日美同盟及改變憲法對於發展軍事能力的限制。若再聚焦中國相當關注日本突破「專守防衛」方針關鍵「敵基地攻擊能力」的擔憂來觀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邱靜(2022) 2022 年初刊登的文章指出，日本對他國源頭打擊的防衛政策，雖然安倍晉三未成功推動、前任首相菅義偉任內沒有積極推動，但在時任首相岸田文雄任內很可能繼續推動，且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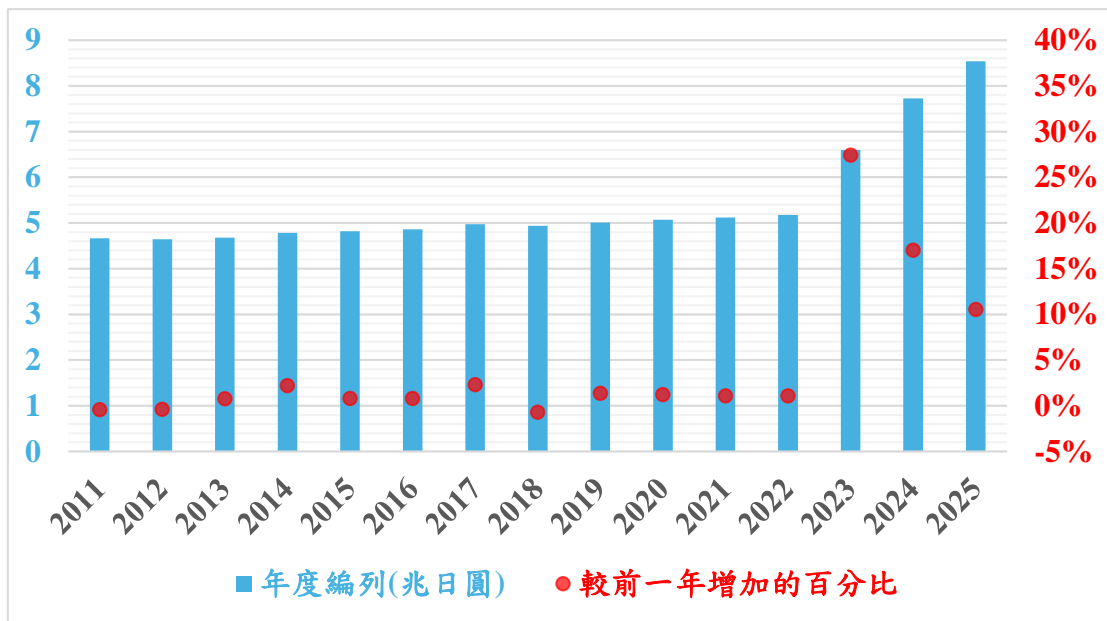
政府可能以「周邊態勢」及「國際局勢」為藉口，作為日本政界保守勢力擺脫戰後專守防衛體制的動力，進而渲染周邊安全情勢來推動「敵機地攻擊能力」。本文認為，從上述中國學者專家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當局對於日本受到中國挑釁後擴張軍備是有所預期和擔憂的。

其次，近年日本確實有曾因為中國軍事侵擾而提升軍備的前例。例如，中國針對日本國有化釣魚臺一事，自 2012 年起持續派出中國軍艦和公務船巡弋於釣魚臺周邊，並經常性地侵入日本所認定的鄰接區水域和領海。2012 年 12 月接任首相的安倍晉三，其領導的自民黨政府於 2013 年公布的防衛計畫大綱明確提及對於灰色地帶(gray-zone)問題的應對，也就是「圍繞領土、主權與經濟利益的對峙，但未升高為戰爭的情況」；這個政策明顯是針對中國在釣魚臺周邊海域對日本的侵擾，其包含強化日本西南諸島的駐軍，包含增加該些島嶼的空中預警機和陸上自衛隊兩棲部隊的兵力(Nakanishi, 2015: 409; Hornung, 2021: 30)。甚至，2014 年日本政府擴大解釋憲法第 9 條，也就是日本使用武力的條件新增「與日本關係密切的外國遭受武裝攻擊且威脅日本生存時」，也被認為是針對中國近年對日本海空域侵擾的回應(Hughes, 2016: 113, 130-131)。日本憲法第 9 條的限制鬆綁是日本使用武力和發展軍備的重要里程碑，這意味著日本的軍事能力和應用將比過去幾十年更為擴張，對中國來說是不小的軍事壓力。

最後，本文案例中日本確實有對中國進行反制，也就是解放軍 2022 年 8 月和 2023 年 4 月對臺軍演期間有侵擾日本所認定的海空域。這包含軍費顯著增長、確定「反擊能力」(即過去所稱「敵基地攻擊能力」)的建設及「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Official Security Assistance)的設立。第一，日本 2022 年底提出的 2023 年國防預算為 6.6 兆日圓，較前一年增加 27.4%，為 2011 年以來增幅最大的一次，且其後持續增長至 2025 年，趨勢如圖 3-8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11, 2012,

2013a, 2013b, 2015a, 2015b, 2016, 2017, 2019, 2021, 2022, 2023, 2024)。第二，日本 2022 年 12 月公布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確立日本將建立「反擊能力」(Standoff Strike Capabilities)，改變過去專守防衛的政策，開始建立主動、先制攻擊他國軍事基地的能力，這包含反艦飛彈和攻陸飛彈(Boswinkel, 2024; Jian, 2024; Narushige, 2023)。第三，「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在 2022 年 12 月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被提出，並在 2023 年 4 月開始運作，目的是要提供志同道合的國家財政援助、軍事裝備與物資，以加強這些國家的安全與嚇阻的能力(Jap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25; Jian, 2024)。

圖 3-8 近年日本軍費變動趨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要說明的是，這樣的發展很明顯是針對中國的，增加中國所面臨軍事壓力。第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自民黨內實力不足，是在採取麻生太郎與安倍晉三的強化日本國防方針下，才獲得他們兩位的支持，並獲選及延續首相一職，甚至在安倍晉三 2022 年 7 月去世後更加仰賴麻生太郎的支持(Teraoka & Sahashi, 2024)。麻生太郎多年來對於中國軍事威脅及「臺灣有事」問題相當關注，甚至在 2009 年就曾表



達支持「敵基地攻擊」，也就是後來所謂的「反擊能力」的建構，並負責主導自民黨和共同執政的公民黨協調 2022 年版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內容(朝日新聞，2021；東京新聞，2022；Newsweek Japan, 2009)。最終 2022 年版的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將「反擊能力」納入防衛能力建構重點，並具體就中國、北韓及俄羅斯問題提出論述；要強調的是，北韓及俄羅斯的部分均只提及日本的安全顧慮，但中國的部分卻具體提及日本應以綜合國力並與盟友及志同道合國家合作，積極應對中國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Jap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22)。這意味著 2022 年底以後的日本戰略規劃是明確有意針對中國，甚至是聚焦要針對中國的。

第二，日本 2022 年國家安保戰略報告中提及包含反擊能力、綜合防空能力、跨域電子網路作戰能力及戰力保存韌性等面向(Narushige, 2023)。這些軍事能力實質上是針對一個軍力與自身相等或更大的全方面敵軍作戰所需的，鑒於俄羅斯和北韓在日本周邊不具有全面作戰的能力，僅有中國具備完整的海空軍部隊可以和日本全面開戰，這些軍事整備實際上是為了中國的。例如，日本有意提升 12 式陸基反艦飛彈的射程由 200 公里提升至超過 900 公里，使部署在日本西南諸島的增程型 12 式陸基反艦飛彈的打擊範圍包含整個東海及大面積的菲律賓海(Schulenburg, 2025)。因為北韓和俄羅斯海軍在西太平洋地區的作戰能力其實遠不如日本，這樣強大的陸基反艦戰力很明顯是針對數量龐大且科技先進的中國海軍的，而這也使得中國軍艦受到日本反艦飛彈的威脅比以往更大。

第三，「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強化支援」(OSA)自 2023 年 4 月運作起，援助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及印尼等主要南海區域國家，而這些國家正是和中國在南海島礁有主權爭議的對手國，尤其是提供菲律賓空中及岸置雷達系統，加強菲律賓偵測中國在南海侵擾活動的能力(Ishimaru, 2024; Jap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25)。此政策將使受援助國家可以獲得日本的資源來提升國防或海巡能力，進而使中國



在南海地區的行動或擴張受到更大程度的抗衡。

綜上所述，在中國 2022 年 8 月和 2023 年 4 月對臺軍演期間連帶侵擾日本海空域後，日本政府確實顯著提升軍備，且政策文件、裝備科研採購及對外安全援助都有明顯針對中國的情形。這些作為將使得中國在周邊外交或軍事行動上都面臨更大的抵抗和威脅，實質上就是中國發送昂貴信號的成本。甚至，美國拜登政府也知悉日本自行決意要提升日本國防預算，且美國政府對於這段期間的日本軍備提升是沒有角色的；美國拜登總統就曾指出岸田文雄政府不須美國政府遊說，因為日本已經決定要增加國防預算(Teraoka & Sahashi, 2024: 525)。


第三節 昂貴訊號核心邏輯的檢證

最後，本文要再次檢查加強型昂貴信號是否符合既有昂貴信號文獻的基本邏輯。昂貴信號的目的是透過高昂成本來展示決心，因此即使國家有再強大的能力，若無需展示決心，也沒有無故產生高昂成本的必要。本文依此情況建立假說六。

假說六：在發送國與接受國訊息溝通狀況佳時，即使發送國軍事投射能力足夠，也不會在軍演期間波及第三國。

符合此情況的案例共有 4 個，包含 2024 年總統就職演說、2024 年總統國慶演說、2024 年總統入境美國、2025 年國安 17 條演說，均為中國軍事投射能力足夠時仍未進入到第三國日本的海空域活動，因此確認假說六成立。

這個狀況意味著以軍演波及第三國為形式的加強型昂貴信號，符合昂貴信號的邏輯，也就是信號的發送是於存在需要性的情況下，也就是在訊息溝通狀況不佳



時才會發送，而不僅是因為具有能力就無故發送加強型昂貴信號。一個的關鍵因素是，昂貴信號是具有高昂成本或風險的，進而可以和其他不具決心的國家進行區別 (Fearon, 1997: 69)。但這也意味著這會對信號發送國造成不小的損失，因此無需要是不會發送的。

具體來說，2024 年總統國慶演說和 2025 年國安 17 條演說此兩個案例所發生的軍事演習最適合說明這個狀況，因為這兩案例均有中國航母編隊進入西太平洋地區活動。對比 2023 年總統入境美國該案例中，航母山東號編隊刻意在日本專屬經濟區活動多日並疑似在日本防空識別區邊緣活動，2024 年總統國慶演說和 2025 年國安 17 條演說案例中的中國航母編隊均沒有刻意的在日本所認定的海空域活動。甚至，平時母港在山東青島的航母遼寧號編隊在 2024 年國慶演說的案例中，並不是從日本西南諸島水道進入西太平洋，而是經南海向東進入菲律賓海，明顯刻意不進入日本周邊海空域(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2024)。

第五章 結論



本文根據既有昂貴信號及挑釁的文獻，檢視當前理論及情勢分析上的空白之處。具體而言，本文在理論上檢證過去未被充分研究的加強型昂貴信號，並將其運用在尚未被系統性分析的中國對臺軍事演習的變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文就中國對臺軍事演習規模變化及侵擾第三國與否進行重新思索，以之檢驗過去未被探討的昂貴信號類型及其機制，並從中發現研究設計之外的現象。

一、研究設計之內的發現

(一) 對於案例的啟示

本文以昂貴信號理論的邏輯探討中國對臺灣的軍事演習，並探究軍事演習期間影響日本的原因。符合直觀的想法，當中華民國總統過境美國、中華民國總統發表違反北京當局一中原則立場的言論，以及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訪問臺灣等可能使中國不滿其涉及臺獨或臺灣倚美謀獨的事件時，中國會對臺灣發動軍事演習。

此外，本文發現美國或臺灣誰主導、在誰領土發生均不是必要條件，反而是中國的軍事投射能力和美中訊息溝通狀況是必要條件。具體來說，當美中訊息溝通狀況差的情況下，中國對臺灣的軍事演習規模較大。而當中國不具備軍事投射能力時，中國更傾向不發動軍事演習。因此，美中溝通良好與否和中國實際軍事投射能力狀



態，實際上是衝擊兩岸軍事情勢穩定的最重要因素。

至於中國對臺軍事演習期間侵擾日本的海空域，絕非意外之舉或單純因為日本西南諸島和臺灣距離相近所致。本文案例顯示，中國在軍事投射能力足夠的情況下，仍有多個案例沒有侵擾日本，甚至有刻意不取道日本西南諸島之間的水道，改以從南海向東航行進入西太平洋進行軍事演習的狀況。

因此，中國在對臺軍事演習期間侵擾日本的主要原因，仍是因為美日同盟下日本被中國視為美國的重要夥伴，被認為施壓日本就能延伸影響美國。重要的是，這意味著「中國對臺軍事演習時侵擾日本」並不符合所謂「臺灣有事，日本有事」的邏輯。根據前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2021 年的演講中提及「臺灣有事」的邏輯是，與那國島等日本離島離臺灣約 100 公里，任何對臺灣的武力侵犯，對日本國土而言都是重大的危險，並指出「臺灣有事」等同「日本有事」，也可以說是等同「日美同盟」有事(財團法人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2021)。

可以確定的是，日本的臺灣有事是指，因為臺灣和日本離島地理位置接近，使得兩岸的軍事衝突會影響日本領土安危，因此連動到日本與美國；然而，本文發現中國對臺軍演時侵擾日本的實際邏輯是，中國為了有效地對美國訊息溝通而進行挑釁日本的軍事行動，也就是日本被中國在軍事演習期間侵擾的主要原因不是地理位置或兩岸關係，而是因為美中訊息溝通狀況而受牽連。

這些發現的共同特性是，兩岸和日中之間，又甚至是整個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情勢的凶險程度，相當程度是受到美中關係所影響，而不盡然是個別國家對中國的關係所致。



(二) 與現有理論的對話

本文根據昂貴信號核心概念，也就是「國家要確保決心可以被對手正確理解」和「國家要確保信號能夠彰顯決心」，將理論解釋範圍擴及「加強信號」現象。

首先，本文以理論的根基「國家要確保決心可以被對手正確理解」，也就是國家的意圖或決心可能會被其他國家曲解或誤會，甚至是被其他國家認為是欺騙，因此需要以高昂成本或代價的行為來和其他潛在欺騙行為作出區別，因為欺騙者會為了欺騙而承擔高額成本。本文依照這個溝通困難的性質，進一步探討「比一般狀況溝通更加困難」的狀況，並以信號接受國和信號發起國之間部長級官員停止訪問對方國家超過 6 個月為標準進行測量。特別的是，這種「比一般狀況溝通更加困難」的狀況中，國家之間仍有部長級官員接觸，但僅為通電話或在國際會議場邊順帶交流，這和兩國之間存在合作項目而部長級官員訪問對方國家進行協商不同，前者的兩國互信狀況應該是遠不如後者的。甚至，這類非訪問對方國家的會談交流越頻繁，越可能代表兩國均認為有訊息溝通的必要，但無法達到彼此認為可傳遞本國政策意圖或決心的程度。

在這個情況下，國家鑒於一般的昂貴信號應用於一般的溝通困難狀況，在「比一般狀況溝通更加困難」的狀況應該會因此發送「加強型昂貴信號」，以確保本國的決心能正確地被對方國家理解。當前文獻已有探討國家同一個行為可能有多種信號類型的存在，例如 Quек (2021)，但大多強調不同信號類型的區分，而沒有探討國家可能刻意同時創造出「一般型昂貴信號」之外的「加強型昂貴信號」。本文運用軍事演習作為昂貴信號，基於既有文獻曾探討軍事演習可作為沉沒成本，進一步探討軍事演習時間長短、軍演是否侵擾第三國的加強型昂貴信號機制。本文透過假說驗證國家確實在「比一般狀況溝通更加困難」的狀況時會發送「加強型昂貴信

號」，並同時檢查確認「加強型昂貴信號」符合昂貴信號的基礎邏輯，也就是確實是只在「比一般狀況溝通更加困難」的狀況下會被發送，因為其具有昂貴成本使得國家不是只因為具有能力就進行發送。



另一方面，昂貴信號的另一核心概念是「國家要確保信號能夠彰顯決心」，而本文將其與近年關於國家發送昂貴信號限制的文獻進一步探討，例如盟國對於作戰傾向的行動考量和國內選民對威權政權厭惡的隱蔽考量，但這些並非信號發送本身的限制，而是國家政策考量造成的限制。本文根據昂貴信號所強調的彰顯「決心」邏輯，更深入地探究信號發送本身的限制，也就是國家「發送昂貴信號的能力」對於發送信號的考量。

本文係以軍事演習作為昂貴信號，因此探討「實際軍事投射能力」對信號發送的影響，並經過假說驗證確認實際軍事投射能力不足確實會導致國家選擇不發送昂貴信號，因為如果軍事演習規模有限而所涉及的成本不足，很可能會導致自身的決心被他國低估；同時，本文也發現當國家實際軍事投射能力不足時，若兩國之間處於「比一般狀況溝通更加困難」的狀況，這會導致國家選擇透過有限兵力但持續時間長的軍事演習，也就是「加強型昂貴信號」，來避免因軍演兵力有限而導致決心被他國低估。

在國家發送昂貴信號的機制之外，本文也針對昂貴信號本身進行新的探討，相當程度顯示昂貴信號值得探討的新面向。首先，既有文獻對於信號強度的比較，大多是聚焦在比較不同信號之間的強度差異。本文則聚焦單一信號但不同發送程度的強度差異。本文以軍事演習的長短及演習期間兵力是否影響第三國，來探討軍事演習作為昂貴信號的強度變化。本文透過假說驗證確認，昂貴信號的強度變化，也就是軍事演習程度大小，是國家根據訊息溝通狀態而變化的。這也意味著，本文未



探討的國內聽眾成本很可能也有去探討信號強度變化的價值。


成本生成的部分，本文除了包含既有文獻大多聚焦的國家內部成本，也就是軍事演習本身的國內沉沒成本外，嘗試探討過去較少被探討的生成於國家外部成本。本文探究軍事演習波及第三國所造成的沉沒成本，是因為軍事演習對第三國具有挑釁效果，而第三國會因此採取反制作為，使信號發送國在軍事和外交上受到更大的挑戰與阻力，是為生成於國家外部的成本。

基此，本文亦將看似與昂貴信號概念矛盾的挑釁融入信號機制中。挑釁的邏輯是國家的行為導致對方國家反制，因此信號發送國發送的昂貴信號如果產生挑釁效果，會使得信號接受國國內產生其政府對發送國退讓或容忍的聽眾成本，進而迫使信號接受國無法對信號發送國合作或退讓，導致信號發送國無法達成其發送昂貴信號的目標。但如果挑釁的效果不是產生在信號接受國，也就是被挑釁國和信號接受國不同，則被挑釁國對信號發送國的抵制所衍生的成本或代價，對於信號接受國來說就是一種「昂貴信號」。本文即以此種挑釁衍生的「昂貴信號」作為軍事演習本身產生的「國內沉沒成本」的「加強信號」，並且是一種過去文獻甚少探討的「國際沉沒成本」。

二、研究設計之外的發現

本文發現密集的「場邊外交」在特定情況下，很可能意味著兩國訊息溝通狀況不佳，甚至有危機即將發生。

在案例研究部分，美中在彼此針對許多議題有矛盾衝突、兩國部長級官員未密集未訪問對方國家的情況下，仍有許多「場邊外交」，也就是在國際會議場邊進行




會談。直觀上，這種場邊外交對雙邊關係來說應該是正面之事，象徵兩國官員積極地把握機會和對方國家進行接觸及互動，甚至可能是化解國際紛爭的重要方式。例如，主權國家與未廣受承認的國家在考量外交關係緊張或要避免造成具主權象徵意義的會面時，經常會採取權宜措施，例如在第三國或國際會議場邊會面，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衝突，並維持實質的溝通管道(Berg & Pegg, 2018; Cooley & Mitchell, 2010; Ker-Lindsay, 2015)。

然而，在一些條件下卻存在反直觀的意涵，也就是頻繁的「場邊外交」可能意味著兩國高層溝通狀況相當不理想。本文發現兩個長期存在頻繁互動的國家，若高階官員停止訪問對方國家，卻又密集地在第三國或國際會議場邊會面，就可能意味著兩國溝通狀況極差，甚至可能有危機即將爆發。

一般狀況下，兩國之間若雙邊關係佳，持續有在進行合作的項目或要進一步合作的協商，高階官員會密集地訪問對方國家進行會談。在此情況下，「場邊外交」確實就是兩國高層積極地在訪問對方國家之外把握機會接觸。然而，在沒有合作的情況下就可能代表兩國互信狀況不佳或關係惡劣，不存在高階官員訪問對方國家的需求，而尋求「場邊外交」進行會談可能是兩國為避免可預見的衝突進行的溝通嘗試。

讓情況變得糟糕的是，當兩國互信狀況不佳的情況下，國家很可能認為單次溝通難以使對方國家正確理解自身的政策立場及決心，而再次嘗試進行「場邊外交」。因此這種情況下的「場邊外交」越密集代表「訊息溝通」狀況越不佳。最終，國家可能會為了避免對方國家誤判，因此採取激烈手段發送昂貴信號，正如同本文所探討的中國對臺軍事演習。以 2022 年 8 月和 2023 年 4 月的軍事演習為例，當時美國和中國部長級官員長達約 27 個月未訪問對方國家，但卻有至少 27 次公開的交



流行程，其中不乏有會談單日 6 小時或連續會商兩日的情形，且雙方會後的新聞稿均提及「維持溝通」的必要性；但或許正是因為兩國高層實質訊息溝通狀況不佳，美中戰略競爭態勢激烈而預期潛在的衝突可能爆發，且因為兩國認為無法讓對方正確知悉本國政策立場或決心，因此才頻繁見面。然而，最終在訊息溝通狀況不佳的情況下，中國選擇發動對臺軍事演習並侵擾日本，以發送加強型昂貴信號來對美國進行溝通，確保美國能正確理解其決心。

因此，從昂貴信號理論的視角來看，場邊外交不必然是一項正面發展。特別是在兩國曾長期密切合作的背景下，若於雙方缺乏互信或合作關係中斷之際，反而頻繁透過第三國場合進行接觸與會談，其密集互動程度可以作為觀察雙邊關係惡化程度及危機潛勢的重要指標。

第二節 研究不足之處及未來研究方向

一、研究不足之處

本文未能克服 4 項不足之處，值得未來研究來嘗試解決。

第一，訊息溝通狀況宜更細緻探討。本文暫以探索性研究的角度，檢視訊息溝通狀況在有明顯差別的情況下，是否會使得國家發送加強型昂貴信號；文中的訊息溝通是否不佳係二元性次序變數，但實際的溝通狀況應該是更多元的，甚至是連續的等比變數。故訊息溝通狀況的變化在本文中仍有探索未盡之處。

第二，軍事投射能力的探討宜更加完整。本文案例係位於兩岸及西太平洋，故本文軍事投射能力的具體指標探討聚焦海戰與空戰能力。然而，實際作戰的面相不

只是此兩種，陸戰及網路戰等其他作戰面向在不同地理範圍的案例中可能就需作為具體指標，而這可能使得軍事投射能力的變化有所不同。故實際軍事投射能力的測量很可能仍有本文尚未探討之處。



第三，軍事活動作為昂貴信號的程度可以更為擴大。本文係以中國有公開發布的軍事演習作為中國發送昂貴信號的標準，但實際上中國疑似多次在未公開宣布的情況下發動大規模軍事訓練或行動，例如大型的聯合戰備警巡。因此若將一定規模以上的軍事行動也作為昂貴信號，或可使得對於昂貴信號發送的程度變化有更完整的掌握。然而，如本文研究設計中所述，兵力規模大小仍可能受到國家發送昂貴信號即是要避免戰爭爆發的邏輯限制，兵力規模變化的上限可能會影響測量，因此規模大小的界定與測量需審慎設計。


第四，案例的多元性可更為提升。本文係以中華民國總統入境美國、中華民國總統發表抵觸北京當局一中原則的講話、時任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訪問臺灣等可能被北京當局認定為推動臺獨或倚美謀獨的情形，然而中國所認定的臺獨行徑可能不止此3類情形，例如美國行政部門官員訪臺、美國對臺軍售、雙邊或多邊外交聲明提及臺灣問題等。若探討這些類型案例，不排除會發現中國發送昂貴信號的其他考量。

二、未來研究方向

綜上所述，本文的探索主題「加強型昂貴信號」後續仍有值得研究的面向。

首先，宜以統計方法或賽局理論探討加強型昂貴信號。本文是以質性研究方法探索過去未獲得重視的理論範疇，但論點的解釋能力和細部邏輯仍有不小的探索

空間；統計方法與賽局理論為更成熟與更全面探討加強型昂貴信號的可行作法，尤其是本文在第一章第三節研究限制中所述，訊息溝通狀態實際上屬於連續變數，更



是需要這些方法進一步驗證。

其次，本文探討的「第三國」概念，也預示著可能存在探討「第四國」概念的價值。本文探討的第三國價值是，信號發送國可以透過第三國來向信號接受國發送昂貴信號，邏輯是信號接受國可以觀察到第三國造成信號發送國的成本或代價，因此理解信號發送國的決心。鑒於本文的信號接受國和第三國均為信號接受國所設計要「明確影響」的對象，或許還有所謂「不明確影響」的對象，例如要更宏觀的向區域各國或全球展示信號發送國的決心。以本文的案例研究為例，中國很可能有意透過昂貴信號，向區域或全世界透露對於反對臺灣「倚外謀獨」的決心。這個研究直觀上是合理的，故在適當的研究設計下可能得以驗證。



參考文獻



第一節、中文資料

一、專書

馬紹章(2016)。走兩岸鋼索。天下文化。

趙春山(2019)。兩岸逆境：解讀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的對治策略。
天下文化。

二、期刊論文

邱靜(2022)。〈日本“對敵基地攻擊能力”討論新動向〉。《日本學刊》，(2)，135-163。

時殷弘(2014)。〈日本政治右傾化和中日關係的思維方式及戰略策略問題〉。《國際問題研究》，(2)，1-14。

三、網路資料來源

人民網(2015)。走進五角大樓的解放軍將領。人民網。

https://paper.people.com.cn/hqrw/html/2015-06/26/content_1662809.htm，
2025/05/14。



中央通訊社(2020)。李登輝康乃爾大學演說 臺美關係重大突破。中央通訊社。

<https://project.cna.com.tw/20200730-LeeTenghui/202007300355>，2025/05/14。

中央通訊社(2022a)。李登輝與江澤民多次過招 18 套劇本因應臺海飛彈危機。中

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211300345.aspx>，

2025/05/14。

中央通訊社(2022b)。專家憂中共軍演威脅超過 96 臺海危機 考驗國軍應變。中央

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aip1/202208030146.aspx>、

https://imgcdn.cna.com.tw/www/WebPhotos/1024/20220803/2000x1999_0165220934021.jpg，2025/05/13。

中央通訊社(2022c)。國防部：中共向臺灣周邊海域發射 11 枚東風飛彈 國軍啟動防禦系統。中央通訊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ip1/202208045003.aspx>，2025/05/14。

中央通訊社(2022d)。25 年前美議長金瑞契訪臺行 阻中犯臺強硬言論鮮明。中央

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aip1/202208020274.aspx>，2025/05/13。

中央通訊社(2022e)。中共軍演首日逾百班機及船舶繞道進出臺灣。中央通訊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ip1/202208030304.aspx>，2025/05/15。

中央通訊社(2023)。蔡麥歷史會晤 蔡英文感謝美支持、麥卡錫稱臺美友誼是和平

關鍵。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aip1/202304060019.aspx>，

2025/05/13。



中央通訊社(2024a)。中共 31 船艦 42 軍機對臺軍演 國防部：加強情監偵、視威脅調整兵力。中央通訊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ip1/202405230318.aspx>，2025/05/14。

中央通訊社(2024b)。賴總統訪南太 3 友邦返臺 空軍 4 架 F-16V 執行專機護航任務。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aip1/202412060371.aspx>，

2025/05/15。

中央通訊社(2024c)。賴總統訪夏威夷急難管理署：未來持續交流合作。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aip1/202412060114.aspx>，2025/05/13。

中央通訊社(2024d)。賴總統關島過境與美眾院議長強生通話 談應對中國挑戰。

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aip1/202412050241.aspx>，

2025/05/14。

中央通訊社(2024e)。賴總統訪問帛琉與總統惠恕仁會晤 強調深化雙邊合作。中

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aip1/202412050035.aspx>，

2025/05/15。

中國外交部(2021a)。楊潔篪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舉行會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110/t20211007_9586056.shtml，2025/05/13。

中國外交部(2021b)。楊潔篪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舉行會晤。中華

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110/t20211007_9586056.shtml，2025/06/08。



中國外交部(2021c)。楊潔篪應約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106/t20210611_9183470.shtml，2025/06/08。

中國外交部(2021d)。王毅應約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108/t20210817_9183484.shtml，2025/06/08。

中國外交部(2021e)。王毅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108/t20210829_9183486.shtml，2025/06/08。

中國外交部(2021f)。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通電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109/t20210910_10413474.shtml，2025/06/08。

中國外交部(2021g)。王毅會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110/t20211031_10416798.shtml，2025/06/08。



中國外交部(2021h)。王毅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111/t20211113_10447798.shtml，2025/06/08。

中國外交部(2021i)。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視頻會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111/t20211116_10448827.shtml，2025/06/08。

中國外交部(2022a)。王毅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舉行會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207/t20220709_10717967.shtml，2025/05/14。

中國外交部(2022b)。王毅應約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201/t20220127_10634923.shtml，2025/06/08。

中國外交部(2022c)。王毅應約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202/t20220222_10644348.shtml，2025/06/08。

中國外交部(2022d)。王毅應約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203/t20220305_10648368.shtml，2025/06/08。

中國外交部(2022e)。楊潔篪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舉行會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203/t20220315_10651720.shtml，2025/06/08。

中國外交部(2022f)。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視頻通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203/t20220319_10653187.shtml，2025/06/08。

中國外交部(2022g)。楊潔篪應約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通電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205/t20220519_10688697.shtml，2025/06/08。

中國外交部(2022h)。楊潔篪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舉行會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206/t20220614_10702616.shtml，2025/06/08。

中國外交部(2022i)。王毅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舉行會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207/t20220709_10717967.shtml，2025/06/08。

中國外交部(2022j)。習近平向拜登總統致慰問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207/t20220722_10726321.shtml，2025/06/08。

中國外交部(2022k)。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通電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207/t20220729_10729582.shtml，2025/06/08。

中國外交部(2022l)。王毅會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209/t20220924_10770872.shtml，2025/06/08。

中國外交部(2022m)。王毅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210/t20221031_10794377.shtml，2025/06/08。

中國外交部(2022n)。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在巴厘島舉行會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211/t20221114_10974651.shtml，2025/06/08。



中國外交部(2022o)。習近平同美國副總統哈裡斯簡短交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211/t20221119_10978067.shtml，2025/06/08。

中國外交部(2022p)。王毅應約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212/t20221223_10994197.shtml，2025/06/08。

中國外交部(2023a)。秦剛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舉行會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306/t20230619_11099462.shtml，2025/05/15。

中國外交部(2023b)。李強會見美國財政部長耶倫。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307/t20230707_11110032.shtml，2025/05/13。

中國外交部(2023c)。李強會見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308/t20230829_11135219.shtml，2025/05/14。

中國外交部(2023d)。王毅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舉行首日會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310/t20231027_11169407.shtml，2025/05/15。



中國外交部(2023e)。何立峰將訪問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311/t20231106_11174624.shtml，2025/05/13。

中國外交部(2023f)。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中美元首會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311/t20231116_11181125.shtml，2025/05/14。

中國外交部(2023g)。王毅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舉行會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305/t20230512_11075777.shtml，2025/06/08。

中國外交部(2023h)。外交部長秦剛大使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301/t20230102_10999728.shtml，2025/06/08。

中國外交部 (2023i)。王毅應約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



/xgxw_680534/202302/t20230204_11019692.shtml , 2025/06/08。

中國外交部 (2023j)。秦剛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306/t20230614_11096239.shtml , 2025/06/08。

中國外交部(2024a)。李強會見美國財政部長耶倫。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404/t20240407_11277519.shtml , 2025/05/15。

中國外交部(2024b)。中美在北京開始舉行新一輪戰略溝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408/t20240827_11480115.shtml , 2025/05/14。

中國外交部(2025)。韓正會見美國當選副總統萬斯。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202501/t20250120_11539096.shtml , 2025/05/13。

中國海警局(2024)。4支海警艦艇編隊開展環臺島巡航管控。中國海警局。

https://www.ccg.gov.cn/hjyw/202410/t20241014_2503.html , 2025/05/15。

中國新聞網(2011)。中國同美國的關係。中國新聞網。

<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11/01-18/2794915.shtml> , 2025/05/14。



中國臺灣網(2009)。「【史海】回顧驚心動魄的 5 次臺海危機」。中國臺灣網。

http://www.taiwan.cn/jl/zl/zl/200910/t20091009_1016958.htm，2025/06/28。

中華民國國防部(2024)。國防部發布新聞稿，針對「中共設 7 處空域保留區」乙情說明。中華民國國防部。

<https://www.mnd.gov.tw/Publish.aspx?p=83790&title=%E5%9C%8B%E9%98%B2%E6%B6%88%E6%81%AF&SelectStyle=%E6%96%B0%E8%81%9E%E7%A8%BF>，2025/05/13。

中華民國總統府(1997)。總統率團前往中南美洲訪問。中華民國總統府。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4179>，2025/05/15。

中華民國總統府(1999)。總統接受德國之聲專訪。中華民國總統府。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5749>，2025/05/13。

中華民國總統府(2000)。總統在美國洛杉磯會見美國在臺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

中華民國總統府。<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7076>，2025/05/14。

中華民國總統府(2023)。「民主夥伴共榮之旅」 總統將出訪瓜地馬拉及貝裡斯盼達成「民主深化」、「共榮發展」兩大目標。中華民國總統府。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7389>，2025/05/15。

中華民國總統府(2024a)。總統發表就職演說 宣示打造民主和平繁榮的新臺灣。

中華民國總統府。<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8428>，2025/05/14。

中華民國總統府(2024b)。團結台灣 共圓夢想 總統發表國慶演說。中華民國總統府。<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8775>，2025/05/15。



中華民國總統府(2025)。總統主持國安高層會議會後記者會 提五大國安統戰威脅及十七項因應策略 籲請國人團結抵抗分化。中華民國總統府。<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39105>，2025/05/13。

央視網(2024)。東部戰區位臺島周邊開展“聯合利劍—2024A”演習。央視網。<https://news.cctv.com/2024/05/23/ARTIjs9C8LbOi22L2ttySeUh240523.shtml>，2025/05/14。

央視網(2025)。中國海軍艦艇在臺灣周邊海域進行實彈演習。央視網。<https://military.cctv.com/2025/04/02/ARTIjH4eIDKJseYpxv4QXeIh250402.shtml>，2025/05/15。

自由時報(2022)。中共軍演「封鎖台灣」？黃澎孝揭一關鍵「自曝其短」。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4020061>，2025/05/13。

自由時報(2023)。國防部：中國對臺軍演船艦「沒有進到 24 浬」。自由時報。<https://def.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4268388>，2025/05/14。

自由時報(2024)。一天練兵完畢？中共東部戰區宣佈「聯合利劍-2024B」軍演結束。自由時報。<https://def.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4830542>，2025/05/15。



自由時報(2025a)。中共對臺針對性演習 揭仲：對賴政府 17 項國安策略表態。自由時報。<https://def.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4998640>，2025/05/13。

自由時報(2025b)。中國環臺軍演出動 49 機艦、10 海警船 海巡證實 3 海上民兵船參與。自由時報。<https://def.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4999829>，2025/05/14。

沈明室(2022)。臺海危機再臨？兩次臺海危機比較。國防安全研究院。<https://indsr.org.tw/focus?uid=11&pid=408&typeid=26>，2025/05/15。

財團法人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2021)。「日本國元內閣總理大臣安倍晉三閣下線上演講會」辦理情形。財團法人國策研究院文教基金會。<https://www.inpr.org.tw/activityDetail/125?lang=zh-tw>，2025/05/14。

華視(1997)。李總統抵夏威夷拜會張學良。華視新聞。<https://news.cts.com.tw/cts/politics/199709/199709050007744.html>，2025/05/14。

新華網(2015)。“小”故事串起的中美“大”外交。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22/c_128254408.htm，2025/05/15。

新華網(2016)。中央軍委關於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意見。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6-01/01/c_1117646695.htm，2025/05/13。

新華網(2019)。新時代的中國國防。新華網。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7/24/c_1124792450.htm , 2025/05/13 。

新華網(2020)。習近平在中央軍委軍事訓練會議上強調 全面加強實戰化軍事訓練
全面提高訓練水準和打贏能力。新華網。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11/25/c_1126786197.htm ,
2025/05/13 。

新華網(2022a)。新華社受權公告。新華網。 https://www.news.cn/2022-08/02/c_1128885591.htm , 2025/05/13 。

新華網(2022b)。東部戰區火箭軍部隊對臺島東部外海預定海域實施常導火力突
擊，全部精準命中目標。新華網。 https://www.news.cn/tw/2022-08/04/c_1128889932.htm , 2025/05/14 。

新華網(2022c)。東部戰區在臺島周邊海空域組織的聯合軍事行動成功完成各項任
務。新華網。 https://www.news.cn/2022-08/10/c_1128905267.htm ,
2025/05/15 。

新華網(2023a)。東部戰區將組織環臺島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新華網。
https://www.news.cn/2023-04/08/c_1129503711.htm , 2025/05/13 。

新華網(2023b)。東部戰區圓滿完成環臺島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新華
網。 https://www.news.cn/tw/2023-04/10/c_1129509763.htm , 2025/05/14 。

新華網(2024a)。受權發佈 | 東部戰區位臺島周邊開展“聯合利劍—2024A”演習。



新華網。

<https://www.news.cn/20240523/15a1558dc01143ea972e2c9b98646a5d/c.html>，
2025/05/15。

新華網(2024b)。受權發佈 | 東部戰區開展“聯合利劍—2024B”演習。新華網。

<https://www.news.cn/20241014/c9d34c1052f84b49a258c3bcfada917d/c.html>，
2025/05/13。

新華網(2024c)。東部戰區圓滿完成“聯合利劍—2024B”演習。新華網。

<https://www.news.cn/tw/20241014/cdad914d30f499487d634cf457119b5/c.html>
， 2025/05/14。

新華網(2024d)。東部戰區發佈“聯合利劍—2024B”演習區域示意圖。新華網。

<https://www.news.cn/tw/20241014/6f8f9a09342b4afcb4aa80f427658f67/c.html>，
2025/05/15。

新華網(2025a)。受權發佈 | 東部戰區組織陸海空火等兵力位元臺島周邊開展聯合演訓。新華網。

<https://www.news.cn/tw/20250401/ef721b532e31455186f10cb18d088719/c.html>
， 2025/05/13

新華網(2025b)。受權發佈 | 東部戰區位臺灣海峽中部、南部相關海域組織“海峽雷霆-2025A”演練。新華網。

<https://www.news.cn/tw/20250402/2bca827b151d4763bc931db5830a33cb/c.html>
， 2025/05/14。

聯合報(2024)。陸劃設 7 保留空域三天 民航局：航班正常不受影響。聯合報。

<https://udn.com/news/story/10930/8417954>，2025/05/15。



第二節、外文資料

一、專書

Gerring, J. (2016). *Case Study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orge, A. L., & Bennett, A. (2005).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MIT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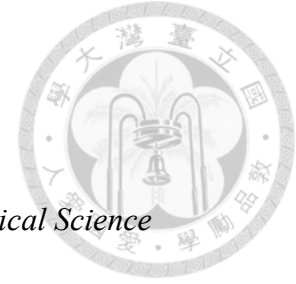
Jervis, R. (1970).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ost, A. (2019). Flying to fail: Costly signals and air power in crisis bargaining.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3(4), 869-895.

Qi, H., & Li, M. (2023). U.S. military signals to China in the Asia-Pacific, 2015-2022. *The China Review*, 23(4), 197-228.

Quek, K. (2016). Are costly signals more credible? Evidence of sender-receiver gap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8(3), 925-940.



Quek, K. (2021). Four costly signaling mechanis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5(2), 537-549.

Post, A. S., & Sechser, T. S. (2024). Hand-tying through military signals in crisis bargain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8(2), sqae028.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96). *The Military Balance 1996*.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01).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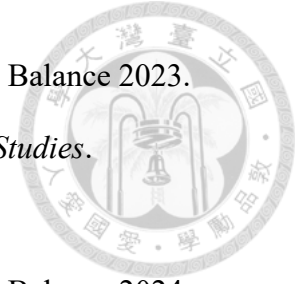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20).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0*. London: Routledge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21).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1*. London: Routledge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22).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2*. London: Routledge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23).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3*.

London: Routledge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24).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4*.

London: Routledge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2025). *The Military Balance 2025*.

London: Routledge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二、期刊論文

Alim, E. (2022). Russia's power projection into Syria and its interactions with local states. *Contemporary Review of the Middle East*, 98(4), 1385-1404.

Altman, D., & Quek, K. (2024). Do states really sink costs to signal resolve?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9(2), ogae008.

Bakich, S. D. (2020). Signalling capacity and crisis diplomacy: Explaining the failure of 'maximum pressure' in the 2017 U.S.-North Korea nuclear crisi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45(5), 692-717.

Berg, E., & Pegg, S. (2018). Scrutinizing A Policy of "Engagement Without Recognitio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4(3), 388-407.



Bennett, A., & Elman, C. (2006). Qualitative research: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ase study method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9, 455-476.

Boswinkel, L. (2024). Forever bound? Japan's road to self-defence and the US alliance. *Survival*, 66(3), 105-128.

Carson, A., & Yarhi-Milo, K. (2017). Covert communication: The intelligibility and credibility of signaling in secret. *Security Studies*, 26(1), 124-156.

Caverley, J. D., & Dombrowski, P. (2020). Cruising for a bruising: Maritime competition in an anti-access age. *Security Studies*, 29(4), 671-700.

Christensen, T. J. (1999).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4), 49-80.

Cebul, M. D. (2023). Mediated audience costs: Jordan-Israeli diplomacy before the 1967 Arab-Israeli War.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8(1), ogac038.

Chao, B. C., & Cho, H.-B. (2023).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and signaling at se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23(3), 511-539.

Cho, H.-B., & Chao, B. C. (2025). Muddied waters: Freedom-of-navigation operations as signal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7(1), 154-178.



Cho, H.-B., Haynes, K., & Yoder, B. K. (2024). Provocation, bargaining, and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8(7-8), 1307-1331.

Cooley, A., & Mitchell, L. A. (2010). Engagement without recognition: A new strategy

toward Abkhazia and Eurasia's unrecognized state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3(4), 59-73.

Crisher, B. B., & Souva, M. (2014). Power at sea: A naval power dataset, 1865-2011.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40(4), 602-629.

Dafoe, A., Hatz, S., & Zhang, B. (2021). Coercion and provoc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5(2-3), 372-402.

Elman, C. (2005). Explanatory typologies in qualitativ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9(2), 293-326.

Erickson, A. S. (2014). Rising tide, dispersing wav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Chinese seapower development.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37(3), 372-402.

Fearon, J. D. (1994). 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3), 577-592.

Fearon, J. D. (1997). 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1(1), 68-90.



- Fuhrmann, M., & Sechser, T. S. (2014). Signaling alliance commitments: Hand-tying and sunk costs in extended nuclear deterr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8(4), 919-935.
- Gerring, J. (2012). Mere descrip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4), 721-746.
- Hall, T. H. (2017). On provocation: Outrag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Franco-Prussian War. *Security Studies*, 26(1), 1-29.
- Haynes, K. (2019). A question of costliness: Time horizons and interstate signaling.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3(8), 1939-1964.
- Hughes, C. W. (2016). Japan's 'resentful realism' and balancing China's ris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9(2), 109-150.
- Nakanishi, H. (2015). Reorienting Japan: Security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second Abe cabinet. *Asian Perspective*, 39(3), 405-421.
- Jian, J. (2024). Japan's altered defence roadmap in a new era. *East Asian Policy*, 16(3), 7-20.
- Ker-Lindsay, J. (2015). Engagement without recognition: The limits of diplomatic interaction with contes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91(2), 267-285.



Kim, Y. G. (2025). Lack of resolve or military infeasibility? Explaining reduced punishments during the 1936 Rhineland Crisis and the 2010 shelling of Yeonpyeong Island. *Pacific Focus*, 40(1), 145-174.

Kurizaki, S. (2007). Efficient secrecy: Public versus private threats in crisis diplo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1(3), 543-558.

Kydd, A. (2000). Trust, reassurance, and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4(2), 325-357.

Lektzian, D. J., & Sprecher, C. M. (2007). Sanctions, signals, and militarized conflic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1(2), 415-431.

Levy, J. S. (2008). Case studies: Types, designs, and logics of inference.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25(1), 1-18.

Lijphart, A. (1971).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3), 682-693.

Markowitz, J. N., & Fariss, C. J. (2018). Power, proximity, and democracy: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5(1), 78-93.

McManus, R. W., & Sendinç, T. (2024). Sending the B team: The impact of lesser signals of resolv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62(3), 580-594.



McManus, R. W., & Yarhi-Milo, K. (2017). The logic of “offstage” signaling: Domestic politics, regime type, and major power-protégé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1(4), 701-733.

McManus, R. W. (2018). Making it personal: The role of leader-specific signals in extended deterrenc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80(3), 982-995.

Nakanishi, H. (2015). Reorienting Japan? Security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Second Abe Cabinet. *Asian Perspective*, 39(3), 405-421.

Ross, R. S. (2000). The 1995-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Coercion, credibility, and the use of for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2), 87-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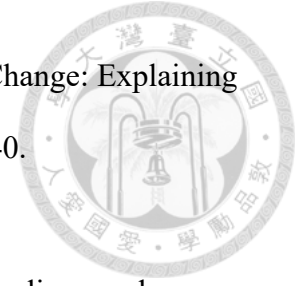
Sechser, T. S. (2018). Reputations and signaling in coercive bargaining.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2(2), 318-345.

Slantchev, B. L. (2005). Military coercion in interstate cris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4), 533-547.

Speller, I. (2006). The seaborne/airborne concept: Littoral manoeuvre in the 1960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9(1), 53-82.

Sukin, L. (2022). Why "cheap" threats are meaningful: Threat perception and resolve in North Korean propagand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48(5), 936-967.

Teraoka, A., & Sahashi, R. (2024). Japan's Revolutionary Military Change: Explaining Why It Happened Under Kishida. *Pacific Affairs*, 97(3), 519-540.



Weeks, J. L. (2008). Autocratic audience costs: Regime type and signaling resol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2(1), 35-64.

Weinberger, S. (2003). Institutional signaling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Security Studies*, 12(4), 80-115.

Weisiger, A., & Yarhi-Milo, K. (2015). Revisiting reputation: How past actions matt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9(2), 473-495.

Weiss, J. C. (2013). Authoritarian signaling, mass audiences, and nationalist protest in Chin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7(1), 1-35.

Wolford, S. (2014). Showing restraint, signaling resolve: Coalitions, cooperation, and crisis bargain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8(1), 144-156.

Yarhi-Milo, K., Kertzer, J. D., & Renshon, J. (2018). Tying hands, sinking costs, and leader attribut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2(10), 2150-2179.

Yoder, B. K., & Spaniel, W. (2022). Costly concealment: Secret foreign policymaking, transparency, and credible reassur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6(4), 868-900.

Zegart, A. (2018). Cheap fights, credible threats: The future of armed drones and coercion.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43(1), 6-46.

三、網路資料來源



BBC. (2020). Hong Kong: US passes sanctions as nations condemn new law.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53259656>. (Accessed: 14 May 2025).

BBC. (2022). Nancy Pelosi begins Asia tour, with no mention of Taiwan.
<https://www.bbc.com/news/world-us-canada-62367362>. (Accessed: 13 May 2025).

CCTV. (2005). Sino-US relations.
<https://www.cctv.com/english/special/C14623/20050909/100465.shtml>. (Accessed:
15 May 2025).

Chu, J. (2022). The New Arms Race: Sanctions, Export Control Policy, and China.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s://www.csis.org/analysis/new-arms-race-sanctions-export-control-policy-and-china>. (Accessed: 15 May 2025).

CNBC. (2021). First 100 days: Biden keeps Trump-era sanctions in tech battle with
China, looks to friends for help. <https://www.cnbc.com/2021/04/29/biden-100-days-china-tech-battle-sees-sanctions-remain-alliances-made.html>. (Accessed: 13
May 2025).

CNN. (1997). China to U.S.: We Didn't Do It.
<https://edition.cnn.com/ALLPOLITICS/1997/04/29/us.china/>. (Accessed: 13 May
2025).



CNN. (2022). Pelosi expected to visit Taiwan, Taiwanese and US officials say.
<https://edition.cnn.com/2022/08/01/politics/nancy-pelosi-taiwan-visit/index.html>.
(Accessed: 14 May 2025).

CNN. (2023).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met with top Chinese official in highest US-China engagement since spy balloon incident.
<https://edition.cnn.com/2023/05/11/politics/jake-sullivan-wang-yi-meeting>
(Accessed: 8 June 2025).

Fischbach, J. R. (2024). Closing the Gap: China Homes in on US Navy VLS Advantage.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https://www.iiss.org/online-analysis/military-balance/2024/12/closing-the-gap-china-homes-in-on-us-navy-vls-advantage/>. (Accessed: 14 May 2025).

Hebert, A. J. (2008). Fighter Generations. Air & Space Forces Magazine.
<https://www.airandspaceforces.com/article/0908issbf/>. (Accessed: 13 May 2025).

Ishimaru, J. (2024). Japan's shifting foreign-assistance schemes.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https://www.iiss.org/online-analysis/online-analysis/2024/04/japans-shifting-foreign-assistance-schemes/>. (Accessed: 14 May 2025).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11). Defense Programs and Budget of Japan: Overview of FY2011 Budget. https://www.mod.go.jp/en/d_act/d_budget/pdf/230401.pdf.
(Accessed: 13 May 2025).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12). Defense Programs and Budget of Japan: Overview of FY2012 Budget. https://www.mod.go.jp/en/d_act/d_budget/pdf/240301.pdf. (Accessed: 15 May 2025).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13a). Defense Programs and Budget of Japan: Overview of FY2013 Budget. https://www.mod.go.jp/en/d_act/d_budget/pdf/250516.pdf. (Accessed: 13 May 2025).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13b). Defense Programs and Budget of Japan: Overview of FY2014 Budget. https://www.mod.go.jp/en/d_act/d_budget/pdf/260130.pdf. (Accessed: 15 May 2025).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15a). Defense Programs and Budget of Japan: Overview of FY2015 Budget. https://www.mod.go.jp/en/d_act/d_budget/pdf/270414.pdf. (Accessed: 14 May 2025).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15b). Defense Programs and Budget of Japan: Overview of FY2016 Budget. https://www.mod.go.jp/en/d_act/d_budget/pdf/280330.pdf. (Accessed: 13 May 2025).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16). Defense Programs and Budget of Japan. https://www.mod.go.jp/en/d_act/d_budget/pdf/281025.pdf. (Accessed: 13 May 2025).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17). Defense Programs and Budget of Japan.



https://www.mod.go.jp/en/d_act/d_budget/pdf/300329.pdf. (Accessed: 14 May 2025).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19). Defense Related Budget of FY2019.

https://www.mod.go.jp/en/d_act/d_budget/pdf/190510a.pdf. (Accessed: 15 May 2025).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21). Defense Programs and Budget of Japan: Overview of FY2021 Budget Request.

https://www.mod.go.jp/en/d_act/d_budget/pdf/210330a.pdf. (Accessed: 14 May 2025).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22). Defense Programs and Budget of Japan: Overview of FY2022 Budget. https://www.mod.go.jp/en/d_act/d_budget/pdf/20220420.pdf. (Accessed: 13 May 2025).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23). Defense Programs and Budget of Japan: Overview of FY2023 Budget. https://www.mod.go.jp/en/d_act/d_budget/pdf/230330a.pdf. (Accessed: 15 May 2025).

Japan Ministry of Defense. (2024). Progress and Budget in Fundamental Reinforcement of Defense Capabilities: Overview of FY2025 Budget Request. https://www.mod.go.jp/en/d_act/d_budget/pdf/20241126a.pdf. (Accessed: 14 May 2025).



Jap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22).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ttps://www.mofa.go.jp/fp/nsp/page1we_000081.html. (Accessed: 15 May 2025).

Jap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23). Offi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OSA). https://www.mofa.go.jp/fp/ipc/page4e_001366.html. (Accessed: 13 May 2025).

Kass, A. (2025). What Do Fighter Jet “Generations” Actually Mean? The National Interest.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what-do-fighter-jet-generations-actually-mean>. (Accessed: 14 May 2025).

Los Angeles Times. (1997). China has not rattled one saber about a U.S. stopover by Taipei’s leader. The U.S. ought to curb the visit. <https://www.latimes.com/archives/la-xpm-1997-aug-05-me-19474-story.html>. (Accessed: 28 June 2025).

Los Angeles Times. (1998). Chinese Defense Minister, Cohen Sign Military Maritime Agreement. <https://www.latimes.com/archives/la-xpm-1998-jan-19-mn-9929-story.html>. (Accessed: 15 May 2025).

Narushige, M. (2023). Japan's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s://www.csis.org/analysis/japans-new-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Accessed: 13 May 2025).

NBC news. (2023a). Map: Here's how close the Chinese spy balloon flew to the U.S. nuclear arsenal.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national-security/map-close->

chinese-spy-balloon-flew-us-nuclear-arsenal-rcna69376. (Accessed: 28 June 2025).



NBC news. (2023b). U.S. intelligence officials determined the Chinese spy balloon used a U.S. internet provider to communicate.

<https://www.nbcnews.com/news/investigations/us-intelligence-officials-determined-chinese-spy-balloon-used-us-inter-rcna131150>. (Accessed: 28 June 2025).

Reuters. (2020). U.S. rejects China's claims in South China Sea, adding to tension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world/us-rejects-chinas-claims-in-south-china-sea-adding-to-tensions-idUSKCN24E2OT/>. (Accessed: 15 May 2025).

Reuters. (2021a). U.S. sanctions seven Chinese individuals over Hong Kong

crackdown.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us-sanctions-seven-chinese-individuals-over-hong-kong-crackdown-2021-07-16/>. (Accessed: 14 May 2025).

Reuters. (2021b). China retaliates with sanctions on former U.S. commerce secretary

Ross, other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china-imposes-counter-sanctions-former-us-commerce-secretary-ross-others-2021-07-23/>. (Accessed: 13 May 2025).

Reuters. (2021c). Biden, Xi plan U.S.-China virtual summit before year's end, U.S.

say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us-says-agreed-with-china-virtual-biden-xi-summit-before-years-end-2021-10-06/>. (Accessed: 14 May 2025).

Reuters. (2022). China's foreign minister told of possible Pelosi Taiwan trip in July, U.S. official say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no-plans-blinken-meet-chinese-russian-counterparts-cambodia-this-week-senior-us-2022-08-03/>. (Accessed: 15 May 2025).



Reuters. (2023). Xi, Blinken agree to stabilize US-China relations in Beijing talk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blinken-wrap-up-rare-visit-china-may-meet-xi-jinping-2023-06-18/>. (Accessed: 14 May 2025).

Reuters. (2024a). Taiwan raises alert as China deploys 90 ships in likely exercise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taiwan-military-sets-up-emergency-response-ahead-chinese-drills-2024-12-09/>. (Accessed: 13 May 2025).

Reuters. (2024b). Chinese naval deployments in line with other large drills, US official says.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ese-naval-deployments-line-with-other-large-drills-us-official-says-2024-12-11/>. (Accessed: 15 May 2025).

Rogoway, T. (2021). Everything You Ever Wanted To Know About The Navy's Ever-Evolving Aegis Combat System. The War Zone. <https://www.twz.com/39508/how-the-aegis-combat-system-is-evolving-to-dominate-naval-warfare-of-the-future>. (Accessed: 14 May 2025).

Schulenburg, R. (2025). Japan set to enhance its anti-ship missile inventory.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https://www.iiss.org/online-analysis/missile-dialogue-initiative/2025/01/japan-set-to-enhance-its-anti-ship>

missile-inventory/. (Accessed: 13 May 2025).



Taipei Times. (2000). U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o visit Beijing.

<https://www.taipeitimes.com/News/local/archives/2000/03/17/0000028131>.

(Accessed: 15 May 2025).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2023). Readout of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s Meeting with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olitburo Member Wang Yi in Malta.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readout-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s-meeting-with-chinese-communist-party>. (Accessed: 15 May 2025).

The Guardian. (1999). US backs Taiwan as China warns of invasio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1999/aug/14/china.julianborger>. (Accessed: 28 June 2025).

The Guardian. (2023). Chinese balloon gathered intelligence from sensitive US military sites – report.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3/apr/03/china-spy-balloon-us-military-intelligence>. (Accessed: 28 June 2025).

The New York Times. (1994). U.S. and Chinese Resolve Dispute on Missile Sales.

<https://www.nytimes.com/1994/10/05/world/us-and-chinese-resolve-dispute-on-missile-sales.html>. (Accessed: 13 May 2025).

The New York Times. (1995a). As Relations Decline, China Also Sticks to Hard Line



on Taiwan, Washington. <https://www.nytimes.com/1995/08/01/IHT-as-relations-decline-china-also-sticks-to-hard-line-on-taiwan-washington.html>. (Accessed: 14 May 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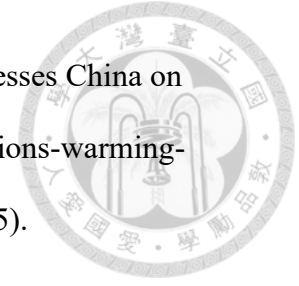
The New York Times. (1995b). Aides to Clinton Say He Will Defy Beijing and Issue Visa to Taiwan's President. <https://www.nytimes.com/1995/05/22/world/aides-to-clinton-say-he-will-defy-beijing-and-issue-visa-to-taiwan-s-president.html>. (Accessed: 15 May 2025).

The New York Times. (1995c). Angered Over Taiwan, China Recalls Its Ambassador in U.S. <https://www.nytimes.com/1995/06/17/world/angered-over-taiwan-china-recalls-its-ambassador-in-us.html>. (Accessed: 13 May 2025).

The New York Times. (1998). Clinton and Jiang Conclude Summit with Agreements on Trade and Human Rights. <https://archive.nytimes.com/www.nytimes.com/library/world/asia/062898china-summit.html>. (Accessed: 15 May 2025).

The New York Times. (1999a). Citing Security, U.S. Spurns China on Satellite Deal. <https://www.nytimes.com/1999/02/23/world/citing-security-us-spurns-china-on-satellite-deal.html>. (Accessed: 13 May 2025).

The New York Times. (1999b). U.S. to Pay China for Embassy Bombing. <https://www.nytimes.com/1999/07/31/world/us-to-pay-china-for-embassy-bombing.html>. (Accessed: 14 May 2025).



The New York Times. (2000). With Relations Warming, Albright Presses China on Taiwan. <https://www.nytimes.com/2000/06/23/world/with-relations-warming-albright-presses-china-on-taiwan.html>. (Accessed: 15 May 2025).

The New York Times. (2020). Trump Calls on U.N. to Hold China Accountable for Coronavirus Pandemic. <https://www.nytimes.com/2020/09/22/world/americas/UN-Trump-Xi-China-coronavirus.html>. (Accessed: 13 May 2025).

The New York Times. (2022). U.S. Announces Diplomatic Boycott of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https://www.nytimes.com/article/diplomatic-boycott-olympics.html>. (Accessed: 14 May 2025).

The Washington Post. (1994a). U.S. Softens Trade Stand with China.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94/03/14/us-softens-trade-stand-with-china/db10657d-5f31-4709-b679-cb143d0a15fc/>. (Accessed: 15 May 2025).

The Washington Post. (1994b). Perry Visiting Beijing for Talks on Military.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94/10/17/perry-visiting-beijing-for-talks-on-military/fd8e59a7-fe75-462a-b227-ea8e4a037b60/>. (Accessed: 14 May 2025).

The Washington Post. (1996). Top U.S. Security Adviser Holds Talks in Beijing.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96/07/10/top-us-security-adviser-holds-talks-in-beijing/30f180fe-7914-46c6-a536-3c3a171adf7d/>.

(Accessed: 13 May 2025).



The Washington Post. (1997a). Standing Disputes Await Albright in Post-Deng China.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97/02/24/standing-disputes-await-albright-in-post-deng-china/4f2c183b-c1b0-440b-812b-f59b61cf13aa/>.

(Accessed: 14 May 2025).

The Washington Post. (1997b). Clinton Security Adviser, Chinese Leader Mee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97/08/13/clinton-security-adviser-chinese-leader-meet/42317e0a-9545-4023-953b-44771b82c49d/>.

(Accessed: 15 May 2025).

The Washington Post. (1998a). U.S. and China Nearly Came to Blows in '9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98/06/21/us-and-china-nearly-came-to-blows-in-96/926d105f-1fd8-404c-9995-90984f86a613/>. (Accessed: 13

May 2025).

The Washington Post. (1998b). U.S. and China to Seek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98/04/30/us-and-china-to-seek-a-strategic-partnership/6c6a0901-6e09-4fa6-bfd9-b95e0fb0d6df/>. (Accessed:

14 May 2025).

The Washington Post. (2000). House Member, Taiwan Leader Meet in L.A.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2000/08/15/house-member-taiwan-leader-meet-in-la/0c964726-e497-402e-86d2-5f94240c808a/>. (Accessed: 15

May 2025).



The Washington Post. (2020). Trump signs partial economic deal with China, calls trade pact a ‘momentous step’.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economy/trumps-new-china-deal-cements-emergence-of-managed-trade/2020/01/15/7892c446-372b-11ea-bf30-ad313e4ec754_story.html. (Accessed: 13 May 2025).

The Washington Post. (2021).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gets a taste of China’s ‘wolf warrior’ diplomacy.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1/03/19/biden-blinken-china-wolf-warrior/>. (Accessed: 14 May 2025).

The Washington Post. (2023). Blinken postpones China trip as suspected spy balloon detected over U.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2023/02/03/blinken-postpones-china-trip-suspected-spy-balloon-detected-over-us/>. (Accessed: 28 June 2025).

The White House. (1999). Summary of U.S.-China Bilateral Agreement.

<https://clintonwhitehouse4.archives.gov/WH/New/WTO-Conf-1999/factsheets/fs-006.html>. (Accessed: 15 May 2025).

The White House. (2021). Readout of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s Meeting with Politburo Member Yang Jiechi.

<https://biden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0/06/readout-of-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s-meeting->

with-politburo-member-yang-jiechi/. (Accessed: 14 May 2025).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96). Press Statement by Nicholas Burns/Spokesman on The Secretary's Travel to China and APEC Meeting. <https://1997-2001.state.gov/regions/eap/burns116.html>. (Accessed: 14 May 2025).

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2023)。中國海軍艦艇の動向について(2023年4月25日)。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
https://www.mod.go.jp/js/pdf/2023/p20230425_01.pdf，2025/05/13。

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2024)。中國海軍艦艇の動向について(2024年10月15日)。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
https://www.mod.go.jp/js/pdf/2024/p20241015_06.pdf，2025/05/14。

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2025)。中國海軍艦艇の動向について(2025年4月3日)。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
https://www.mod.go.jp/js/pdf/2025/p20250403_01.pdf，2025/05/15。

日本經濟新聞(2022)。中國軍事演習「重大な問題」 岸田首相、ペロシ氏と面會。日本經濟新聞。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A047V70U2A800C2000000/>，
2025/05/13。

東京新聞(2022)。敵基地攻撃能力の保有、防衛費の増額…公明の対応が焦点 自民と温度差 安全保障3文書改定へ協議スタート。東京新聞。

<https://www.tokyo-np.co.jp/article/208896> , 2025/05/13 。



朝日新聞(2021)。臺灣情勢で麻生氏「次はとなれば存立危機事態に関係も」。朝日新聞。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P7574X3P75UTFK016.html> , 2025/05/15 。

朝日新聞(2022)。中國の弾道ミサイル5発、日本のEEZ内に落下 外相會談急ぎ中止。朝日新聞。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Q846SS2Q84UTFK01R.html> , 2025/05/13 。

Harris, T. (2009). 共通の敵に分断された米韓と日本. Newsweek Japan. <https://www.newsweekjapan.jp/harris/2009/06/post-8.php>. (Accessed: 14 May 2025).